



# 中国文库



## 发展的道理

樊纲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 发展的道理

樊 纲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的道理 / 樊纲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108-02055-6

I. 发… II. 樊…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5632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整体设计: 李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 卢岳

发展的道理

Fazhan De Daoli

樊纲著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 100010

北京瑞占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01千字 印数: 0,001-3,000

ISBN 7-108-02055-6

定价: 16.00元



作者像



##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编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 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 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 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 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 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 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 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

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





# 前 言

我本来的研究领域不是发展经济学,但这几年,在全球化、科技革命、地区差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等的讨论中,不知不觉被“卷入”了一些有关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在讲学和研讨会上,也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讲了不少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话题。后来,在 2000 年,还将有关的一些问题,写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十论”。这本文集,就是以这“十论”为主,将另外一些有关发展的文章也搜集在一起编辑而成的。

发展经济学不是一门基础理论,而是以微观、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经济学分支。但它无论如何有着它独特的理论地位,因为就我的理解而言,它所研究和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在别的地方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处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这其实不过是对“落后国家”的“尊称”),如何能在存在着处处占先、处处比你强、压着你的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逐步克服自己的弱势(包括在体制方面的弱点),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增长得还要比发达国家快,从而最终实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实现“趋同”(convergence)。

这些年发展经济学的处境有点“不景气”,原因可能是多方



面的。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套关于“出口替代”、“进口替代”的理论，因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非洲国家没能按那时的理论实现起飞，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与兴趣。70年代以后人们又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研究“出口导向战略”等等，也因无法应用于多数规模较大的经济以克服“二元经济”的瓶颈而难以推广。到了90年代，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和国内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有的人干脆鼓吹发展的问题就是实现市场经济的问题，用制度改革代替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些人则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诸如教育、卫生、社会组织以至环境一类的问题上来。这几年，甚至在一些人的笔下，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似乎被一些发达国家更加关心的“全球问题”所替代、所掩盖了。总之，在近些年，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的地位似乎被削弱了，也就更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发展经济学的那个特殊问题，即“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还得比别人增长得快”，对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紧迫。令人遗憾并且令人担忧的是，发展经济学的景气，导致了人们对它的忽视。一方面，理论上刚刚开始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人们学习的只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教科书，以为那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全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们也往往跟着他们去研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人们现在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将一些发展中国家称为“新兴市场”），而忘记了自己的特殊问题。结果，偏偏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这些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连经济系的毕业生也对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加以应用和普及了。

我这本集子收集的文章，谈不上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系统研



究,但我真的希望它们当中包含的对发展经济学一些问题的新的思考,不仅能激发起一些人进一步研究的兴趣,而且能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起到一些普及的作用。或许,发展经济学是我们中国人能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做出点真正的新贡献的一个领域。

感谢三联书店热情邀请我参加“经济学家手札”系列,感谢编辑贾宝兰的积极督促和热情帮助。这些年来,我总是觉得有愧于他们。

2001年8月29日



代序

## 新的世纪与中国的“生死存亡”<sup>\*</sup>

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是最不幸的一个世纪,也是最不幸的世纪之一,好在这个世纪有一个较为光明的结尾,在最后的 20 年的改革与开放取得了进展,经济开始起飞。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我看来,21 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决定中国能否最终从经济上、科技上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追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最后一个世纪。如果在这一世纪中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也许就永远地失去了追上世界列强、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机会,我们中国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永世不能翻身”。

如果谁认为这是一种危言耸听,那就不妨自己算一算账,自己做一些逻辑上的推论。最关键的一个逻辑环节是:你在发展,人家也在进步,而且可能进步的速度比你还要快。按照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一点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才 800 美元,而世界先进水平是 4 万美元。当你费了好半天的劲追到现在的“中等水平”即 2 万美元的时候,人家

---

<sup>\*</sup> 本文是新世纪、新千年来临之际应一些报刊之邀写的“感言”。



可能已经变成了 8 万美元。而现在,由于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在先进国家首先发生,他们的增长速度正在加快。美国 2000 年的增长速度可能要接近 5%,一年增加出来的人均 GDP 就将近 1600 美元,比我们的人均 GDP 总量还多一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不仅是“不进则退”,而且是进慢了也等于在退。而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不是首先在你这里日新月异,而是首先在人家那里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要想前进得快一点又谈何容易!这就是我担心差距弄不好还会扩大的原因。本来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差距,就容易越扩越大;一旦差距进一步拉大,就更容易越扩越大,恶性循环,我们也就落到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

在世纪之交,别人都在满怀希望地憧憬未来,而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无非是想警示国人,居安思危,一定要处心积虑、卧薪尝胆、千方百计、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不能只想到我们自己早晚也能建成自己的“航空母舰”,而是要想到当你好不容易建成自己的航空母舰的时候,人家可能已不再与你的航空母舰交手,而是用“航天母舰”从天上打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而是如何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是在先进国家已经处处占先、处处压着你、挤着你、打着你的情况下,奋发图强,一步一步地追上去。想想这当中的艰难困苦,在这世纪之交,我们能不多想想一些困难、多做一些警示吗?我们还能整天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做那些让别人笑话的“无用功”吗?

在一个本来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请千万不要再把这一点当成什么“新发现”而大惊小怪),有的人总是抱怨别人如何如何地“强食”,就是不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是“弱肉”。你



既然是“弱肉”，别人自然就会来“强食”。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盼着别人良心发现不来“强食”，而是自己也奋发图强起来，也成为强者。最糟糕的莫过于自己一点不想承受改革与开放的阵痛、积极进取，而是一味地抱怨别人如何想占自己的便宜，寻求政府对落后的保护，结果不仅是自己继续落后，还会拖了整个国家的后腿、整个民族的后腿，使大家都永世不得翻身。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还需要许多的市场保护，以使我们的弱小的产业能够有所发展。这也是我们在国际上力争的事情。但是，面对国内来说，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努力的借口，不能成为保护落后的借口。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同那些口口声声叫嚷民族主义而事实上是以此为自己的落后寻找借口和保护的民族败类们做更加坚决的斗争，以保证我们不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

最后，要想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强者，只有雄心壮志、下定决心是不够的，更不是想入非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能实现的，而是要靠科学的精神，尊重经济的规律，要靠长期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努力和一点一滴、持之以恒的积累。这就要我们多学一点发展经济学的知识，去寻找我们在“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下的相对优势，才能真正后来居上。

当然，我还是相信，我们中国人在新的世纪不至于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我们不笨。中国人在全世界都是“聪明的科学家”和“精明的商人”。我们的问题，真的仅在于不再犯过去犯的那些错误。

1999年12月25日初稿

2000年12月23日修改



# 目 录

前言 .....	1
代序 新的世纪与中国的“生死存亡” .....	1
<b>中国经济发展十论 .....</b>	<b>1</b>
序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	2
国际经济新趋势与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	4
首先要重视发挥“现实的竞争力” .....	13
利用相对优势与利用“适当的技术” .....	20
新经济与旧经济:传统产业在中国仍大有可为 .....	26
创新与引进:如何以最小的成本 取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	33
要素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缩小 .....	39
城市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 一个中心环节 .....	46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非农产业化 .....	51
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 .....	55
体制改革、宏观调节与长期增长 .....	64
续论:发展问题与经济学其他问题的关系 .....	68



<b>全球化与中国</b> .....	73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扩大开放 .....	74
中国“人世”:不会是“灾难”,也不会是“奇迹” .....	78
全球化、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	81
关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思考 .....	84
奥运会申办成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	93
<b>资源与发展</b> .....	97
人的局限仅在于他们自己 .....	98
“文明批判”的批判 .....	101
——关于发展私人轿车的思考	
买车与开车:为资源付费 .....	119
<b>农业与农村</b> .....	123
超越农业与超越国界 .....	124
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开发 .....	136
<b>收入差距与地区差距</b> .....	143
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与收入平等 .....	144
西部的发展:发挥相对优势与重视民营中小企业 .....	150
要素流动与人口流动 .....	153
再论“人口迁移” .....	159
<b>发展阶段与技术战略的选择</b> .....	169
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	170
论竞争力 .....	175
——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效益关系的思考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地增长? .....	188
——关于“克鲁格曼质疑”的分析与思考	
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复杂性与理论的解释力 .....	201
“基因泡沫”应会小于“网络泡沫” .....	207
<b>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b> .....	<b>211</b>
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额外作用 .....	212
关于政府作用的再讨论 .....	219
“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225
<b>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启示</b> .....	<b>231</b>
全球金融泡沫的破裂和亚洲金融危机 .....	232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东南亚危机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	242
“对冲基金”的危机与警示 .....	257
东南亚危机对我们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 .....	262



# 中国经济发展十论





## 序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在新技术革命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外国人关注“中国还能否继续高速成长”;而我们的企业在问“加入 WTO 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世界经济的逻辑是“弱肉强食”,世界上没有人希望中国能够强大,历来如此,从来如此,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刚刚意识到这个道理才刚刚如此。而正因如此,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必须继续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增长下去,否则我们就不能解决各种各样因为落后于人而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失去在新的世纪赶上世界强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平等的一个成员的最后机会。因此,我们只有深入而客观地研究:新的形势下我们会面对哪些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根据我们的特定国情、特定环境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利用我们自己的特有优势,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使中国经济再能有 20—30 年的高速增长?

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目的,我才试图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对与中国当前和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有关的 10 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当中,体制改革恐怕是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没有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持续发展就会是一句空话。但这个问题不是这一组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与发展民营金融”一篇较多地涉及到了产权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读者可以在我的其他的文章中找到它的位置。这一组文章集中讨论的是即使假定现在体制改革就已经完成了我们也仍然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即一个人均收入只有 800 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在本书中,收在后面的一些文章,也有论及在这“十论”中的问题,但为了保持这“十论”的相对完整,我还是将它们区分开来,而没有严格地在全书中按问题来分类,请读者原谅。



# 国际经济新趋势与我们 面临的新挑战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从来不是自己与自己比有了多大的进步，而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至追赶上发达国家，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就是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关系中加以定义的，而且也是因为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还是会处在“处处受压”的地位。

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重要的趋势：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所有这些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些新的趋势的出现可能使它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使世界中贫富差距拉大的可能性加大。

正因如此，在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国际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以确定真正有效的对策。在中国经济扩大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我们的很多“政策结论”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



## 技术革命

90年代以来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统称为“数字革命”,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这一革命本身还正在进行,远没有结束,18个月一代新芯片的“莫尔定律”仍然有效;无线通讯与网络的连接技术正在迅速形成;网络与实业的结合和“网络公司”的兼并整合刚刚开始,资本市场上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波动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回合”。

而人们现在还感受不深、但未来影响可能更大的另一个技术革命即“基因革命”,也正在悄悄地发生。2000年春天人类已经获得了完整的果蝇的基因密码谱;曾有人估计到2000年底,人类就可能获得人类的全部基因密码谱的初稿(这很可能是由一个名叫赛利拉的私人公司首先完成)。网络革命还仅仅是改变人们获得信息和方式,而基因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本身,以及与这生活相关的农业、食品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以及几乎所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经济产业!

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落后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可以在较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较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期看,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使我们更多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也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在正在发生



的技术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首先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首先在市场上占据了优势(想一想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中国家因为还不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差别),还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以现在的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例,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以下几方面条件的缺乏而处于劣势:A. 不具备广泛应用电脑和网络的教育水平。B. 缺乏电信、金融、商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比如因没有信用卡而无法进行网上支付,因缺乏特殊配送条件而难以开展网上交易,因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而难以开展风险投资和为新创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等等。C. 在现代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下,由于新技术不是自己发明的,在利用时要支付更高的技术使用费或技术转让费。而且,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在专利保护时期,它们越是被(发展中国家)广为应用,赢利就越大。D. 由于发达国家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研究与市场条件,使发达国家可以更多地吸引人才,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发生人才流失,使技术进步导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更加扩大而不是缩小。

## 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只不过在最近一些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



那么,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资本和技术当然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力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只有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一般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允许流动的(“签证拒签”),这是发达国家一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士们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是无法实现流动的,“偏远地区”仍然是资本和技术难以进入的。

考虑到过去二三百年来国际贸易已经在逐步扩大的事实,那么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的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里的资本要素,既包括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

资本要素流动的范围和速度的提高,毫无疑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始的时候缺乏的也是资本和技术。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场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要素就有了实际进入生产的机会(失业的人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一些比较优势才得以发挥,发展进程才得以开始和持续。如果没有经济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而且,全球化无论如何都在进行,你不积极地参与和利用它,就只能被他所淘汰。

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一定就使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要容易,它也许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

理论上说,自愿的交易(要素的自愿流动和组合也是一种自





愿交易)可以导致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改善。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中当然也是可以获益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交易双方的分配比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在很多情况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强国、跨国公司等),会获得较大的份额,较弱的一方则只获得较小的份额,从而使双方的差距拉大。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显然首先是资本所有者,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当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展,法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人才和经验,缺乏对资本市场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其他体制方面与成熟的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它们容易受资本市场风险的冲击,而较难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即使仅就直接投资而言,在手持资本、四处选择、待价而沽的跨国公司与多一点就业总比少一点就业好的落后国家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落后国家的人们来说,真正的悖论在于:不开放,不利用外资,不加入全球化,你的发展速度更慢;而利用外资本身,并不一定能缩小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亚洲金融危机,美元的长期坚挺,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强劲攀升,欧美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范围内利息率和资本收益率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经济在1999年的第四季度增长率达到7.1%,比中国的增长率都高,都说明了全球化可能使富人更富。在这过程中,穷人用绝对收入指标衡量可能也会变得富了一些,但相对而言,差距可能反倒扩大了,追赶起来更加难了。



亚洲危机中那些饱尝过早开放金融市场之苦,大量财富被资本流动所“卷走”的国家甚至还会出现富裕程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尽管比起 20 年前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是提高了。

## 全球的市场化

在人们较多地谈论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值得重视的一个趋势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因为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条件恶化而不是好转。

所谓“全球的市场化”指的主要是自 90 年代初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首先是苏联—东欧国家旧体制的解体,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开支,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加快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开支,消灭预算赤字(现在像瑞典、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大额预算盈余),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活力。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到拉美,也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增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压缩公共支出,平衡国际收支。

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再加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了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供给迅速增大,成本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放慢。私人企业因追求利润而控制工资及其他成本支出的增加,而政府则从过去的财政赤字(“花的比收的多”)转变为财政盈余(“收的比花的少”)。结果,便出现了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全世界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生



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全球市场从过去 50—60 年代“通货膨胀”（以及“滞胀”），转变为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不过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全球经济从此进入（“回归”）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新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市场的市场化当然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的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我们如果在一些方面拥有竞争力，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以促进我们的发展。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有利的，而一个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日趋“拥挤”的国际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的那一部分，即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由于一大批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进入而已经变得特别“拥挤”，竞争格外激烈（包括竞相压价），这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表明，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条件，可能都不如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那么好。日本和“四小龙”当年以“出口带动”的经济起飞所面临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难以重现了。我们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也要面对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现实；像过去 20 年中许多时候净出口的增长本身可以贡献几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那种情况也是难以再现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 新形势与老问题：落后国家如何 能增长得更快一些

需要十分明确的是，以上的分析是对事实的确认，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技术进步、反对全球化、反对市场化。反对任何进步的事物只会使自己变得反动，而不会使自己进步；抱怨别人如何强大，不能改变自己的弱小。抱怨发达国家占优势、占便宜、欺负人，也于事无补，因为天下的逻辑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从古至今，历来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回到常识，而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新发现”。应该做的只是认真思考自己如何也变得强大。那么，分析以上问题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出现而自动缩小，相反，新的形势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我们过去 20 年的高增长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别人也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一方面客观准确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另一方面客观而准确地分析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在这种对现实的充分认识、分析的基础上寻找能使我们真正发展起来、缩小差距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少走弯路，少拿宝贵的资源去“打水漂”，少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实现不了而又代



价昂贵的所谓发展战略。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是 800 美元左右,世界上最高的人均 GDP 是瑞士的 4 万美元(美国是 3 万美元)。它增长 2% 就增长出一个 800 美元。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实在是再经不起折腾,再经不起弯路,再经不起各种浪费资源、降低效率的“跃进”了。

其次,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其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尽管这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加速改革与发展和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的努力。

认真分析国际经济的新趋势,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才能少走弯路。而要想真正追赶上去,最重要的前提,还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要加紧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真正的市场机制,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在国际上也还会继续受别的挤压。



## 首先要重视发挥“现实的竞争力”

加入 WTO、全球化、科技革命、知识经济……所有这些听起来之所以既让人觉得刺激又让人觉得恐惧,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的竞争;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 应该怎样才能最终赶上发达国家

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弱小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相比竞争力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原因:

1. 科技。即科技开发能力与技术装备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还包括教育与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

2. 人才。既包括技术人才,也包括管理人才,还包括熟练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人才”因素与“科技”因素有重合的部分,因为人才是科技能力的载体。但人才还包括的是管理能力和市场经验。拥有几百年市场竞争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国家和企业,显然占居优势地位。



3. 资本。雄厚的资本可以经得起竞争的风浪,经得起“先赔后赚”,易于挤垮“小对手”,易于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与人才和科技因素相关,因为有钱就能付高工资,引进人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引进人才”对于穷国来说就意味着“脑力流失”);有钱就能够进行较大力度的科技开发投资,永保优势地位。与资本相关的另一点是“规模”,财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规模效益,挤垮弱小的对手。

4. 体制。这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法制结构、企业制度、资本市场、政府规章制度、政府效率等等一切与企业运行效率相关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弱势。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久,而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有效的体制,相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已经搞了三四百年的发达国家来说,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从而比较缺乏效率,更易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发展中国家要想最终追上发达国家,就应该而且必须:第一,加速改革体制;第二,加快发展教育;第三,积极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第四,继续努力积累资本,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在说这些“应该”,说这些“必须”。毫无疑问,一旦我们做到了、实现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有了“未来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竞争力。

在“处处不如人”时如何能有  
“现实的竞争力”:发挥“相对优势”

但是以上这些“应该”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



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或者“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时候，怎么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卖得出东西，能赚到钱，能有利润，开始积累资本、发展基础教育，从而能开始发展壮大，增长速度还得比人家高，以缩小与世界强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需要认识到的是，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不仅会在经济发展之初存在，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持续存在——因为差距太大，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你在发展，人家也在进步，还是要处处压着你。也就是说，问题不是看到差距从而看到我们“应该”克服的弱点，而是在于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下还能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幸好，“竞争力”并不仅仅意味资本多、技术新、人才多，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也可以有竞争力！

为此，我们有必要概括地分析一下“竞争力”这一重要概念的基本内容。

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说到底不过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一种（同一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多、服务更周到的产品；从而，企业就能够以更低的售价，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在同样的价格下，赚更多的利润，发展得更快。

而要做到成本相对较低，就不一定只有资本多、技术新才能做到，发展中国家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出发也可以做到。而这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以下几种其特有的“相对优势”：

第一种即资源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其他的东西都稀缺（因而利用起来成本较高），至少还有一种东西成本较低，即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成本较低，竞争力较高。这种优势其实就可以称





为“穷的优势”——收入水平低从而劳动成本低，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这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低而具有竞争力。

第二种称为“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等等,可以少走弯路,走捷径以缩短差距,用不着处处事事自己花代价发明创造、从头“试错”。同时,因为落后,就有追赶的动机。发达国家的人们因为在前沿,容易懈怠,而穷人在追到同等富裕水平之前总会有较为充分的激励去努力奋进。

以上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企业的角度看,还有另一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的相对优势,那就是基于对本国市场的熟悉(也是一种资源即信息存量)的所谓“本土市场优势”,这可以说也是任何落后国家总会具有的一种(初始)资源优势,它指的是对地方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对本国目前特殊的体制的更多的理解、对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的特殊知识,因而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能够利用的一种竞争力优势。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土的优势”。当我们把本国市场也视为国际市场一部分(事实也已经如此,加入 WTO 之后就更是如此)的时候,这是本国企业可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因素。这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一种特殊发展要素,它不同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要素。

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新生企业,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平起平坐,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但是在现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地区、多数企业来说,我们的竞争力的源泉,我们要想卖得出去东西赚得着钱,还只能依靠以上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廉价劳动力、模仿(与引进)和地方特色,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



势”和“落后的优势”。这些可以说就是落后国家的“现实的竞争力”。

我们不会永远“低级”，但要想未来真正走向“高级”，我们必须从“低级”入手，这样才能赚钱，才能积累，才能有钱搞教育，才能逐步搞科研，才能使我们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而不是早早被人挤掉、吃掉，才能不断地“进入下一阶段”，而不是被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 冷静分析现实，脚踏实地前进

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忌讳之一，就是老想一下子变得“高级”。因为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之大，每个人都着急，都想尽快“跳跃式发展”，尽快缩短差距，结果便不断地生出种种“大跃进”、“洋跃进”、“金融早熟”等等的事来。没有技术买技术，没有资本借资本，这都可能做到，但买来借来的技术和资本都要付较高代价的；而另一方面人才又没有，体制又不健全，一时半时还不能改变，于是到头来就会陷入危机，走大大的弯路。我们中国人已饱尝这些教训。而最近的教训来自东南亚危机。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为了更多地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印尼、泰国为典型），企业也过早、过分地追求“高、新、大”（以韩国为典型），大多数大企业不能赚钱，靠借债维持，结果当年名义上速度很快，金融危机一来，“财富缩水”一大块，统算下来增长率要打一半的折扣，因为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新的经济形势使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的“新的紧迫性”，但我们的政府和企业



千万不能再不吸取经验教训，再搞“冒进”，再拿着宝贵的资源“打水漂”了！“发展的紧迫性”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走弯路了！

分析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就绝对地不能搞一些“高、新、大”的东西。我们中国目前经济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是大部分地区和企业还较落后，但也有些企业具备了一些科研能力，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了向较高级发展阶段过渡的实力，具备了一些搞高新技术主业的能力。因此，中国很可能在较广的产业分布上都取得发展，有条件“两条腿走路”，实行多层次的发展。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的现实竞争力源泉仍是以上分析的一些“相对优势”。我们不能再脱离我们的现实的竞争力源泉，又搞“一窝蜂”、“大干快上”，盲目地追求我们不具备优势的“高新科技”，把大量政府的资源和企业的资源又都引导到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竞争力、不能赢利的项目上去。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企业都要马上实行“产业升级”、“结构高级化”，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都看不起我们那些“土的”、“低级”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我们则可能不但不能“多层次”，还可能出现“全盘皆输”，想占领的市场没能占领，能占领的市场又丢掉了，不仅丢给了跨国公司，也丢给了与我们直接竞争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对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企业来说，“适当的技术”即“能赚钱的技术”不一定是“高新科技”）。

在此我们应该发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殊智慧——扬长避短，循序渐进。经典的例子是“田单赛马”。在我们每一等级的马都处于劣势的时候，我们只能先用“上马”对其“中马”，中马对其下马（甚至一定阶段可能还只是以“上马”才能赢其“下马”），赢了钱养出更好的马，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对抗，再不能一开始为



了想赢其上马和中马而一路输去。越是人家发展快、差距有所扩大、发展的紧迫感增大的时候,我们还就越是要沉得住气,用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来认真地分析我们的竞争力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卖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 利用相对优势与利用“适当的技术”

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今天必须  
从现实出发,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赚钱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必须能够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包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市场)上“卖得出东西”,我们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能赢利,从而能有资本的积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使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总之,我们现在就得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必须认真思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竞争力,而不是仅仅设想我们将来“应该有”怎样的竞争力,因为我们现在就必须“挣钱”!而且,为了能够更快地拥有更高级的、“应该有”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我们已经拥有的竞争力,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挣钱,将来的一切都是空话!

所以,尽管我们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强国、成为高新技术和领先者,我们现在却还必须依靠我们的



资源比较优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对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穷的优势”),还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也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它已经是、更将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同时能赢利)的东西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上的产品(组装、来料加工等等)。这并不像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悲哀”,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我们正确地利用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将会仍然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就更是这样。

这丝毫不否定我们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不否定我们今后要逐步发展这样的企业和产业。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就大部分地区、产业和企业来说,我们还必须从现实出发,想想我们干什么才能不亏损,而是能赚钱?!

### 有竞争力的技术不一定是 “高新技术”,而是“适当的技术”

如果说以上这一点还比较容易认识到的话,下面一点则需要较深入的分析 and 阐发,那就是:在“高新科技”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用“高新科技”,特别是那些本身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高新科技,我们的企业往往就会亏损,我们就会不



具备国际竞争力！这里的基本道理就在于：一种“高新技术”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而是由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发明的（据统计世界上92%的最新科技发明产生在发达国家），我们要利用它就要比发达国家或发明它的那个公司至少多支付两笔费用，一是新技术的“专利费”。发明新技术的企业除了要收回它的研发成本之外，还要获取高额的创新利润。它有时体现在先进机器设备的高额创新利润之中。第二，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购买技术所需资金的成本也会比别人更高。这样，我们利用这一技术的资本、技术成本就要比别人高。而如果这一技术本身并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我们不能在劳动成本这一项使总成本有所降低、我们就会要么生产同样的产品而成本比人家高、甚至成本高于市场竞争价格，导致企业亏损；要么售价比人家高而卖不出东西，还是亏损。我们许多企业引进了世界顶尖的高新技术之后陷入长期亏损，其实是必然的；一些企业买进了高新的设备最后也只好闲置不用，可能反倒是对的，因为可能越用越亏损，闲置不用可能还亏得少一些。这些我们长期、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是有其经济规律的背景和原因的。

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利用高新技术的问题上还应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能使这种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能够赢利的各种条件可能还不具备。一国的经济体制、教育水平，职工的技术熟练程度等等，都会构成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力的制约因素。

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适当的技术”(proper technology)，其涵义主要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技术越“高新”越好；在一定的阶段上，由其生产



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各方面条件所决定，只有某些技术和某些技术构成的产业，对于这个国家或这个企业来说是能够赢利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简而言之，“适当的技术”就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成本条件下使企业能够赢利而不是使其亏损的技术。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根本的问题都在于：如果不追求技术进步，就没有明天；而若不能赢利，就连今天也没有，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明天。如果片面地、绝对地、盲目地去追求“高新技术”，甚至以“高新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决策的主要标准，而不是实事求是分析我们的具体条件，并且坚持企业必须以赢利为目的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则，我们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引发出企业亏损、不良债务增多、金融风险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企业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大量企业在盲目追求高新技术和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长期亏损，我们的银行体系就会被坏账拖垮，我们早晚会陷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某些国家（比如韩国）的教训，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适当的技术”的概念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条件发生变化时，什么是“适当的”本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技术构成的提高、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当我们有了赢利，资本积累增多，同时开始有钱搞教育，搞研发，同时随着各种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的发展，使得工人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适当的技术”的水平也就会不断提高，最终达到我们自己也能创造出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水平。





## 为了 9 亿农村人口,也不要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那就是扩大就业,早日使我们的 5 亿农业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吸纳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来,提高这一大人群的收入水平,以扩大国内市场,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既不因市场需要不能尽快扩大而限制增长的速度,更不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把有限的资源都去用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或许少数企业能够成长,少数科技人才的收入能够迅速提高,但若多数劳动力长期不能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而处于贫困状态,我们会陷入社会危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进程就会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怎么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不过分的,包括引进外资发展来料加工业。就许多来料加工业来说,我们的确不能获得与技术、资本相联系的高附加值,但我们(从国家整体或 GNP 的角度看)至少能获得一定额的地租、税收,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大批工人的工资收入。一个农民工由过去的每月 100 元收入增加到每月 500 元收入,的确还不多,但已经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样的就业越多越好,我们有什么理由制定出一些政策去限制其发展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果不欢迎来料加工型的外来投资,结果就是把这些投资驱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到它们那里去创造就业。这正是



这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我们的竞争对手热烈欢迎的事情。

在我们中国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下,增加就业可能也不是个人和企业的首要任务,它无论如何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政府要为“乡下人”的就业和失业者的再就业负社会和政治的责任。而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各种人才都有,我们至少可以同时既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两条腿走路”,在一切可创造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在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赚钱,特别是不能放弃、拒绝、排斥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忘记我们几亿农民要改善就业、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

以上的这一切都说明,对于“提升产业结构”,我们必须有一全面的、现实主义的认识。



## 新经济与旧经济： 传统产业在中国仍大有可为

现在“新经济”似乎已经取代“知识经济”，进一步成为国际上最热门、在国际研讨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我们国内的媒体和市场分析人员，也在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潮流。

首先要明确的是，“新经济”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词，事实上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赋予着不同的涵义。最初，新经济是人们用来指美国经济在近几年所表现出了以下的一种状态：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的基础上长期高速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传统的意义上描述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关系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不再适用（因此是“新”经济）。但是后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国际（国内）的许多人正在许多场合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称为“新经济”，而把其他所谓的“传统产业”称为“旧经济”。

如何定义和使用一个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要明确一个概念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指的是什么？在于如何关系到我国经济和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就“广义的”新经济概念而言，我们需要认识到的问题是，所



谓新经济,主要是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为基础所产生的概念,指的是发达国家当前的一些经济现象;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即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世界领先、全球配置资源、处处称雄那么一种经济状态,当然也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扎扎实实地做许多打基础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到高增长、低通胀,但我们的经济结构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类型,我们还不会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属于领先的地位,我们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我们还不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左右局势。

就“狭义的”新经济概念而言,我们要认清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信息、网络等产业之所以被称做“新经济”或支撑新经济的产业,是因为它们的确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支柱。西方发达国家在住房、汽车、家电、旅游、城市化、高速公路等等所谓的“传统产业”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之后,在人们对住房、汽车等物品的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之后,经济增长因需求的制约也就陷入了相对的停滞。若没有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出现,给它们的经济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它们的经济就不可能再次快速增长。过去10年信息、网络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首先还不是在于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在于创造出了一大块新的“购买对象”,即新的市场需求。电脑、软件、多媒体、网络、移动通讯等等这些人们物质、精神生活中的“新玩意儿”,形成了新的市场板块,于是带动了新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收入出



现了新的增量,并因此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有了更大的回报并有了新的一块国际市场,对其经济的带动也是同样的,但我们这里不予分析)。因此,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当前的经济高涨的确得益于那一块“新经济”的出现,而那些新出现的“玩意儿”和产业,也的确是这些国家的“新经济”(狭义),而其他早已存在的产业,则可以称为“旧经济”。

但是,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的经济“起飞”的时间还不很长,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 800 美元左右(美国是 3 万元,瑞士是 4 万元),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许多产业刚刚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旧经济”的那些产业,对我们来说还大多是“新兴产业”。比如,汽车业显然还是我们的新经济;住房业刚刚起步,二级市场才刚刚开放;旅游还在起步阶段,而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我们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这也是最终产品需求的组成部分!)还很缺乏,家电新产品看上去在城市里越来越难卖了,但一方面,刚出现的这一点市场竞争,还属于“初级阶段”,服务改进的速度之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的几亿农村人口还因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而无法进入家电消费市场(他们不用家电首先不是因为“没电”,而是因为“没钱”)。总之,对其他国家是“旧经济”的许多产业,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经济。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使我们较早地拥有了一块新的市场需求,这当然是好事,我们也要紧紧抓住。但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中,远不如为了其他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补课”所能创造的需求大。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显得重要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把这块肥大的市场让给别人吗(让给跨国公司或其他发展中



国家)?

第二,传统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我们增长率的源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新兴产业的增长和相关的投资,带动其经济每年增长近3个百分点。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新兴产业也发展很快,但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体制上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我们能够紧紧跟上,新兴产业能够每年带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已经很不错了。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2%—3%的增长,而是要增长得更快,这样才能缩短差距,比如说每年要增长7%—8%,那么,剩下的那个5—6个百分点的增长从哪里来?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的增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统产业的更快增长,将仍是我们较高增长率的主要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在传统产业方面的继续努力,就等于放弃较高的增长率而放弃我们的追赶!

第三,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收入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一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而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能正是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正可以利用大量闲在的劳动力靠这些产业来增加就业、积累资本、提高技术。所以,用发达国家“新经济”的产业结构来指导我们发展中国的结构调整,是错误的。

第四,我们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还面临许多局限。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是首先建立在发达的“旧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传统产业还没有发展,许多基础的东西还不具备,新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因此而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发展那



些“旧经济”的过程当中,还相应地发展起了一套市场机制,包括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公司制度、银行服务和资本市场,而这些都是我们仍然十分欠缺、有待大力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经济的发展,所受到的制约就更大。比如“网上交易”,我们就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与信用卡网上支付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目前发达国家的网上购物业务还在因交易规模不够大、送货不及时等问题还难以赢利,我们的网上交易的发展恐怕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经济中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第五,在发展新经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利用“后发优势”,以减少投资的风险成本。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有较高的增长率并逐步缩小差距,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技術,不必事事自己探索,自己经历每一种市场波动,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发展过程的风险成本,少走弯路。正因如此,当前正在发生着的新技术革命,包括信息革命和基因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和赶超的机会,可以出现跳跃式的发展,所谓传统产业的发展,也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对此人们较容易认识。但是人们通常不大知道的是“后发优势”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作为“后发者”我们可以节省一些创新的“风险成本”。发展中国家穷,资本宝贵,经不起亏损(更不要说长期亏损),选择投资项目,“保险”一些为好,不像发达国家或资本实力雄厚的国际大公司那样经得起“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在



技术上没有明显的领先地位,最好不要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初期“跟着起哄”,在技术进步的前沿上去做过多的风险投资,而是等着一些人先去“趟混水”,然后我们再紧紧跟上(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争取走到前沿去),以减少我们发展的风险成本。比如“网络经济”目前还处在第一轮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过程,多数网络公司还没有赢利,以后如何能够赢利,有多少能够赢利(可以肯定的是会有大量的现有企业会被淘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时我们如果也学着发达国家那样,也投下那么多风险投资一窝蜂过多地、不切实际地搞此类新兴产业,我们的相对成本(投资占我们可利用总资本的比重)和绝对成本(被淘汰的企业个数),都会比人家高,我们发展的成本反倒高了,增长速度反倒会放慢。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学者现在天天在那里大叫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鼓惑力很大,那的确是他们的“兴奋点”所在,是他们所面临的“前沿”。而我们如果也跟着他们的“兴奋点”走,不加分析地去赶发达国家的“时髦”,最后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可以预见的是,当“网络板块”发展第一轮“泡沫”破灭的时候,受到打击最重的一定是一大批落后国家的、不具规模和技术实力的公司企业。

以上这些分析表明,当我们使用外国人大量使用的名词的时候,得先搞清楚那是在说什么,然后再好好认识一下我们的现实是怎么回事,而不能人云亦云,跟着起哄、追风,还得当心别上了“人家的圈套”(他们在努力扩大他们的“新兴市场”!)

以上这些分析,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新兴产业,而是说要防止盲目性,防止一窝蜂,防止不计成本,防止再走弯路。在适当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还大有可为,只要我们认真把体制改革的文章做





好,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并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对它们进行改造,这些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当然是真正想发展、想“挣钱”的企业)“吃上几十年”,大可不必都看着某些新兴产业眼红,挤过去冒那份风险。特别是不能所有地区、所有城市、有没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都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不能再一窝蜂地赶时髦。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经不起走弯路、经不起用我们宝贵的资本去“起哄”了。

第六,利用网络技术,不等于就是要经营网络公司。在明确了以上的种种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新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研究与利用给以高度的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就是节省经济的信息成本从而降低一部分(不是全部)交易成本。新的信息技术包括网络等等事实上为我们的一切产业包括传统产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我们的传统产业从此可以效率更高。目前信息技术革命还刚刚开始不久,信息、网络产业还刚刚开始发展(第一轮优胜劣汰还刚刚开始),我们要充分抓住这个机遇,一切传统产业也要积极而充分地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改变经营方式,以充分节省信息成本,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现在出现的网络公司中有一大批最终可能不能赚钱,但网络本身总体上说却是能赚钱的,因为它能为我们节省信息成本,也就是能为我们带来效益。“网络”不等于“网络公司”,“上网”不等于经营“网络公司”。充分利用网络,各行各业,一定可以赚更多的钱,整个经济可以更有效率地发展。



# 创新与引进:如何以最小的成本 取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根本的差距在于科技创新能力

从经济上说,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一个国家如果人均收入不高但科技创新能力很高,那他就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已经是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二战后他很穷,但很快就成长了起来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那就是因为他战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战后穷只是因为他是战败国,而不是因为他是个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抱怨自己在科技研发方面不如发达国家,只不过是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国民创新能力”

以上的分析也就使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变得非常明确了:我们要想追上发达国家,说到底是要在科技开发能力上追上发达国家。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自然要从现在起就积极地、尽最



大可能地培养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国民科技创新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当然是发展教育,不仅是发展高等教育,而且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提高广大一般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形成较高层次的科研能力,使广大劳动者真正成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其次,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学习、吸收别人已有经验、教训的过程,本身也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我们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越接近,才越是具备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能力,研发投入的回报率才会越高。

在这方面,现在应充分注意的问题是:最终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能力,一定是“国民创新能力”,即企业与个人的创新能力,国家的作用只是提供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与条件,包括有利于创新与应用的制度条件,而不能再事事由国家组织“攻关”、由国家承担责任。在技术相对稳定、成熟的条件下,在科技创新的目的是非商业目的的情况下,国家组织“攻关”还有一定的意义,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正在发生的过程中,在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商业竞争的情况下,政府行为就应减少到最低程度。

## “创新成本”:研发能力与经济实力

在这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同理一定程度上应用于一个企业的)的研发能力,既是其经济竞争力的源泉,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

首先,要有研发能力,就要有钱搞教育,不仅是一般的识字,而且要能有钱搞得出一流高等大学、研究生院,有充足的国际一



流设备,更要有钱养得住世界一流的教授,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国际的人才,而不是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流失”到国外。而且当今一国人力资本的水平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积累。所以,人力资本水平是以一国几十年以来收入与财富水平为基础的(当然,不同的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同等的收入可能有不同等的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其次,要有研发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就要有钱搞基础科学研究,而这是一个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有投入而没有市场回报的公益事业;对一个企业来说也要有钱投入研发,而且往往是长期的投入,不断的投入。

此外,创新是有风险的,因此就还有一个风险损失的问题。据统计,世界上的科技研发投入,只不到10%最后是真正转化成商业价值的,是成功的。而这就意味着,要想有世界一流的研发能力,还得有充足的资金,经得起科研失败的损失。

正是因为有这种科研能力与经济实力的相关性,发达国家越有钱也就越有科技创新能力,而越有科技创新能力也就越有钱;落后国家则往往陷入越没钱越没能力、越没能力越没钱的恶性循环。

总之,科技研发能力,不是说要发展就能发展的,科技创新也是有成本的,是要花钱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在讨论一国研发能力的时候,我们再不能“不计成本”了!理论和经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证明,那是行不通的,难以为继的。

##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那么落后国家如何才能摆脱上面的那种恶性循环,开始技



术进步的过程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减少科技进步的成本。

首先是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也是要花钱的，而且，我们不是技术的发明者，我们就要为使用新技术而支付成本费用再加上专利费（还要为此目的支付较高的资金成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研究这项技术所需花费的代价（要想一想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为此项技术研发所花的全部成本）比引进费用还要高，我们就还不如引进更加经济合算。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我们花了好几年才能研发出一个过时的技术，我们的机会成本就实在是大得难以计数了。在当今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没有这种对技术进步不同方式的成本费用加以比较的观念，就没有资格谈论技术进步。

我们当然希望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天下已经有人发明出了很多东西，我们若从头做一遍成本比它还高还耽误时间，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如果说我们没有钱去买技术，那么又为什么花更多的钱自己白费劲？如果我们发明出的东西是国际首创、国际一流，成本又比“买”技术更低，那当然是自己发明为好，如果不是这样，在成本上就是不合算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辛辛苦苦扩大出口，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回技术设备，以缩短差距，走捷径加速技术进步的步伐，而不是自己花费更多的代价。

而且，考虑到在许多领域中（包括信息技术领域）技术进步的风险成本，我们让别人去冒 90% 失败率的风险，而自己利用“后发优势”以节省对我们穷国来说更为宝贵的资金，也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



其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外资的外溢效应指的是外资在一国的经营活动,会使人们观察到其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上所运用的技术和手段,使人们能对那些从过去长期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加以“免费”地学习和模仿,从而加速自己的进步过程。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加速一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这种免费的学习——他们至少可以省出“出国的成本”。

更大的一类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是那些非专利性的基础科学知识与信息。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免费可以获得的科研成果,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了解其存在的方式并积极地学习和掌握,不必自己从头搞起,比如,世界上既然已经有公共组织和私人公司即将公布基因密码谱,我们就不必再花费人力、物力自己去解读基因密码,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理解和利用它们。政府应该在搜集国际科技信息上花更多的钱,然后使企业和个人能够免费地自由获取以降低科技开发的成本。提供科技信息这种公共物品,属于政府的本职工作(如果政府将自己搜集到的科技信息对自己的企业和公众“保密”,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政府还应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国际舞台上力争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更多的免费或低成本的技术转让,以减少技术进步所可能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就又犯急于求成的毛病,忘记我们的实际条件,又去做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傻事。时刻牢记节省成本这个经济原则,包括节省科技进步成本原则,一定会使我们发展得更快,而不计成本只能使我们永远落后。在这里关键的概念就是要综合地(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包括长期因素)比一比哪种技术进步方式更加



节约“技术进步成本”，更加“合算”。

正确的发展战略是：我们要从现在起就着眼于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发展教育和改革科技体制），积极地、脚踏实地地培养、发展我们的国民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很多领域内还是要以引进技术为主，以使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 要素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缩小

中央政府最近制定了开放西部的战略与政策,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无论从人口的角度看,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大国。于是对中国来说便出现了两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第一个是在国际上,如何缩小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是在国内,如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问题具有相同性,又有不同性,而其不同性对于我们思考地区差距问题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的分析将表明,中国地区差距的缩小,将取决于以下三大要素: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以及人口流动。

### 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

所有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都是决定地区差距的因素,包括历史发展的差别;体制差距(市场机制,政府效率等)、教育水平,以及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等。

体制的差距特别重要。沿海许多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





中央给了多少投资,而只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体制上比别人占了优势,资金、人才就开始向那里聚集。因此,对于一些落后地区来说,如何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是根本性的环节。与其多向中央要投资,不如多要一些领先一步的改革政策。有了较好的体制,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否则中央投资进来的钱还会转个圈从其他途径投到其他地区去,建成的基础设施没有企业去利用,也只是一些钢筋水泥而已。

所谓“观念落后”,其实是历史遗留下的某些传统的作用和体制落后的作用共同造成的,它和体制因素有着“共同的因子”。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地区差距中自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来说,自然条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时代,有水的地区自然会较为发达,而戈壁、高原则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矿产资源则是一些内陆地区收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沿海地区甚至海岛,也可能是矿产丰富的地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当运输成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之后,那些不宜于种植业发展的沿海、沿江地区就具有了地理区位优势。无论机械如何发达,水运仍是最能利用自然力而减少投资成本的运输方式。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传递方面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但信息传递的加速不能代替物体(最终消费和投资活动中包括的那些实物)位置的移动。

## 资本的流动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而要使投资项目有利润,除了项目本身的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一些外部环境,包括“软



环境”和“硬环境”。

“软环境”指的主要就是上面所说的体制和政策。投资项目或企业运行中的“政府成本”(与政府打交道所需支付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如果太高,可能使本来很好的投资项目变得无利可图。改善这方面的环境,降低“政府成本”,显然要依靠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硬环境”指的主要是基础设施条件。内陆地区地处偏远,没有一定的运输设施作为前提,投资显然是难以进行的(运输成本高低还是第二位的问题)。其他基础设施也是这样。改善硬环境,显然需要投资。西部地区过去发展较慢,缺乏资金,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西部地区增加投入,这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指责投入西部的资金回报率太低,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因此认为这种投入是不正确的。这种论点混淆了企业投资与政府支出的不同性质。企业投资当然要以效益为目标,但政府支出,包括在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还可能具有追求社会平等或追求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当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政府的钱,原则上说主要就是应该用来“扶贫”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回报率高,市场上的资源自然就愿意投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也已进入良性循环,这时就不再需要政府的投入。在东西部的比较当中,东部目前已经成了“富人”,政府的钱也就应该停止再给东部,而是要更多地支持资金较少的落后地区。落后地区当前投资回报率低,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基础设施不足,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正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退一步说,政府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不应过大,但政府有钱要花,却应该主要花在落后地区,花在“穷人”身上,而不应再给富裕地区锦上添花。这是政府行为的原则。对有些偏远地区



来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经济回报率较低,但作为一个国家,只要那些基础设施早晚是要建设的,目前为了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而早一些搞,也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投资。

政府真正应该掌握的原则是:政府支出只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即主要是基础设施,而不应去搞企业投资,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钱还是地方政府的钱,都不应再去建什么国有企业了。政府的投资改善了投资环境,今后究竟会有多少市场的资金投到西部去,应由市场决定,由民间的投资者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去决定,而不应再是政府决定的政治行为。“开发三线”那样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未来究竟能有多少投资,西部会开发成什么样子,最终也要由市场来决定,由经济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不是由现在人们的“设想”去决定。

## 地区间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人均收入均等”

在讨论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概念和目标。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对于一个地理、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的国家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相等(比如说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等等),而只能做到“人均收入”均等,而且“人均收入”的概念也要有一个全面的定义,比如说大城市的人,货币收入高,但城市拥挤、噪音大,有些人就宁可少一点货币收入,享受小城市、甚至农村的清静,作为货币收入较少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综合收入”的均等。



收入的均等,可以通过“资本流入落后地区”从而提高地区总收入(人均收入分式中的分子)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口从落后地区流出”来实现,也就是通过缩小“人均收入”这一分式中的分母来实现。这正是过去20年已经在发生、今后更应继续发生的。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有些地理、自然条件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成本太高);有些过去在历史上适合农业发展,从而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农业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和其他产业因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而成本太高,从而限制了收入的增加;这时,解决地区差距的基本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即人口向经济发展较快、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以使地区之间的收入实现均等化。在这方面可以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很不同,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中西部、洛矶山脉地区连农业也难发展,但美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地区差距”问题,原因就是人口的不断流动,低收入地区的人们不断向高收入地区转移,使收入均等化(货币收入的差别由其他因素所弥补);中西部地区工业不发达,但人口也少,结果在那里的人均收入也不低。事实上任何大国经济的现代化都意味着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人口的流动还有利于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群众中存在的传统习惯,促进新观念和新体制的发展。

总之,要想实现地区间的收入均等,我们要使生产要素,无论是资本和劳动,都能流动起来。

## 积极促进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

在人口流动的问题上,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包括观念



上的障碍。内陆地区的人当然想发展自己的家乡,而沿海地区的人则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很拥挤了,排斥外地人的进入。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转变观念。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来说,整个中国都应是自己“挣钱的地方”,也是别人“挣钱的地方”。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已经人口不少了,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地区差距这么大,“命中注定”沿海地区要更加拥挤,必须更加拥挤,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就无法实现地区之间的收入均等,无法实现社会的公正。我们现在当然无法断定沿海地区还应吸收多少外来人口,但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人口流动无论如何预示着中国的人口布局将发生进一步的改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差别,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一国内人口是可以流动、迁移的,而国与国之间是不准许自由迁移的,至少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这样。发达国家也许只欢迎少数有专业知识的穷国的人流入(当前他们正你追我赶地吸引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而教育水平低的一般劳动力是禁止流入以防他们抢了本国劳工的饭碗的。正因如此,国际上的贫富差别是很难克服的(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而一国内之所以可以做到消除地区间的差距,最终的原因就是一国内的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

要促进人口的流动,当然还必须改革有关的体制。首先要 在宪法层面上规定公民在各地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然后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之类的具体制度,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放在最后,因为这是防止人口迁移速度过快、大批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防止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基本社会保障



制度。

总而言之,要想最终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三者缺一不可。所谓依靠市场机制缩小地区差距,说到底就是要使各种要素流动性提高;而中国未来经济、社会、人口格局的改变和地区差距的缩小,正是在各种要素的流动中才能最终决定和实现的。



# 城市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 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

## 重视城市化水平过低所产生的问题

过去 20 年,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 1.5 亿—2 亿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得以提高,使中国的市场得以扩大。

但在另一方面,以劳动者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到 1999 年底,将所有农村人口中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农村从事个体运输、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全部包含进去,目前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 53%;而包含外来常住人口在内的城市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 32%。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化(非农产业化)的比率,高出城市化比率约 20 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来是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比较其他国家,在同等的人均 GDP 水平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村工业化,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好处是第一,由于农村工业利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劳动成本相对更低(对比城市职工的工资、劳保费用),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初期阶段的资本积累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对于解释过去 20 年的高增长率,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初期实行农村工业化,具有必然性,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现在讨论城市化还是农村工业化问题,并不意味着批评过去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加以看待。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就必须对城市化水平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低,非农产业效率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城市化程度低,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低,导致工业和其他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基础设施成本过高,交通成本也相应地过高。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是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重视的一个因素。在广大的地区里处处建工厂、处处建小城镇、搞“开发区”,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最后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

第二,缺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聚集效应,使生活各个方面难以社会化,各种服务业就难以发展,就业也就难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就会放慢。这正是最近几年我们所观察到的阻碍经济增长加速的现象。

第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城市化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分散居住的农村和小城镇,使得教育设施和教师的利用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教育投入不少,但效率不高,不仅导致农





村教育水平低下,也严重阻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对经济长远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到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了。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城市化进程将在过去农村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 城市化要求有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最主要的效果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正因如此,城市化进程应该首先着眼于大城市的发展;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周边小城镇也会相应地有所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会有“城郊市区”(或称“市郊化”)的发展,但那只是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和延伸,而不是以小城镇为核心搞城市化。中国的小城镇也需要有一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但有些小城镇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大城市之后,也许是要消失的。小城镇不仅不能替代大城市,而且在综合效益上也不如大城市。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博士的研究,将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健康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总合在一起加以比较,我国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综合效益是最差的。国际上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过去100年来大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也要比小城市好。尽管收入水平和交通、通讯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住宅区有了更快的发展,但第一,这一发展阶段总体上



来说,离我们还较远;第二,这一变化本身应看做是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不能证明我们应该不发展大城市而只去发展小城镇。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中国的农村地区,都需要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农村的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的前提是现在的农民大多数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不再因“地少人多”而收入低下,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才能使农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化。而这就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加。根据前面的分析,这又是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为前提的。这就是说,为了使我国农村有朝一日也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城市化,中国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 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下一阶段中国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非农产业化)过程,正是更多的农民转移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的过程。而这种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是9亿农村人口逐步(可能需要50—80年的时间)被融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市场中来的过程。现在我们发愁许多产品卖不出去、许多生产能力过剩。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农村人口真正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就可能还是要大大扩大的。举例来说,农民现在不买家用电器,首先是因为他们“没钱”,而不是因为农村



“没电”。

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正因如此,城市化应成为我们下一个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个核心内容应是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动城市化发展,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些城市自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已有的特大城市可能本身已难以继续扩大,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带”或“城市群”,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一大批小城市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大城市。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今后50年再出现50—100个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不算多。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本身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许多公共物品的生产本身可以由民营部门完成,但仍需要有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中央政府就在集思广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规划,统筹布局,以防止各地出于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谁都想把自己的城镇或城市“做大”,产生各种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此外,尽快进行体制改革,确保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性的提高,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使城市布局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



##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出路 在于非农产业化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一些基本的难题。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也非常低;扩大农业产量,市场容量又有限,价格下降使农民收入不能提高;遇到天灾,价格上升,产量却下降,收入也不能提高。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比过去一个阶段具有拉大的趋势;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包括由地方政府“乱摊派”、“乱收费”所引起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潜在隐患。

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而最重要的是,想在与农业有关问题的范围内做文章以求解决以上的问题,目前看都是难以奏效的,或者是难以实施的。我们不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关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 5 亿劳动力、9 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



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第二,很难靠提高农产品高价来维持农民的收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进一步加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经成问题,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而且从国内市场本身的供求情况看,目前的市场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可能都难以持续提高(不因进口增加而趋下降已经不错了)。人为地提价,只能使供给扩大而迫使市场价格下降。在这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尽快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保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不能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维持在大大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上。这是因为,食品价格是决定非农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越高,我们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越低。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对我们的经济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国际上一方面有人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主要是农场主集团),而另一些人(主要是工业集团和劳工组织)则巴不得中国封闭市场,搞“粮食自给自足”、“自己养活自己”,因为这样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就会因农产品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对他们的竞争力就被削弱,他们的就业就可以保住。而比较符合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做法是,将农产品价格维持在现有水平,当需求扩大时,如遇供给不能跟上的情况,就靠扩大进口来弥补



不足(目前我国进口粮食只占总消费量的1%左右,进行适当调整而又不损害“粮食安全”的余地还很大)。但是显然,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做文章,已经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其他产业的问题。

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入结构而言,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是“社会保障”(“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地不可出卖、不可转让(当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转租)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乡镇企业)、或者又失去了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中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

而从以上三个“不是出路”的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也自然可以看到出路何在: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



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而不是像最近几年增速趋缓)。这里要认识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是,当人们解决了吃饭这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收入的提高,国民总产值的增长,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发展(虽然仍然要以农业为基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而是取决于我们生活消费中其他非农产品的增加,如衣物、住房、电器、交通、通讯、旅游、娱乐、公共基础设施,等等。这时经济发展或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标志就是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数和时间越来越少,而人类的其他活动越来越多。只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并由此出发制定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短时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就可以不去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发展;只有现在开始努力了,最终才能积过去之努力而最终解决问题。短期内的政策制定,必须与长期发展战略相适应、相衔接,才能保持持续发展势头,不因当前的短期需求而耽误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进程。



# 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

最近几年,在深化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增长、克服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人们的眼光已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民间投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也日益提上了政策研讨的日程;而加入 WTO、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也引起了人们关于如何“对内开放”问题的讨论。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的,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 GDP 贡献已达 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 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 30%,70% 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 30%。





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 20 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 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



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 1. 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的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个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



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 2. 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 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 WTO



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9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4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



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 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



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分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的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



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



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由此而论,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后来者”,在国际上看到的往往是人家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的”东西,而往往忽视了这些“现代的”东西是建立在以往多年形成的许多“基础性的”东西之上的;没有那些基础性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不可能良好地有效运转。忘记了这一点,老是想一下子只搞现代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到头来不能走捷径,相反,却会不断地走弯路。

最后,再要指出的是,有的人很着急,不相信发展那些地方上的“小东西”会有什么大成果。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80年代、90年代初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的例子,那时很少有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没想到它们今天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发展民间金融情况也会是一样。只要体制更有效率,有其经济合理性,早晚会成大气候。





## 体制改革、宏观调节与长期增长

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改善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从长远看,这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既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盲目投资,经济增长率过低则导致生产能力过度闲置,它们都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都会使我们总体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发展的速度放慢。

这里需要着重认识的问题,体制改革本身可能引起经济波动,需要用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这种作用加以“抵消”,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放权让利”、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改革,加上许多市场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盲目性,导致了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而到了90年代下半叶,由于深化企业改革,控制银行坏账,职工下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导致信贷相对萎缩(“银行惜贷”),投资和消费增长率下降等一系列现象,引起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下滑。

所有这都不意味着改革“搞错了”或“搞多了”,相反,这些



改革都是必须进行、应该加速进行、深入进行的,只不过这些改革就其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来说,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旧体制改革了,新体制刚刚形成,发展到正常运转阶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经济的运行难免就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说,出现一些不稳定,其实可能正说明体制改革在深化,在向前推进,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不过以上的分析说明,那种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似是而非的。从长远看,当然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最终减少经济波动的程度(市场经济本身不能消除经济波动,也需要有宏观调控,只不过它比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波动小一点、效率高一些)。而就短期来看,体制改革不仅不一定会使经济稳定,相反,它本身可能就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生波动的一个原因。这不否定有些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对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在通货膨胀时期,改革银行体制、控制贷款增长;在通货紧缩时期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发展民营经济,等等,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新体制还比较弱小,难以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作用,两三年甚至四五年内还很难指望它们在宏观稳定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所能说明的,是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以抵消经济波动因素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以“熨平”经济波动;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更多一些,就更需要认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密切注视宏观经济的动向,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



经济能够平稳和持续地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是其他经济政策所不能替代的。

从另一方面看,实行宏观调节政策,丝毫不否定应该加速进行改革。二者应该并行不悖。宏观政策的作用只是对总供求关系进行一定的调节,根本起不到改革体制的作用,更不能替代改革政策。它只是在短期内抵消一些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而只有改革同时深入进行,才能尽快使新体制发展起来,使经济的不稳定性从根本上得以缩小。那种认为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就是否定改革必要性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下滑、通货紧缩,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因为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不得已而只能走改革的道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一般说来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正因如此,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肯定不利于旧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体制成分的成长)。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越下滑越好,根本“不用担心”,经济增长率再低也没有关系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了。中国经济不能不改革,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不增长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从长期看,比起5亿农民就业、9亿农村人口这样的大问题,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更何况经济持续下滑(近几年若不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经济不知已下滑到什么程度了),就业持续下降(还不仅是国企职工下岗),我们金融体制的问题、社会不稳定的问题都会迅速恶化,经济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经济学家如果可以不顾经济增长,那么就可以不要经济学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体制的成长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各种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都会出现,都需要认真加以对付。经过过去几年的调节,中国经济已经



开始摆脱通货紧缩,进入正常增长,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引起通货紧缩的因素都消失了,也不意味着不会再出现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央政府(宏观调节是中央政府的任务)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宏观政策的研究水平,提高宏观决策的及时性和正确性,逐步掌握对经济增长实行“微调”的“艺术”,尽可能地使经济不再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尽快地追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 续论：发展问题与经济学 其他问题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但是,要把各种问题解释清楚,又对总的经济趋势加以把握,我们必须运用经济学抽象分析的方法,首先分门别类地对它们加以深入的分析,然后才能进一步说明各种问题的相互影响。粗略地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门类:

一、体制改革问题。这在经济学中属于制度经济学及过渡经济学所分析的对象。我们的企业改革问题、政府改革问题、发展民营经济问题、金融改革问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由于体制改革问题充满了利益冲突,因此经济学分析这一类问题的工具还包括政治经济学。

二、经济发展问题。包括比较优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农村问题,等等。这在经济学中属于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中有增长理论,但发展问题又“大于”增长问题。因为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增长”,而且是要在比别人落后而且可能是“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快,因此这种



“穷国的增长”问题得专门通过研究落后国家特殊性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进行专门的研究。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包含体制改革和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经济学也适用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但不同的是,当前国际上所说的“体制转型”或“体制过渡”,特指的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而不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特殊性(只与蒙古、越南等国相比有共性),即我们既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 800 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像前苏东国家那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轨经济”,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我们两方面问题都得研究。

三、微观经济问题。包括相对价格、资源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行业规制、要素市场、反垄断,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主要由微观经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些经济学分支加以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中的微观问题,当然有其特点,得运用一般原理对特殊阶段的问题加以特别的分析。比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对于国家企业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首先是产权结构改革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管理结构的改变。而对于许多刚刚开始发展的私人小企业,恐怕“家族制”还最有效率,所谓“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对它们来说还是今后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些看上去不那么理想的公司形式,比如股份合作制,对于许多中小国有企业来说,恐怕是在那种特定条件下的最优的“体制转轨起步形式”,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它们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必然还会随着这方面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而演化。

四、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总需求、总供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失业率变动(但体制改革引起的“下岗”



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进口、出口需求、增长率波动,等等。宏观经济问题,名词很大,但所研究的问题不过就是“总供求平衡”、减少增长率波动这一“狭窄”的问题,“宏观”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指“总量”。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也有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的特色。比如由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存在,导致经济中对“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人们的需求行为)的反应敏感度较差,从而导致以前要进行“收缩”,主要就得靠“行政命令”、“砍投资项目”、“压缩贷款规模”(这也是行政手段而谈不上是什么货币政策);而前两年反通货紧缩、扩大需求,又只好靠财政扩张,都是有其特殊体制背景的。过去通货膨胀是由于体制上“预算款约束”,无限制供债投资,而后来的通货紧缩,则正是由于我们过去积累了太多的“坏账”,导致国有银行都不愿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贷款,都是与我们的特殊体制问题相关的。而私人部门投资不能扩大、体制限制、融资渠道不畅等体制问题,又不可能一两年内改好,短期内还得靠宏观扩张政策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危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又很容易导致政府负债过高、通货膨胀率过高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五、国际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国际问题”,这包含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即国际比较优势、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利用后发优势等等。而这里所说的国际经济问题则特指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些特殊的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制度、资本流动,等等。

如何进行“抽象地分析呢”?我想,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有对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较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只看到一类问题,甚至是只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一类问题,就否定其他



问题的存在。但即使没有这种“全面了解”，我们也不妨试着用下述的一些方法思考问题。比如，假定我们现在体制都改好了，都已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了，而如果你还是只有 800 美元的人均 GDP，你就还是会有那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反过来，假定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了，但如果我们还是计划体制，就还是得面临痛苦的体制改革（比如前苏联的情况）。再比如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再有我们过去的一些体制问题，但是看一看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仍然会有总量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大萧条”那样的经济波动。

在政策研讨的层面上，对各方面问题加以抽象分析的实际意义还在于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政策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比如，搞体制改革，不等于把长期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的问题放在一边而不顾。中国的问题，不发展、不增长，什么也解决不了。同样，搞宏观调控、搞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丝毫不否定要抓紧改革，二者从本质上说不是对立的。经济学有一个一般性的定律：有几个问题，一般就要有几个对策来加以处理，而不可能一个政策同时解决长期、短期中的几个问题。

我在前面的“十论”，主要是讨论发展战略问题的。以前我不愿意让人得出印象认为我只知道体制改革问题重要、宏观问题重要（因为我以前的文章更多地讨论那两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也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只认为发展问题重要，没有在这里讨论体制改革问题（这与发展问题一样属“长期”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这属于“短期”问题）。那是其他文章、专著中讨论的主题。我历来认为我们每位研究人员都应有自己的“专攻”，但“专攻”的基础应是对自己“专攻”对象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其





他“专攻对象”的相互关系,有一清晰的把握,从而不忽视、贬低其他的专攻对象、其他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太复杂了,经济学的体系太庞大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所有领域中是专家,因此也必须尊重其他专家的工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想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更加专业化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是每位专业化的研究人员都具有经济学体系的完整知识。



# 全球化与中国





##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扩大开放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的事件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教训与有益的结论呢？

我认为，此次事件使大家更加认识到发展经济、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论。但同时人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事件表明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经济学中“发展”的概念出发，进一步认识一下经济发展与经济开放的关系。

### 发展就是赶超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除了包含制度的变革以外，所谓“发展”的概念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展概念的核心是缩短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指落后国家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因为所谓“发展



“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来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存在是因为有发达国家与之相比较。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在它们当初经济进步的时候可以说只是经济增长，因为那时候它们走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前沿，在外部环境中没有比它们更发达、更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上“打压”它们，使它们难以成长，也没有一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用各种手段去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去占领他们的市场，包括用军事手段去统治它们。而这种在相对关系中定义的“发展”的概念就意味着，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在发展，不是以它自己今天和昨天的经济水平来比较，而是要用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来加以判断。这包括以下的一些含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必须用国际标准作为参照系，衡量自己，认识自己的落后，认识自己的问题；第二，发展中国家必须增长得更快才能实现发展，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别人的经济实力也在增长，如果你的增长速度比别人慢的话，到头来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三，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地努力，必须做比别人更多的事情，包括一些痛苦的事情，才能追上先进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赶超非得开放

而这一切恰恰表明：要发展，就必须开放，要加入到国际市场中去，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开放与改革一样，都是一件困难而痛苦的事情，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要到国际上去面



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挤压,甚至要冒让外国资本和产品过多占领本国市场的风险。但是只有开放,我们才能知道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参照系是什么,才能获得我们发展经济所需的产品、技术、资本、管理与市场,才能利用和吸取别人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多走捷径,一步一步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可以不开放,关起门来也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一些,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已经大大落后的国家,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长速度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会越来越大。在当今科技与市场飞速变化的世界上,关起门来绝对不是办法,因为那样做实现不了经济的发展,实现不了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的,相反到头来可能会再受人家的欺负。现在我们都议论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炮舰政策”在历史上就是用武力打开一国的国门。也就是说,你不早一点主动开放、发展经济,到头来却可能是被动挨打,被迫开放,被人侵略。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说到底其实是为了不再受别人的欺负,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发展,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进一步表明了这一逻辑。它使我们认识到发展的重要,其实也就是开放的重要。因此,这件事反倒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想强大我们还就非得开放,非得走向世界,用世界的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技术等等,来发展壮大我们自己。

我们过去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领域还没有对国内的非国有经济开放,结果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竞争力太弱,政府也自然不会对竞争市场加以管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对国内的开放,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更好地应付对国外的开放。



## 发展要有紧迫感

这次事件并没有提出发展经济的新方法,但是说明了我们加速发展的紧迫性。而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积极的教训正是应该面对国际形势的恶化,我们要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更积极地态度来看待我们的许多改革开放问题,要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观点来观察、判断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解放思想,敢从一些无谓的教条和争论中解脱出来,赶紧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掉、解决好。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越浪费时间,与别人的差距可能越大,我们越赶不上别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既要看到改革与开放引起的当前的阵痛,采取适当的防范、保护措施,又要看到长远的利益,积极进取。



## 中国“入世”：不会是“灾难”， 也不会是“奇迹”

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分析、计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时至今日，不仅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而且甚至没有什么让人较为满意的说法。这其实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入世的影响，太复杂、太多样，从任何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任何一个特殊的部门、特殊的范围、特殊的人群，观察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短期”（一至二年的时间段）来看，WTO 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似乎主要是积极的。首先是外国直接投资会增多。加入 WTO 使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信心加强。即使由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下降使得许多外国公司没必要到中国来生产也可以把东西卖到中国，但这种投资与贸易环境的改善还是可能使更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当做自己面对亚太市场以至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这种效果似乎已经开始显现。2000 年实现的外国直接投资 3 年以来首次有了一定的增长（0.5%），而协议投资也是 4 年下降之后一下子增长了 50%。这种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进出口



的增长。而在国内方面,国内的公司企业为迎接 WTO 的挑战所进行的改造和扩张,也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复苏。

从“中短期”看,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将面临加入 WTO 后必须进行的各种调整的挑战。这个“中短期”甚至可能不是 3—5 年,而是可能要有 5—10 年。不过,对于经济的不同部门、不同组成部分,这种挑战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WTO 是它们发展的新的机遇。一方面,民营企业历来注重盈利,因此他们绝大多数一直依靠的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多少“贪大求洋”的东西。民营企业体制上也比较灵活,调整起来较为容易。另一方面,一些过去不开放的部门,在对外国人开放的同时,也会开始对民营企业开放,所以,WTO 实际上意味着民营企业的新的发展。而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这些年用大量国家资金引进高新技术设备而搞起来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面临的挑战就会很大,因为它们事实上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相对优势。

制造业总的来说面临的调整压力较小,因为这些年来多数制造业已经对外、对内开放,外国资本早已进入,民营企业也有所发展,市场竞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多数企业已经有了一些应付竞争的能力。而相比之下,过去开放不多、保护较严密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而这次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主要焦点就是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服务业开放、而中国力争为服务业的成长保留一些空间。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那些新兴的、仍在高速成长的产业,总的来说压力较小,如电信业和保险业,对于这些产业来说,“谈判”的焦点在于如何“瓜分”市场,如何分享利润;而对于那些





已经有所发展的产业,则面临的调整压力就会较大,因为这时焦点的问题不是谁拥有多大的产权和分享多大的利润,而是可能会有多少人“下岗”。比如银行业,国有银行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如何削减冗员,提高效率,会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仔细想一想,以上这些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而需做出的调整,是中国即使不加入 WTO 也早晚要做的事情,WTO 只是使它们的进程加速了。有没有可能中国自己再发展几年再加入 WTO,所面临的挑战会轻松一些?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小。在科技革命、全球化,市场化的国际大趋势中,今天走得步子快一些,接受的挑战多一些,发展速度快一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小一些,明天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否则,几年后所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全球化进程本来就是谁较发达谁获益较多的过程,中国不赶快加入进去,就可能被“边缘化”。正因如此,从“长期”来看,加入 WTO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它进一步将中国“锁定”在改革与开放的道路上,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使中国有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希望。

最后,加入 WTO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也取决于今后几年中国人自己进行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进程,包括在 2001 年要进一步展开的各项改革,如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为民营企业扩展融资渠道、改革政府体制、减少政府干预,等等。

对于中国来说,加入 WTO 不会是“灾难”,但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本身并不能创造奇迹,一下子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在今后几十年中,逐步地加以解决,加入 WTO 只不过标志着这一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全球化、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面对全球化,我们应该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别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发展的问題。

这里首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其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是: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列强用武力占领殖民地和外国市场的情况不同,目前的全球化是一个自愿交易过程,而任何一个自愿交易过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必然双方都受益。但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双方受益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不同的。主要取决于交易双方所处的地位,自身的经济实力,国内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以及在交易中所处的优势和劣势。这是我们研究一切交易问题的基本的出发点。

全球化其实早已开始,只是现在速度更快一些。从基本上讲,当前的全球化是在信息革命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更加迅速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特别是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全球化进程中各个主体受益的多少,取决于其能否在这种要素的流动性当中受益。其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是可对流动要素和不可流动要素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显然,发达国家掌握着最可流动的



要素——资本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主要是不可流动的要素，如自然条件和劳动力。虽然“人才”是可以流动的，但一般的劳动力则基本上不允许流动，而人才向发达国家的流动在一定时期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脑力流失”。这些是最基本的差别。

其次，要研究的是“经济开放”是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体制的问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文等整个环境对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能否流入这些国家从而这些国家能否得益于全球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可以导致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开放、市场开放不等于就能加入全球化进程。例如：许多非洲国家市场非常开放，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几乎就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外资并没有大量的流入这些国家。其原因即这些国家的体制问题，包括国内教育，人员素质等其他要素条件和整个投资环境等等。目前亚洲某些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印尼，该国的市场非常开放。虽然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承认印尼金融市场的开放有些为时过早，但多数人仍坚持要保持这一开放程度。即便如此，印尼目前仍有在今后的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可能，因为它目前的情况很可能使外资避而远之。

再次，开放本身不等于能够受益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成正比，其中涉及到国内的体制问题。即该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是否能够承受全球化带来的风险，能否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多收益。这里涉及到一国的开放程度与其国内体制改革的相互兼容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当无法对内举债



时,只好去借外债。如泰国、韩国,国际游资进入该国家市场后造成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表面上很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的风险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积极扩大开放,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而且全球化是一个现实,你不加入它照样发生,你不加入只是使你被“边缘化”,越来越落后。第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加速国内改革,只有使国内的体制与国际更兼容,才能更多的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第三,由于国内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有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开放程度与国内改革与发展相适应、相兼容的问题,尤其在金融领域,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吸取,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要认真研究。

目前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应该更多地思考发展中国家所处地位的问题。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能够受益,但也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获益有可能少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与欧洲经济的良好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内的体制,另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例如,金融市场危机出现后,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较健全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加速改革,很好的反思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全球化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国内的体制改革,以便尽快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取得更大的利益。这当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 关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思考

##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问题和在 全球化中的脆弱性

### 引言：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的原因

许多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通过资本流入和技术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最稀有的资源如资本和技术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自由地流入，并与这些国家最富有的资源即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根据经济理论，这样一种运动会改变、或者说会更积极地改善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的结构，从而带来经济繁荣。

但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描述却变得相当不准确。这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未能从全球化中得到相应的好处，却反而承受贫困、社会不稳定、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尽管深入的分析能表明全球化虽然会使所有的人都获益，但贫富的差距却也可能扩大？为什么像全球化这样一件好事总是被发达国家的多国组织和政府所推崇，而发展中国家却通常以怀疑的或者是犹豫的态度来接受？



从根本上说，存在着一个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地位”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受国内体制、政策、知识等问题制约，使它们在国际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面前更具有脆弱性。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的流入、技术的转移和本地的劳动力，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能快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它不能快速带来（1）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2）市场管理能力（经验、知识等），而这两项对经济的繁荣和赶超同样重要。<sup>①</sup>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使得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在与国际市场上投机资本的冲击面前难以招架。而迄今为止的国际金融体系，又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本身既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也是加剧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着重分析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应如何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排斥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 改革与开放的“不协调性”问题

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仍选择尽早地开放金融部门和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将自己暴露在较高风险之中呢？其中的原因，

---

<sup>①</sup> 人们也许会提出许多其他因素，如教育。但是教育包含在这里讲到的如技术、劳动力、制度和管理能力这些因素之中。



首先是市场的自由化会带来多方面的收益；其次，对一些国家来说，当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时，金融自由化则会因其能够“掩盖问题”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 1. 以国内改革为基础的开放所能带来的效益

除了资本流入和技术转移之外，首先，由于人们需要外部压力迫使国内集团不得不进行改革，经济开放被认为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竞争和压力，便不会有本国增进效益以达到国际水准的动力。

其次，没有真正的市场参与者给市场“带来麻烦”，管理者便永远不能够增强其市场管理能力。对外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应该尽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学习，以便准备应付更有经验的市场参与者和更复杂的情况。

再次，考虑到金融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短期外债和证券投资。尽管对这些国家来说首要考虑的应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但若没有相应的短期贷款和市场短期投机，外国直接投资也很难按其应有的效率进行配置。而且，在一个不能通过开放的资本市场为投资提供一定资本流动性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也受到制约。

### 2. “早熟的金融开放”：幻觉与“掩盖问题的需要”

无论经济状况好还是经济状况坏都可能产生对开放过于大胆的做法。当经济景气时，似乎什么事情都容易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相信它们能够很快地具备作为国际市场参与者的资格。同时，当经济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容易获得金融投资，投资者更愿意进入这一市场。对于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商业



团体在内的多数人来说,如果不吸纳这些投资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东南亚一些国家今天发生的危机,与它当初的“被经济高涨冲昏头脑”,似乎是分不开的。

但这里我们要更加警惕的是:经济不景气会导致人们更深深地卷入风险市场当中。当贸易逆差上升,人们就要更多地对外借款;而证券投资也对一国有更大的吸引力。对许多人来说开放金融市场似乎是解决金融问题的一条捷径,因为这似乎是延缓“坏账”问题的一捷径。这反过来使人们误认为制度或政策的问题并不存在,或者说不是真的。他们会认为开放金融市场是解决制度上或政策中问题的一个途径,并由此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他们认为风险离他们很远,即便有负面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这种“问题引致的开放”是危机形成的主要来源,更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

全球金融市场资本过剩,也就是全球泡沫本身,也是导致过度开放的主要原因之一。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不断在新兴市场中寻找和开拓新的疆界,而这些国家也深深为基金和银行提供的资金所吸引。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而不管这些国家的实际条件如何。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这种推动不是以“我的利润”的名义进行的,而更多地是以“对你有好处的”说教方式进行的。由于这些外国人确实有市场经验,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接受他们的说教。一些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在他们谈论“市场优点”时并不提及国际投资银行有其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也从未警告人们经济开放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而只是在世界各地一个劲地喊“开放、开放、开放!”





### 3. 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外开放 和国内制度的不协调性

上述分析表明,亚洲危机真实的原因不是国内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是国内改革过程与开放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之间的不协调性问题。

在东南亚危机中,不同经济体制有其不同的特定成因。但在不同原因之中有一个共同问题,这就是国内制度改革和外部市场开放之间的不平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经历了金融市场中外国证券投资巨大的冲击,同时伴有国际对冲基金的“攻击”。韩国金融市场并不十分开放,但是韩国大财团和金融公司过度地暴露于国际金融市场,从而经历了短期外债的过度增加。香港是最自由的金融市场,但是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以及联系汇率制度下的货币高估等内部问题出现时,失衡也就产生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俄罗斯的特点是完全自由的资本外逃。俄罗斯最重要问题实际上不是“货币管制”问题,而是“资产外逃”问题,大量的本国资源的出口所获得的收益或利润很少汇回这个国家;所以,对它来说,如果不能在国内制度方面迅速建立起足够的信心,那么谈论“管制”,不应仅仅指“货币管制”,而应是“资本管制”甚至是“出口管制”。

更进一步,新兴市场经济的脆弱性还反映在,当泡沫破灭时,国际金融市场中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损失程度也是不等的。国际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能够迅速逃离,或者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方案”使其贷款得到支付,从而得到解救。甚至其中一些银行和对冲基金能够在市场下跌中赢钱,他们能准确地预测到,通过(一次次)攻击有问题的经济并且(一次次)将钱抽



走,这些市场必定下跌。而他们将这些攻击称做是对“揭露问题”做出贡献!

全球泡沫的破灭最终将在一定程度上殃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否则便不称其为“全球性的”。然而,严重的创伤或许可以通过良好的政策管理得以避免。目前美国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似乎很少,美联储也似乎比新兴市场经济的中央银行更有经验和更老练,能够快速地、技术性地和果断地做出反应,而不必顾及像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所受到的所谓“政府干预”和“挽救失败者”这类的批评。目前非常有可能的是,泡沫破裂的大部分代价会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而美国和欧洲会只得了好处而几乎不受什么损失。

## “协调的开放”

### 1. 发展中国家吸取的教训:平衡改革和开放

以上的问题似乎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经济政策的艺术”:你应该开放,但是考虑到你国内的改革和整体经济的发展,又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开放过度。

这一结论似乎并无实质内容,因为艺术本身是难以公式化的。但是这一结论确实告诉我们前些年的一种主导理念即“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开放”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不协调性”概念被以一种与我们的结论相反的途径来运用了,它通常被用于责备发展中国家改革太迟缓。人们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如果体制改革根本不可能更快地推进,必须经历一个时间过程,那么,



该受责备的就是“过度的开放”，因为正是后者造成了失衡、造成了“不协调性”。这种“不协调性”的概念，与过去人们所用的概念，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的差别。

## 2. 在危机面前必要的调整与“暂时的倒退”

如果上面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当那些过快地开放了的经济陷入危机时，应付危机的办法之一便是适当地降低开放的程度，也就是说，对金融市场活动施以某种“控制”。至少作为经济复苏以前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是必要的(Krugman, 1998)。

更具体地说，亚洲一些经济近来的一些经验或许在事实上有建设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意义。这些经验包括：

(1). 一些对市场风险管理准备还不充分的经济可以针对某些市场参加者制定市场准入限制，以避免他们与尚未准备好的本地公司进行竞争。（比如台湾最近拒绝了一些大的国际对冲基金在台进行扩展的要求。）

(2). 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难以应付市场投机和动荡的经济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的需要改变规则。（比如香港最近为了提高投机的成本和限制市场操纵而修订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3). 面临较为严重的国内问题的经济体可以对对外部门施行较多的控制，尤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便为经济复苏和重建赢得时间。（比如，在某种意义上，马来西亚最近对资本流动施行的管制措施是正确的，因为这反映了对经济复苏和调整的要求，尽管这种管制能否带来经济复苏和纠正内外不平衡，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实施。）

(4). 对于那些公司体制和市场体制尚不发展的经济来说，



需要对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对外借款活动施行更多的限制和监管（比如，我国在这方面不得不实行较多的限制，否则，一些不负责任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会使外债增加到危险的水平，就如“广信”等金融机构最近所暴露出来的债务问题那样。）。

当然人们会说：“施行更多的管制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对过度开放的倒退”的话，那么这种倒退便是一件好事。为使未来能够进一步的前进，这种倒退可能是必要的。例如，如果不对资本外逃进行控制的话，很难想像俄国经济会如此快速地好转。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认识到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都是关于（预期的）收益和与收益相伴的风险之间关系的平衡问题。如果风险过高便不值得追求高回报。损失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如果实行太多的管制，外国投资会减少；反过来，如果不进行管制，只是等待“市场自身的调整”，那会造成金融危机以及相伴随的资本外逃和本国资产的减少。面对这两种情形，人们应该根据自身特定的环境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在一些案例中，较多的管制带来较小的金融损失和更可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上述案例中的情形更能得到证明。

### 3. 教训：国内改革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全球金融泡沫”对发展中国家最首要的教训，当然不是要更谨慎地推行市场开放进程，而是加速其国内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看，正是我们的制度方面的缺陷使得我们的经济在全球性的市场投机面前表现出脆弱性，限制了我们从国际竞争中获取好处的能力。简而言之，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使我们的经济成



为全球泡沫中的“薄弱环节”，并首当其冲地受到泡沫破灭的冲击。如果不加速改革和从危机中复苏，“过度开放”之后不可避免的“暂时倒退”，还会成为“永久的倒退”。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谴责国际化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你都得加入进去，否则你将被“边缘化”，永久地处于落后的地位。同样，谴责其他市场参加者的不良动机、操纵和“阴谋”，也是无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己也成为平等的强者。危机为改革提供了机遇。现实中，只要能生存下去，很少有人情愿承受改革带来的痛苦。不景气时，选择机会少了，机会成本也少了，改革的可能性反倒更大了，人们会更多地同意进行改革。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制度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对政府、企业和银行部门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同时，这三个方面各自也都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在发展初期政府指导的增长和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扭曲。经济越发展、越成熟，这一扭曲的破坏性就越严重，改革的问题就越紧迫。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必须提上日程，也必须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的一个重要议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体系本身日益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就必须反映发展中国的现实与利益。这还不仅是一个诸如“监控资金流动”的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还是要对发展国家的开放过程、对其国内改革与市场开放的相互关系，有一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实和利益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规则的制定，打破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



## 奥运会申办成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大家都在谈论申办奥运会成功会对一个城市乃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时候,再考虑一下它对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第一,中国在 2008 年举办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首先从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来看。至少这 8 年和今后,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信心会增强。奥运会本身带来巨大的需求,会刺激经济的增长,这种前景会使国内外的投资者信心增加,这无疑对中国目前还未彻底消除的内需不足的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

第二方面,是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奥运会首先会涉及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还不仅仅是场馆建设,道路、交通、通讯等一系列环境的改善,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从发展阶段来讲,还处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投资的主要部分,即经济增长、需求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奥运会的契机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上一个台阶,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应该起到推动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朝着现代



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今年不仅有举办奥运会的消息,还有加入 WTO 的消息,而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是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WTO 是一套国际规则,奥运会也是一套国际规则,而且这是一个国际的盛会,要和国际上的各种机构、组织,以及一般的游客、一般的观众进行广泛的交往,因此使我们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也更加了解国际社会的各种规则,了解各国相互之间打交道的惯例和准则。这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促进我们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规则,都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对于国际规则,一方面我们首先要熟悉它、了解它、尊重它,一方面也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们,来为我们自己的发展服务。而这一过程显然会推动我们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要对各方面不符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不符合国际市场交往原则的做法,进行改进。我们本来就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而在举办奥运会的推动下,这种改革的阻力会相对小一些;同时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来进行这些改革要相对容易些,改革的环境要好一点。因此我的预见是在今后 8 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改革将会相对顺利一些,速度将会加快。这对中国经济更长期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受益最大的方面。

从国际经验来看,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比如日本当年举办奥运会(日本虽然不是发展中国家,但其经济当时正处于起飞阶段),韩国举办奥运会,都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的形成、经济的国际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信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 20 年后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再过 8 年就是改革开放 30 年,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举办奥运会,相信会对中国的长期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还认为,在高兴的同时,我们也要头脑冷静,看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预防。第一,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轨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仍然很强,有些方面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体制还没有进行很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防止问题的产生。比如奥运会要搞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让有限的资源、资金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防止政府投资、采购、花钱过程中出现浪费和腐败,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就赢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当务之急就要尽快改革我们的财会制度、投资体制、政府采购制度、各种监管制度、工程承包制度等等,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对这些行为的监督,不使奥运会的筹办阶段成为腐败滋生、腐败加剧的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国家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值得我们吸取。

第二,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当然就目前来看,通货膨胀还不是一个现实的危险,但是如果筹办奥运会加上其他因素,比如经济中还没有改革的一些因素共同起作用,那么在今后的8年中也说不定存在这样的危险,出现投资过热、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所以说,现在就要有这个警惕性。经济总是增长比较平稳一些较好,这样才能更少地浪费,既没有过热的消费也没有闲置的消费。现在我们处于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7.5%至8%的增长率,既没有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也正在停止,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下一步要密切监视宏观经济运行,及时采取各种“微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不要出现大问题后再去做大调整。

第三,现在恐怕就要提出防止高消费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需求不足,但是如果出现超越现实国情的高支出、高消费、高





工资,就会对将来整个经济的增长造成危害。国际上是有教训的。有的国家举办奥运会了,支出很大,收入很多,经济高增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个世界强国了,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结果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等也就都提了上去,这样一来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就高了。这时,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足够大的、在国际上真正有竞争力的高收益产业(如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事实上还需要依靠低成本因素(如包括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地价等等)在国际上竞争,高消费造成的成本提高就会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丧失竞争力。国际上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以防出现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人均 GDP 才 800 美元,我们还搞不起高消费,我们的整个科技能力和资本能力还不够强,还要靠我们低廉的成本因素在国际上占领市场,来提高我们的积累速度。所以千万不能形成高消费、高地价,资产价格膨胀,那样会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危害。

最后,面对一个较好的发展形势,面对申办奥运会成功这样一件“利好”消息,我们还要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出现新的问题,记取我们自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其他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曾经有过的历史教训,避免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长期稳定发展时期,借助举办奥运会的“东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资源与发展





## 人的局限仅在于他们自己

关于资源,自古至今、国内国外,总是有一些悲观的论调,总是有人在叫嚷“资源枯竭”,预见人类将停止增长,或者叫做“发展不可持续”。每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上涨,比如最近的石油价格上涨,就总会有些“智者”大谈资源枯竭。但是,同样是自古至今、国内国外,人类总也没有停止增长,资源总也没有枯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会如此。我对此毫不怀疑。那些悲观主义者为什么是错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忘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所谓资源,其实本来就是由技术进步而形成的。远古时代,钻木取火,石刀石犁,只有土地和石头是资源,铁矿、煤炭、石油之类都是外在之物,不成为人类所称做的“资源”。原子能成为人的资源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而月球上的东西能否成为我们的资源还有待未来的技术进步。但正是技术进步,一方面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另一方面使人们可以少用一些资源而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或者反过来,以同等的资源获得更大的满足。那种把现有人类已知资源当成人类“极限”的所谓分析,包括那个“罗马俱乐部”当年那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当然只会是悲观的,而人类的不断创新,其实就是在不断突破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极限,当然也就不断地打破着那



些悲观论者的“伟大预言”(他们总会为有人听自己的预言而暗自窃喜,却从未为自己预言的失败而向我们道歉)。

悲观论者“忘记”的第二件事情是人类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源配置机制的能力。由于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不断地想追求新的享受、新的满足(从不听那些悲观论者要人们回到远古时代去像个低级动物一样吃了就睡地过所谓的“回归自然”的简单生活的“伟大忠告”),所以资源总是稀缺的。于是人们发明出一套市场机制,一方面用价格的差异鼓励人们更节约地使用现有资源,另一方面用利润动机鼓励人们发明创造,开发新的资源,总之是不断在增长着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求得某种均衡。曾经有人在国际上悲观地鼓吹“人类不久会发生粮食危机”,以及“谁来养活中国”,而这种人在忘记了许多事情(包括历史和现实的许多事情)的同时,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市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过去40年,粮食的市场价格(相对价格)是因供大于求而不断下降的,结果导致一方面消费需求因价格低而增大,另一方面各国的农业政策都是限制粮食生产;而一旦发生需求扩大,价格自然会上涨,导致供给因生产能力的更充分利用而增加,还是会有供求的平衡。历史不是从来如此吗?

其实,人类真正的局限是在他们自己。真正可怕的不是资源枯竭,而是人类因种种原因采取了错误的体制(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的,道理都是一样)。如果一种体制导致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的利益冲突,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与无效率(其原因之一就是可能是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浪费了不心痛),导致人们缺乏创新的激励从而缺少创新,无论是体制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那才是真正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发展到严重的程度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结论就是：仅仅从“物”的角度谈论资源问题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社会机制，在于体制是否能提供给人正确的动机与约束，在于我们是否“人为”地把自己陷在一种错误的、只会导致资源浪费而不能导致技术创新的体制安排当中而迟迟不能改革。要改变的并不是人们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欲望，而只是资源配置的社会方式。



## “文明批判”的批判

——关于发展私人轿车的思考

《光明日报》所载郑也夫的《轿车的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辩的欲望，引得我也想来讨论一下“轿车文明”这个东西，以及在轿车这一现象背后更重要的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

### 文明的魅力

郑文的第一个论点是人们现在买私车主要是为了“炫耀”，其实，私人轿车，像其他种种私人消费品一样，绝不仅仅是（请注意，我这里没有完全否定）因为它能提供“炫耀的满足”——私车能提供一些公共汽车、公家车、出租车所不能提供的特殊享受。首先一个区别是私人轿车是你自己开的，它就满足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有的要驾驭一些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或借助机械扩展自己能力的欲望。其次，有一辆自己可随时自由支配的车放在门外，你可以不必担心赶班车晚了点、叫出租车叫不到；自己开车东奔西跑，不是坐“公车”，你可以不去考虑司机的麻烦；与自行车相比，你不必每天骑几小时的车，回到家筋疲力尽，书都读不进去；



有了一辆车,等于是有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移动的空间,你可以不必担心大包小包地去挤公共汽车、挤火车、挤飞机,郊游的时候可以瓶瓶罐罐地带上一大堆;轿车使我们的空间与地理的概念发生根本的改变,可以使我们选择住在空气清新的郊外,选择去更远的地方度假,选择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听音乐会。

总之,轿车或“私车”的确是一种“文明”,给人以特殊的享受。我想正是这个基本的原因导致了汽车市场的扩大,导致对汽车需求的增加;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原因使人们一方面在不断提出对汽车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扩大着汽车的生产与消费。我想这是人类的基本矛盾之一:他不仅要一种享受,而是要多种的享受,既要清洁的空气、畅通的道路,又想要享受汽车所能提供的一切文明。这种每个人内在的矛盾,会扩展成为某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集团之所以各自都有一些号召力,谁也难以把对方真的压下去,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爱着冲突的双方。鼓励私人购车意味着交通拥挤、停车无处、环境污染、汽油费提高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够、是否应该制止人们追求新的享受的欲望,是否应该让人类永远停留在“自行车的王国”或永远在公共汽车上奔波,永远让我们停留在批判轿车文明的人们所留恋万分的“旧大陆”或“落后的东方”。

你不能制止人们追求一种文明。

## 发展的极限?

人类不断追求新的享受,但会遇到资源条件的限制。“增长



的极限”这个词曾是世界上一个极其权威的研究机构的一批极其权威的研究人员写的一本极其权威的的书的书名。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关于能源枯竭的“世界末日”式的警世箴言就不曾绝于人耳。但也有人论证过,人类这几百年的发展,不仅不曾遇到过极限,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产品数量,不是少了,而是在不断增多;能源的相对价格不是在上涨而是在下降;人类活得不是更糟,而总是活得更好。

“极限派”忽视的一件事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开拓新的疆界、新的空间、新的资源。铁矿原本对人类来说只是废石,后来有了冶铁术,它才成了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倒退几百年,谁能想像到人类会用核能发电?甚至不会想到石油、天然气会成为人类在一定时期的主要能源。技术进一步发展,现在的废石头可能被用来织布,打桶井水倒进“油箱”就能开起拖拉机耕地,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月球、火星上的东西现在当然不属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资源(资源这个概念不是指自然存在的一切,而只是指自然界中那一部分能被我们人类利用的东西),但说不定哪天我们人类会建立起“飞船货运公司”每天从月球上往回拉东西烧火做饭、炼铁发电,就像现在日本人每天从澳大利亚用船往回拉铁矿炼钢一样;或者,建立起“星际移民局”每天给一定数量的人类发“绿卡”去月球上定居,同时在月球上修三环路、四环路、“月亮庄小区”(那时候或许会有“郑也夫八世”批判“飞船文明”)。就像凡尔纳小说中的事情若干年后许多都成为现实一样,我这里不是仅仅在说神话。至少,这种乐观的设想与“发展极限”式的悲观设想一样可以获得逻辑与历史的同等支持。这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或潜在地拥有的,不会仅仅是目前我们知道的那点资源、那点疆





界、那些技术能力和那种生活方式。

现在让我们反过头来谈谈逻辑。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拓展自己的疆界?说到底无非就是为了追求新的享受、新的满足、新的“文明”,今天想出这样一种文明来享受,明天想出那样一种文明来享受,生活才不至于停滞。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物质不能无中生有,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是消耗能源、占用空间的。若给定技术从而给定人类可利用的资源,用于这种享受的多了,用于另一种享受的就必然少些;一种享受可能还损害另一种享受,现有的资源会趋于减少,于是逼得不想降低生活水平的人类去发明新的技术,开发新的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开发的科学技术只有在旧资源逐步减少而人类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时,才变得“值得”、“合算”、才会被实际地应用,也才会有人花精力、花资金去进行有关的研究。即使科学的进步在历史上有时是吃喝不愁的贵族探索真理的结果,但科学转化为实用技术,应用于生产活动,一定与需要的增长相关联,有些新的原材料(包括能源),开始时造价比现有的原材料贵,不能被实际采用;但随着现有原材料供给减少、价格提高,替代物便逐步变得合算起来,同时生产新的替代物的成本也在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下降,最终使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遍地是草木、随手拖些回来就可以生火做饭取暖的时代,到地底下去挖煤显然太贵了,更不用说要钻几千英尺到地底下找石油,那时候即使有了那个技术,也不会被广泛应用,只是到了后来,在地上找草木所需花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大,“挖地三尺”才成为合理的、经济的选择。现在核能已经变成有实用价值的能源了,科学技术实际已经能把许多东西变成能源,包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只是现在说说而已)的水和空气,只是它们现在还太贵,现有



的能源还太便宜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极限不是外在世界或自然资源,而只是他自己。

## 人性的悖论

现在让我们集中地来谈一谈“空间的拥挤”问题,这更直接地关系到人类为什么要发展汽车,什么是“符合人性的道路”。

如果假定人类不能离开这个地球,那么我们就得假定有一种“资源”是绝对有限的,那就是空间。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使人类生活空间出现紧张,首先是人口增长。即使假定每个人的生活面积不变,生活质量不变,饮食结构不变,人口的增长本身导致拥挤,使得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土地用于居住和道路。200 人的一个村子只需修 100 米的路,人口增长到 500 人至少要修 200 米的路。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与人交往的空间距离随之扩大,所需时间也会增加,以前用 10 分钟可以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现在得用 20 分钟,于是产生了如何加快交通速度以节省交往时间的问题。这就需要改进交通工具。可见,人口增长这件事本身引起了路与车的共同发展与相互冲突。而这一对矛盾根源于人口规模与生存空间的矛盾。所以,在讨论路与车的矛盾时,我们得首先讨论人口问题——你能否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人口太多了,地球太挤了,这个事实逼着我们去改善技术,进行新的开拓。但我们已不可能再回到人烟稀少毫无交通堵塞的时代,不可能再回到批判家们万般留恋的“旧大陆”,那样会“侵犯人权”——新增加的人口也要有一份属于他的生存空间。纽约市在 1907 年马车时速 6 公里,现在汽车时速也是 6



公里,即使这是真的,首先也是因为现在纽约的人口更多了,而不是车多了。

第二个基本因素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的人类(现在可以假定人口数量不变)生活质量的改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不再满足一辈子在一个村子里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多种多样物质产品的享受又促使人们突破一个村子里资源条件的局限而向外伸展,开拓更多的资源与市场。物质享受越多,所需付出的时间精力越多,活动空间也需要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在时间上显得越是忙碌、社会在空间上越是显得拥挤、越是要有更快的交通工具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相互交往的基本原因(这也是总会有人批判人类物质进步或物质文明包括汽车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因)。于是,在讨论人与车、车与路的矛盾之前,我们似乎还得讨论一下:你是否能阻止人类其他各方面生活质量的改善?这里“其他方面”指的是除了“拥有私车”之外的各种生活享受。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种人类的新享受都会需要更多的空间;而人类又不得不接受空间有限的事实。“拥有私车”,在“私车”里享受在公共汽车里或自行车上享受不到的那些乐趣,不过是在人类逐步发展起来的享受当中的一项新享受罢了,它当然也需要占用空间。

当然,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人类也在不断改善和利用新的交通工具以缓解空间的拥挤。另外许多方面的努力也都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比如电话、电报、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就是为了减少人们在空间中的运动;粮食高产技术的改进则可以节省耕地、“腾出”更多的空间干别的,包括供人跑路,或者反过来,因为不得不用更多的空间来跑路而改进技术在单位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实现吃饭的文明)。但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就



在于：她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追求本身会遇到时间、空间、各种资源的限制，于是人们也就不断地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难题、更大的麻烦，于是又要花力气发展自己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麻烦。人类社会“发展”或“进步”的真谛不过如此（关于进步“这一概念的涵义，已经引发了许多有意思的争论，本文其实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笔者认为轿车文明这个问题的值得讨论的原因之一）。人不过就是这么一种不断为自己制造麻烦又不断想办法去解决麻烦的动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轿车文明，相当于否定人类本身。我们是否真的要这样做？我们是否真的要用我们追求一种文明所创造出来的麻烦、所遇到的问题来否定我们人类不断追求新的文明的天性？有一个故事，说有一老人，穿些最基本的衣服、吃些最基本的东西，每天坐在海边晒太阳。一位少年问他为什么不出海捕鱼，老人问为什么？少年说捕了鱼可以卖钱；卖了钱又为什么？卖了钱可以盖大房子、盖大花园；盖了大房子、大花园又为什么？少年语塞，最后的结论是住在大房子里、坐在大花园中可以更舒服地晒太阳。于是老人问：我们现在就晒太阳，费了半天劲，换成那种方式晒太阳，值得吗？我想我们关于轿车文明以及一切其他物质文明的讨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个“晒太阳”的问题，甚至可以更加简单：人都是要死的，为什么现在不死？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人类历史，人生不过是一场骗局，人类都是一群傻冒，只有那些清静无为的道士和海边的那位老人，才是真正“看破红尘”的智者。郑也夫等等是否真的希望我们大家每天都只是坐在墙根晒太阳？其实，一切关于人类在变成物质文明奴隶的说法，一切关于技术越进步，人类越忙碌、生活空间越小、交通越拥挤的说教，都只看破了“一半红尘”，而没有看破全部：绝大多数人类



的成员都平凡得很，不会听从这种说教，而会按他们的本性行事，还是要不断追求新的享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刺激，同时要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难题，以此来填充“空虚的人生”，以此来与那些吃饱了无所事事或只知道吃饱了是一种满足、吃饱了就不再追求别的享受、也就没有那么多新的难题要来解决的其他动物种类区别开来。

结果，我们发现：一切对“文明”的批判，最终的结果都是导致对人类本性的批判，都是要改变人类的类人本质本身。这是人类当中的一小部分人，即所谓的智者、贤达、精英在历史上不断从事的一种“悲壮”的努力。而他们用以填充人生意义并以此与其他同类相区别的，正是这种教导其他同类改变自己本性的那种伟大企图。我想这是一切“富于忧患意识”的人骨子里潜在地有的那么一种内在冲动。

现在一个更时髦的说法是：批判轿车文明，是要另一种文明，或是“返回东方文明”，或是走向新的所谓“绿色文明”。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东方文明”的优越性，但也都知道它迄今为止是与物质生产的落后相联系的，因此只对物质已经发展了之后想要“返”朴“归”真者吸引力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俗人们还很难到达那个境界（少数智者当然除外）。再来看所谓“绿色文明”。有人建议我们可以跳过汽车的“黑色文明”，直接进入“绿色文明”的阶段。但是第一，我不认为他们提出的仅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文明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说服人们不再追求汽车文明，因为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并没有一种更高级的享受去替代一个较低级的享受（比如像第五代电脑取代第一代计算器那样），不具有“进步性”，而只是要抑制人们对一种新享受的追求，这不符合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性。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个真正具有进步性的替代汽车的方案问世,但现在还没有,在此之前我想“轿车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会产生各种问题。其次,真正的所谓“绿色文明”在目前是一种“更贵”的文明。我曾有幸应邀到美国的一个大资本家(不是一般的大,而是最大的之一)的第二代亲属的庄园中度周末。那是一个很大庄园,一个角开辟出来种地,种谷物的大片地是用作喂马的,另一些地是主人自己种菜的园子,总也有十几亩。他们十分得意地对我说,我们从不买超级市场上的菜吃,因为那有化肥;我们吃的都是自己来种;在我们的庄园里,我们从不开车,连自行车也不骑,要去后山办事都是骑马。多么令人神往的“绿色文明”!我也很愿如此地享受。但是我享受得起吗?我们能不使用化肥来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非洲灾民的问题吗?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能使人们纯朴的“绿色食品”更加便宜吗?我们能像当今世界上的贵族那样惬意地保持着“马背上的文明”吗?

## 选择的理性

经济学相信这世上的人们会在自己的各种需要、各种享受、各种代价之间,做出理智的权衡。首先,作为一个人,一个具有起码智力的普通人,他能够对一定的路况条件下究竟是步行更快、骑马骑自行车更快、坐地铁更快、还是坐汽车更快做出判断和选择;能够在坐公共汽车更快更省,还是坐出租车更快更省,还是自己买私车更快更省之间做选择;能够在把自己的钱用来买私车(以及交他应该交的那份养路费、修路费)享受那份特殊



的满足还是用于其他各种享受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是住在城里步行上班，还是住在郊外开车上班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我相信有了汽车之后，人类社会中经常地、不时地会发生交通堵塞现象，我们每个人都吃过这样的苦头，但我不信要是天天堵车人们还会开车或坐车。福芒德所说的波士顿我曾经住过近两年，几乎到哪里都开车，但每次要到市中心去，也就是要到那个波士顿广场去，我却绝不会开车，一定是乘地铁，甚至骑自行车，真不知为什么福芒德非得假定人会那么傻都要开着汽车去广场自找没趣？为什么要设想出这么一个开全体并不傻的波士顿居民大玩笑的主意来做自己的论据。所谓路与车相辅相成的道理，正是人们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道路畅通，人们就会多买车；然而路上越来越挤，买车的人会趋于减少；如果没有修路，最后路上车辆的数目会停止增加，拥挤状况会稳定在某一临界点上，直到新的路修起来，人们又会买车，既不会有完全“窒息的交通”（真是那样一定会有人退出），也不会有永远的畅通。很多人都向往那种出门就上班的小城市以至小村庄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但又有那么多人不愿住在小城市、小村庄，非得往拥挤、污染、嘈杂的大城市挤，他们都是傻子？那大城市一定能提供某些另外的吸引人的东西，足以补偿诸多不便给这些人所造成的痛苦，至少是为那些对大城市中某些东西有特殊偏好的人，提供了某种补偿，不然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死磕”？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一定也是理性的，因为如果整体的结果是所谓“非理性的”，理性的个体会“退出”那个整体另辟蹊径。

人类作为整体出现所谓“非理性的结果”，一定不是由于人们追求享受，而是因为人类相互交往的制度上存在着问题，抑制了人们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比如“不能退出”），或是阻碍了资



源向人们选择的用途上合理地配置以满足各种需要,或是阻碍了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要求,或是阻碍了整体能够在充分的公共选择基础上做出使得各种群体的利益能够相互平衡的决策。只要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社会机制,那么,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物质资源、空间条件下,在一个城市中,各种交通方式:骑车、坐公共汽车、打的、开私车等等,作为交通方式本身所能达到的快速程度会仅仅与使用者付费的多少和偏好的状况成正比。具体地说,有了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资源少、经济规律较为落后的国家里,人们目前选择的结果一定是自行车较多、公共交通较多,而私人轿车相对较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私人轿车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都会逐步地有所提高。这里所谓“适当的社会机制”,既包括使公众得以表达自己偏好的民主选择机制,也包括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一个有效而廉洁的行政机构来贯彻公众的决议等等。汽车、道路、公共交通等等,正如郑也夫文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公共系统”,这需要由公众参与决策。如果多数人投票禁止一个城市里人们拥有私车,我们便应尊重这一建议选择,反之则反是。世界上某些国家公共交通系统的衰落并不是由于私人轿车发展的结果,而只是因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好的、能平衡各种利益与需要的公共选择制度。像日本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私人轿车的增加与公共交通系统不断完善并行不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机制使人们真的能对各种交通方式、对各种交通工具(自行车、小轿车、公共汽车)、对各类交通设施(公路、地铁等)的发展、对同一地段上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规则(步行街、汽车禁驶街等等)等等,充分地进行讨论,找到那





种能够与人群整体的需要结构和他们目前所面临的资源限制相适应的理性决策。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告诉别人怎么活着,不是批判人们追求一种文明,该用这种交通工具而不用另一种交通工具而是进行改革与创新,建立起一种使不同的人都能自由去选择交通工具并使各种交通工具在交通这一目标上达到的效果相互平衡的社会机制。人能做的是改善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改变社会机制,而不是改变人的本性。

在一个有效的民主选择机制中,“学者”起什么作用?学者的本职是传播知识、提示问题、沟通信息,使人们在自由选择中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与足够的知识,清楚地理解每一种选择的各种可能的后果。郑也夫文章的功绩就在于他把发展私人汽车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和一些相关的事实提示和分析给大家看,而本文可能的贡献则在于把另一些问题、另一种思维方法提示给大家看,让人们在选择中充分考虑各种“说法”。但学者的职能不是代替人们做出选择,更不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甚至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偏好。其实从一般情况看,学者也做不到这一点。学者只能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但改变不了“人性”,改变不了人们在一定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下的偏好结构与利益结构。

## 平等的权利

以上我们基本上是把人类当作一个“共同体”来对待,假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假定人类社会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现在让



我们更现实一点,讨论一下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权利平等相关的问题。

郑也夫反对在中国发展私人轿车,但不知他想过没有,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交通拥挤,并不是由“私人轿车”过多造成的,而是由“公家轿车”过多造成的。中国今天的轿车工业,基本上还是面对“公家买主”而服务的。这两年刚刚开始有一些私人公司、三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他们的老板和雇员加入购车行列,但迄今为止,中国轿车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基本上由“公款”的多少决定,由国家“控办”对国有单位管得严不严所决定(所以汽车工业集团总是加入“反对控办”的大合唱,也就是“公款购车光荣”的大合唱)。正因如此,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穷国,人均GNP排在全世界100位以后(现在有算法上的争议),前些年发展的轿车,大多数都是豪华型。这是我们这个有问题的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你反对发展私车。私车少了,公车却并不会因此而减少,相反,路上空了,会有更多的公车。各单位要是把公车交出来办出租车业,既提高了汽车的利用率,又能减少街上的汽车数量,但现在却根本做不到。我倒是想,街上的私车要是多了,再拥挤一点,反倒有可能逼着大家想办法减少公车,那些一个劲买公车的单位也会少一点热情。有公车可坐的人,不必“发展私车”,他们还会起劲地反对发展私车,以保持道路的畅通、油价的便宜、空气的清洁,使他们更好地享受轿车的文明。这是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是否会使那不合理的体制反倒得到巩固?无论从制度改革还是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说,发展“私车”都要比发展“公车”健康得多、合理得多、有益得多。

还有一个集团是“反对私车”的运动拿它无可奈何的,那就



是富人。限制私人购车,除了用行政手段控制,加大一些非经济障碍之外,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维持汽车的高价,或者只生产高价车,使更多的人买不起。谁会买不起呢?显然是穷人而已。因此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在批判“轿车文明”的同时,维持“轿车不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前提下使大家尽量更平等一些,而不是多一限制导致更不平等。普通工薪族若能开上最廉价的微型车,与那些奔驰 600、“大卡”、“富豪”车相比,无论就车的质量与舒适程度而论绝无平等可言,但当他与他们在二环路上并驾齐驱(反正他们也无法开得更快)、在风雨交加时同样有遮有盖的时候,他多少还会有一种“平等感”,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类”。反对发展私车,但又不能限制有钱的人有轿车可坐,有车族与无车族的差别只会越来越大,会使多数人永远处在自行车的座子上遥望越来越豪华的轿车在高速路上飞驰。当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 T 型车,卖到 350 美元一辆,不仅是解决了一个交通工具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一个社会平等的问题,从此后穷人与富人的差别不再是有车与无车的差别,而只是车好与车坏的差别,大家平等地享受或平等地拥挤。“有私车”的确具有某种“炫耀”的功能,但其实有的人拼命攒钱买车有时不是为了炫耀其富有,而只是为了表示他不再没有。当你不能也不该阻止富人拥有私车以私车炫耀其富有的时候,你要想使其炫耀失去意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穷人也都有车。学者的一大社会职责是为穷者、为弱者呼吁,而不是维护富者的特权;而帮助穷者、缩小差别的最好办法,不是压制富有(这不仅办不到,而且也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是要尽量使穷者获得平等的权利。



## 落后的悲哀

还有穷国面对富国的问题。我们当然尊重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关于汽车的忠告。它们毕竟是“过来人”。但即使完全出于善意,也有一点可能存在的偏颇值得我们警惕: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这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收入的提高、文明水平的提高,直到发展到今天要返朴归真追求绿色文明,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汽车、轿车的发展,包括公路建设、与汽车相关的各种上游与下游的工业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各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依赖性”当然有汽车工业利益集团的夸大其词之处,但这个利益集团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财力去游说政客、游说民众,毕竟还是因为经济增长本身的确与人们对私车的需求有密切的联系。现在让我们不发展汽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只有一种理由能使我信服,那就是指出我们这个落后的穷国现在可以不再发展汽车,而是直接跳过汽车工业阶段,去发展另一种机械类工业(比如“飞船”工业之类),就可以支撑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长、收入的增长,逐步赶上富国(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如果指不出这样一种可供替代的产业,就总会让人怀疑你是要我们永远处在自行车、驴车的落后国家的行列而看着你们富国在那里继续大开其车,并使我们继续处在处处受富国利用其优势占我们便宜的境地。

发达国家现在开始“返朴归真”,已到了组成“无汽车城市俱乐部”的地步,轿车市场开始萎缩。于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将听到一个动听的“二重唱”:一方面是悲天悯人的外国学者告诫



我们汽车会带来何等的祸害，让我们只发展公共交通；另一方面则是垂涎三尺的外国汽车商的美丽的广告宣传，让我们买他们的小轿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是听了学者的话，只发展公共汽车，倒是正中外国汽车商的下怀，因为他们多年发展起来的“长项”，正是轿车，他们现在开始要过剩的，也正是轿车，正可以大举占领中国的轿车市场。而我们的市场却并不会因有人不鼓励私人拥有轿车而萎缩，公款购车的需求还会增长、富人购车仍不在乎价格高低，最终的结果只是把这个市场永久地拱手让与他人。一个不具规模的汽车工业是难以有效益发展起来的，而一个落后国家的汽车工业若不先在国内有所发展是很难走向世界的。汽车在西方也许已经有了“夕阳工业”的征兆，但我们要是过早地使它在我们东方夕阳西下，那它反倒会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继续“旭日东升”——我们无论如何仍在扩大着的市场反而会延长它们的寿命！

最让人听不进去的是那种我们东方的增长正耗尽地球上的能源及其他资源的论调。我之所以就汽车问题谈了这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近刚由一个国外朋友告知，在西方一家主要报纸上最近登载了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文章，说是中国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继续高增长下去，几年后对粮食的增长会大大增加，导致世界粮食市场的短缺，引起谷价上涨，天下灾民增多。这种“资源极限”理论不能不说已经有了鲜明的利益冲突的味道了，它等于在说：你们的发展，正在妨碍我们的生活！分明是发达国家通过控制粮食产量来维持粮价、维持本国农民的收入，发达国家在消耗世界70%以上的能源，却说我们的发展会造成世界粮食的短缺，我们发展汽车工业会耗尽地球上的能源。分明是他们的高消费把油价抬上去的，现在却想



方设法让我们为他们省油！其实他们真正要说的是：你们不要发展，让我们保持现在的享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博爱的天堂里，而是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别人在与我们竞争着人类能够拥有每一片资源。这不能不让人警惕一切有意无意的叵测居心。

发展轿车工业，鼓励私人买车，并不是要否定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优先地位。正如前面所说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在我们这样一个 12 亿人口的穷国发展交通，都应该将优先地铁、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作为我们自己的理性选择。人们其实正在做出这样的选择。自行车已经充分发展了（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反倒已经由于人人有车、市场饱和而遇到了发展的极限），出租车正方兴未艾，在都市都在修地铁，公共汽车正在重振旗鼓。我们毕竟是一个穷国，从整体上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穷人，我们支付不起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路、那么多的油，因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我们惟一的出路。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什么要批判“轿车文明”，为什么就不能同时鼓励私人购车？当然，这里的“鼓励”，不等于要过早地搞什么“购车信贷”、降低养路费、降低购置税、降低消费税。汽车工业集团不自己想办法用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提高质量的办法促销，而是拼命游说搞“购车信贷”、降低那些与修路相关、与社会平等相关的税费，是一种典型的带有利益偏见的做法。这里的鼓励，只是鼓励人们在已经支付得起的条件下把私车作为一种消费的选择，而不是再设置新的障碍去“不鼓励”人们买私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没有新的替代物之前，甚至还需要汽车作为一种个人消费的“大件目标”来起作用，使我们这个落后国家的经济



增长不过早失去必要的消费激励。

“私车”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轿车文明”不能靠一个“新的交通蓝图”来加以批判，而是要放在社会与经济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



## 买车与开车:为资源付费

话题是从城市限制经济型车的现象引起的。我认为,限制经济型车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从经济、环保、社会公平等各个角度来看,都应该采取向经济型车倾斜的政策,国际上只听说有限制排气量大的车,而不是相反,因此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事简直就是“反动”。但是,国内的经济型车确实需要改进,经济型车不等于技术水平低下的次等车,在污染、耗油等面一大堆问题。一方面国家要鼓励经济型车消费,一方面生产厂家要拿出技术上符合要求的经济型车。这样才能使经济型车的生产和消费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限制经济型车的现象使得汽车消费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对此,我认为应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国家一定要发展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工业,还要鼓励老百姓买车、用车,充分享受汽车文明。但与此同时,要分清“买车”和“用车”是两个概念。买车只是拥有一件物品,如同拥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一样;而用车则是一个社会过程,要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如占路、占空间、排废气等,这些都要有成本,都要靠公共财政支持,理应从用车人身上出,在只有少数人开车的情况下,就更得直接从用车人身上出,而不能让不





开车的大众为此付费。所以用车人一定要对这些付出应有的费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公共资源相对紧张的国家里。如果费用收不上来,路就修不了,车在哪儿开?环境也得不到治理,汽车工业也无法实现良性发展循环。

不仅路和车有一个平衡发展的的问题,公交和私车也有一个平衡关系。目前在城市建设中首要的事情应是发展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交通,发展中国家更应如此。在日、美等发达国家几乎家家有车,人们上下班却宁愿乘公交车,因为这样更经济,更高效率、更不浪费资源。交通是一个大系统,必须做到地上公交、私车、地铁、轻轨交通等平衡发展,才能有利于汽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不赞成那种如果让汽车工业发展、让汽车市场扩大,就要让政府降低收费的观点。我认为,费用收得还不够。当然我也反对许多地方政府巧立名目的乱收费,认为应该好好理清政府的各项收费是否合理,研究收上来的费用是否有效地运用到了交通上,但不能简单地一说鼓励汽车消费就是要减少收费。但是将来买得起车的人如果想用车,就不能怕贵,这符合经济学的道理。中国汽车贵主要还是汽车工业自己的问题,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成本太贵,不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而是怪这怪那,是转移视线。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要对外国开放为理由,说少收费是为了与外国厂家竞争。汽车市场开放了,外国车进来,政府对购车人收的税费是一样的,竞争的部分还是你那个车的成本!

我承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说要有一个私人购车的“高潮”,因为高潮过后必定产生波动、出现低潮。别指望高潮会带来更快的发展。私人购车市场最好能平稳地扩大、逐步地增长。人



们的收入水平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逐步提高的。影响汽车消费的瓶颈很多,并不是解决了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希望国家的政策和媒体宣传要积极引导私车消费,而不能过分造势。汽车工业自身要做的是尽快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形成规模、搞好结构调整,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在外部环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



# 农业与农村





## 超越农业与超越国界

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去年以来日益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为什么我国的粮食生产近年来出现了不稳定以至相对下降的趋势?人们找出了许多原因,如农业投入不足,农产品价格相对过低,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从长远和经济整体以至国际市场的角度思考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与对策,而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在狭小的范围内论农业。

### 农业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回报率过低

在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上,当然首先是指政府对农业投资不足,但从长期看还在于农民本身对农业的投入增长缓慢。近年来随着家庭农业的发展,财政资源的缺乏,农业投资的主体目前已越来越由农民自己承担。近几年农业总投资,大体上农户投资占60%,地方社区经济占20%,政府投资占20%。要使政府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或增加农业投入的主体,目前已不大可能。因此,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从长期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本身对农业的投入过低(我们后面再集中分析政府投入不中的问题)。



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农民对农业投入过低,其原因都是因为农业的收入相对过低,农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或机会成本太大。从农民的角度看,一方面,务农的收入低,就没有能力进行资本积累,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另一方面,农业收入低,农民也就缺乏向农业投资的经济激励。这些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大部分不是用于盖房等消费项目,就是投资于工商产业,有了钱也不向农业投资,就是一个证明。而且,由于务农收入低,农业投入回报率低,不仅资本投入相对减少,土地自然也会大量向非农用途转移,甚至劳动力的投入也趋于下降,导致我国极为稀缺的土地有一些被“抛荒”。

## 农业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矛盾

针对农民收入过低这一现象,人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是否解决了决定现象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下面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中国农业发展不稳定、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再回过头来分析目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最基本矛盾是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和传统经济结构下农民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过大的矛盾。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必然不断下降,非农产值所占比重必然不断提高,其根本原因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在全部消费需求中所



占比重必将越来越小。现代经济的发展只能主要是靠各种非农产业的增长。在人口相对于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里,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长,会使农业人口较为迅速地被吸引到非农产业中去,同时促使农业规模经营的程度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从而使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同步下降,甚至因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耕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得更快,这样就使得农民的人均收入能与非农产业中的人均收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农民具有务农并改善、提高农业生产的足够激励。

但是,中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是,虽然近些年非农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也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但由于我国人口规模过大,人均耕地过少,加上工业化起点低,资本稀缺,资本的利用效率又因体制的原因而不高,因此,迄今为止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十分缓慢,尽管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迅速下降到近 20%,但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在 50% 以上(1993 年为 53%)。结果是,少量的农业收入被大量的农业人口所分享,农业生产的人均收入必然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一矛盾,在数量上集中地表现为农业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人均收入的关系上。20% 的国民总产值由 50% 以上的农业人口(劳动力)分享,而 80% 的国民总产值由不到 50% 的非农人口(劳动力),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不等式:

$$\begin{array}{r} 80 \\ \quad \quad \quad 20 \\ \text{农业人均收入(---)} < \quad \text{非农人均收入(---)} \\ 50 \\ \quad \quad \quad 50 \end{array}$$

(对比而言,美国是 2.8% 的农业劳动力生产 2% 的国民总产值)。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如果非农产业仍(仅)保持目前的增



长速度,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今后几年仍会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90年代以来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但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估计平均每年会下降2—3个百分点(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3.1%)。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与基本问题。正是上面给出的这一最基本的不等式,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过低,决定了农民缺乏对农业投资的能力与动机,也决定了各级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动力不足。

## 无法用持续提高粮价来发展农业

农民收入过低,价格“不合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不少人认为要想发展农业就要提农产品的价格。

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前几年,经济作物、畜产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工业加工产品的价格也已基本放开,惟有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价格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地压在较低的水平;在一定时期,粮食价格稍有上涨,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进一步上涨,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是没有多大的提高。比如,1994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国家收购价格”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收入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有所提高,算下来,农民因价格变化导致的实际收入增长,不过5%(陈锡文,1995)。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多次发生。1979年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产品的“价格调整周期”是密切相联系的。短期内粮价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加上政府为对付农业生产下降而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和其他政策措施,有



可能使农业生产在 1—2 年中取得一定的稳定增长,但这种效应只能是短期的。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两年后这次粮价调整的效应消失了以后怎么办?

那么,能否靠持续提高粮价来维持粮食生产的增长呢?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已经相当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粮价继续上涨,不久就会达到国际市场的水平;而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市场价格事实上构成国内价格运动的一个上限。这两年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粮食进口之外,沿海发达地区粮价上涨后进口粮消费的大幅度增长,已说明我国的粮食价格上涨正在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要想做到农产品价格在达到国际市场价后继续上涨,除非政府对农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性政策,限制进口,以维持国内农产品的高价位。

粮价要维持多高才能实现务农人均收入与非农人均收入的均等? 假定今后几年非农产业仅按 10%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同时农业增产,农业人口比重到本世纪末下降到 45%,工业品价格完全不提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人均收入大体均等,也要将我国的粮食价格提高到目前的近 5 倍,即再提高 4 倍(比日本目前的粮食价格还高。日本的粮价目前是国际市场价格的 4.3 倍。关于农产品价格与政府补贴的国际比较,参见邓一鸣,1994:《对粮食保护的比较研究》,工作论文)。以上的分析尽管有点极而言之(因为并不一定要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人均收入均等),但这一分析表明,要想真正解决农业收入相对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粮价要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否则即使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也还是解决不了农民有了钱忽略农业投资的问题。仅仅通过提高粮价使农民收入赶上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因为只要工业投入与农业投入的回报率存在较大





的差异,农民收入提高了还是不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就还是不能实现持久稳定的增长。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粮价较便宜的条件下,用保护贸易的办法维持国内粮食的高价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明智之举?国内粮价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工业化速度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外资进入也会受到影响)。这对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是否明智?农业已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极少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想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的势头,加速资本积累,要利用和依靠什么比较优势?显然不是农业,目前从总体上看也不是高技术密集产业,而是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加工工业。而粮食是构成劳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使粮食价格提高,大大高过国际市场的水平,我们的要素优势很快就会失去,增长的势头也会减弱。

这并不是说今后要控制死价格,不允许价格按市场供求关系而提高,也不是说就完全不保护国内粮食市场,但以上的分析表明,用持续提高粮价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的办法是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相冲突的。

## 难以靠增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或增加对 农民务农活动的补贴解决问题

增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无论是增加农业投资还是增加对农业的补贴,这一思路的要点是在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民缺乏对农业投入积极性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有目的、“定向”的转移支付,实现“以工补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具有公共物



品的性质,需要政府的干预,需要公共支出的支持。我们目前也的确极需改革财政体制,更多地实现非农收入向农业的转移支付。但问题是,在近期内各级政府是否有能力(和动机)使其对农业的投入有实质性的提高。1993年狭义农业的投资总额(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之总和)只有25.5亿元人民币,只占全社会(两项)投资总额的0.37%,即使假定农村个人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是用于狭义农业的投资,加到一起总额不过是147.9亿元,仅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18%。广义农业的投资1994年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9%,比1993年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广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水利业投资的总和,按现价计算1993年仅比1992年增长13%,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58.5%,若按不变价格算实际是负增长。如果要求(广义)农业的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与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一致,就要将农业投资提高到3000多亿元(按1994年价格计算),即是目前水平的10倍。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投资,仅靠政府投入,这笔钱相当于目前财政收入的60%,显然是不可设想的。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的比重近几年持续下降,目前只占8%左右;而财政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又在不断下降,1994年又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达到11.8%(1993年为16.2%)。当然,目前地方政府有大量的非规范收入未记入财政预算收入,但这些收入同样很少用于农业投入。总之,在目前情况下靠政府提高农业投入,哪怕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极为困难。增加政府投入,遇到了政府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实行收入转移支付的能力较弱这一客观事实的限制,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当前一定要强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此抵消各方面减少对农业投入的趋势。但对于政府投入本身的局限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否则如果把希望



寄托在政府投入上而没有及时地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就真的可能有大的农业危机、粮食危机。

另一方面,在我国农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再增加粮食产量所需的投入却是越来越多了;提高粮食产量,这一点在目前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产量相对较低,但“单位面积产量”已不算低(约每公顷 4400 公斤),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每公顷 2800 公斤),虽然低于日本(5350 公斤)和一些欧洲国家,但接近于美国(4750 公斤),今后在没有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无论是增加资本投入还是增加劳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已十分有限。这不仅意味着靠对农业投入的提高,已不大可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种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的问题,而且意味着增加一点粮食产量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为增加粮食产量所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无论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还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或补贴,都意味着经济资源向农业更多的转移。这在一定限度内目前是需要。但是,要认识到的是,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生产越来越昂贵的粮食,势必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农业投入之所以能受到强大的非农产业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总能奏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非农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这个阶段上,非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快,增加值高,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

## 长远的战略:农业科技的发展和 大量农民的产业转移

以上分析了各种提高粮食价格、增加政府农业投入等目前



发展农业的对策的局限性。这些的确说明了目前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对这种困难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只能在正确认识这些困难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

扭转农业长期发展缺乏动力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不是“农村”的人均收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大分子”,即提高农业总收入,前面分析的种种办法其实就都是以“增大分子”为目标的。而从长远看,增大“分子”的根本办法不是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也不是一般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最重要是要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争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突破。没有一个“数量级”的变化,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已经不是很大了,分子的扩大也不能实现。“增加分子”绝不能长期靠转移支付或“以工补农”。发达国家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已经很小,1—2%的国民总产值拿来补农业就可以在长期内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所以“补得起”(参见下页表,中各国农业产值的比重与人口的比重)。而我们,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均收入差别大,从非农产业那边拿来10%甚至20%的国民总产值来补农业,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收入的均等,所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从长期看我们“补不起”。

“补不起”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提高农业人均收入恐怕还得更多地依靠另一个途径,那就是尽快“减小分母”,即减少分享农业收入的人数。中国农业的稳定发展,不能没有这一条。

显然,减少农业人口,不能由农业自身加以解决。农业自身可以少使用劳动力(比如加速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前提是减少了的这些农业劳动力必须在其他领域找到就业机会,否则尽管他们可以不做农活了,但却处在失业的地位上,还是要去分享农业收入,还是属于“农业人口”。要想减少农业人口,根本的出



路在于经济“非农产业化”程度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农业人口得以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出来后,一定的农业收入由剩下来的少数农民所分享,农业人均收入也就得以大大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有了根本的保障,也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增加农业的投入,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农业才能稳定、持久地发展,粮食供给才能不断增加。可见,发展农业,绝不能就农业论农业,而要超出农业,从整个经济的角度分析问题。一个经济的资源是有限的,过多用于农业的发展,必然损害非农产业的发展,放慢经济的非农化过程,放慢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结果恰恰是损害了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 各国农业情况比较 (1992)

项 国 家	农业劳动 力所占比 重 %	农业占国 民总产值 比重 %	粮食名义 保护率 * %	名义价格 系数 * * %	谷物单位 面积产量 (公斤/公顷)
美国	2.9	2.0	20.2	1.0	4752
日本	6.4	2.3	420.0	4.3	5346
德国	3.5	1.3	86.0	1.4 * * *	5790
法国	5.1	3.1	75.0		6042
澳大利亚	5.3	3.0	2.8		1762
印度	55.0	28.6			1887
韩国	16.0	8.1	239.0		5706
巴西	22.8	7.8			1756
中国	58.6	23.8	0		4232

\* “粮食名义保护率”是用几种主要粮食平均计算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比。

\* \* “名义价格系数”是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价格比率,比率越大,保护程度越高。

\* \* \* 这里用的是欧共体的平均名义价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4》,《世界经济年鉴 1992》;邓一鸣,1994:《对粮食保护的  
国际比较研究》。



## 短期的对策：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增加粮食供给，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现在的问题是，在短期内，我国农业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的制约，也受到了我国人多地少自然条件的制约，粮食的生产在一段时期增长速度不会很快。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一方面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另一方面又不使粮价过高、对农业补贴过高而损害经济增长过程、放慢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程的问题。

其实，只要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并仍然在国际工业品市场上保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成本低），从而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我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在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较低的条件下去加以利用，而是非要自己进行大量的投入，以换取一点昂贵的产出，是不明智的。西方有人现在在说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将无法养活自己，2030年将“缺3.7亿吨粮食”，等等。这样的分析，有的是出于学者善良的意愿，希望中国能够防止因农业生产不足而发生危机。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新闻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



间,目前传播着一种“恐惧”,害怕东方的成长、中国的发展,将一方面与他们竞争工业品市场,夺走他们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则将提高国际市场上粮食、石油和其他一些原材料的价格,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而并不是怕发展中国家出现饥荒)。如果我们中国以昂贵的代价维持粮食等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同时又因大量资源被用于农业,放慢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恰恰符合了这些西方人的心愿,既为他们维持了粮食的低价,又减轻了他们所面临的工业品市场的竞争,维持了他们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中国人利用国际市场为自己的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时候了。到了我们来影响世界市场价格的时候了,到了我们来消耗较多的人类共有资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陷入别人为我们设置的“粮食自给自足”的圈套。从国际市场上多买些粮食并不就会因此而受制于人。只要我们粮食供给的主要部分仍然是自给的,同时不是依赖单一的进口渠道,而是从多个国家购粮,我们不仅会受制于人,还能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获利。

在具体做法上,目前除了适当从多种渠道增加一些粮食进口以外,还可以考虑力争到世界上一些地多人少的国家去合资建立我们的粮食基地(比如俄罗斯和巴西)。这样做的成本代价一定会比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增加产量的成本要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开放了,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要求我们也使我们有能力从世界的大范围中去考虑资源的配置问题。中国人当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种出的粮食养活自己,而是可以靠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粮食养活自己;也不一定非要在自己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种出粮食养活自己,而是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种出粮食养活自己,就像西方人多少年来在世界各地办企业养活自己一样。



# 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开发

## 我国农业投资不足的基本原因 之一是难以取得规模效益

我国农业发展不稳定、后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本投入。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因此,现在发展农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对农业的投入。

增加农业投资,不可能单靠政府的投入(目前政府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的能力本身也十分有限),从长远看,主要还是要靠社会上的各种资本能源源不断地投向农业,与其他部门的资本投入,保持一个均衡增长的比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资本怎样才能向农业投入?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光靠“支农”或“补农”的良好愿望,而同样要依靠盈利的原则,也就是说,要使对农业的投资,像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一样,获得一份平均利润(至少是平均利润),从而使农业也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现在农业投入不足的一个基本原因其实就在于农业投资的回报率相对较低,难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农业投资的回报率与农产品的价格有关。因此有的人自然





认为农业投资不足的原因在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过低。我国当然仍然面临农产品价格改革的问题,但即使在目前,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按现行汇率计算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要在我国目前的农业收入与农业人口比率的条件下使农业投资回报率与工业的回报率大致相等,足以吸引较多的投资,农产品价格至少要提高到国际市场价格的5倍(日本在严格的保护措施下农产品价格是国际市场的4倍左右)。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显然是在目前国际环境下很难做到的事情。这意味着,从长期看我们很难用单纯提价的办法刺激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业投资回报率的高低,除了取决于产品价格、生产技术以及单位面积产量或单位要素生产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规模收益。在一个地少人多、传统农业社会又导致大多数劳动力仍就业于农业的条件下,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可能很高(我国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并不低),但农业投资回报率却可能很低,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因农业劳动力人数过大而无法对农业实行较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取得一定的规模效益。

这不是一个生产技术问题(我们现在不缺大规模集约经营的技术与管理手段),而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够不能够”的问题:在大量农业人口尚未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获得就业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耕作较多的土地实行集约化经营、取得较高的规模效益,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这实际上正是我们难以对农业实行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的症结所在,也是目前我们农业投资不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原因。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工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已开始迅速发展,吸引着大量投资,而大量农业劳



动力尚未转移出去的特定发展阶段上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矛盾和特殊困难。我们无法逃避这一困难,而只能面对现实,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思考如何吸引更多农业投资的途径。

## 根本的出路还是要从现实出发 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开发

不仅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的集约化与产业化,在现阶段条件下,扩大农业投入、稳定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也是农业的产业化开发。

所谓农业的“产业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笔者在此只想强调两点:

第一,作为一种产业的农业,也必须像其他产业一样,能够取得规模效益,即使不能在生产的全过程中取得规模效益,至少也要在某些环节上取得规模效益,形成农业开发的大型企业,这样才能打破传统小农业的局限。

第二,作为一种产业的农业,必须也像其他产业一样获得一份平均利润,这样才能使农业投资具有微观经济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才能与其他产业的投资成比例地不断增长。

这两条其实从经济意义上说也可以归结为一条,就是投资必须有利可图,而农业要想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能取得一定的规模效益。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发展对农业的产业化开发,又必须不违背以下的约束条件:不能在非自愿的前提下从土地上“驱赶农民”,使一部分农民失去生产与生存的基本手段。换句话说,农业投资和产业化开发的利润不能来自对既得利益的损害,而只



能来自创造出新的利益。

明确了以上几点要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也就明确了我们在现阶段的客观条件下应该首先在哪些领域里、以何种方式来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开发。具体说来,我们在现阶段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开发:

第一,在工业已经较为发达、农村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非农业产业中去的某些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可以开始通过土地自愿转包等方式实行土地经营的集约化。整个农业的出路从长远说都是如此,但现在还只有少数局部地区具备了条件,这没有关系,可以一步一步地做起来,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扩大。这一进程虽然刚刚开始,但已出现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对土地使用制度和政策作出必要的改革与调整,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第二,开荒、复垦以及山区、低地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这一领域的特点是原来没有小农耕作存在,而是在开发新的资源,因此产业化开发不触动既得利益,可直接吸引大资本前来开发经营,尽量不要再搞小农经营,应制定政策直接进行产业化、大规模集约开发。

第三,“大农业”概念中的养殖业。当种植业尚未在多数地区形成产业化经营条件的时候,养殖业可以率先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这是因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约束条件主要在人均耕地面积小,而现代养殖业许多并不需要占用大面积土地,所以也可以在不损害农民既得利益前提下发展,取得规模效益。养殖业的专业化生产这些年已经有所发展,开始形成规模,目前更应进一步鼓励大资本、大企业的发展与进入。90年代产业化的农业大企业是80年代“专业户”的自然延伸,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四,通过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获取加工、销售



环节的规模效益,并以此成为向农产品生产环节增加投入的稳定源泉。这也是目前可以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为止的情况是: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许多农产品无法立即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还只能搞分散的小农户经营,而在另一方面,加工与销售环节虽然能够进行产业化开发、取得规模效益,但又从利益关系上与农业生产相脱离,导致农业投入和农业技术的利用与开发缺少必要的经济激励与资金来源。如果能够通过某种体制上的安排,使分散的农户与产业化经营的农产品加工业(包括饲料加工业)和销售企业结成某种利益共同体(互利),便可以使产业化经营的加工业和销售、服务业的利润能合理而稳定地流入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长。比如,如果一个地区的大量分散农户能通过农民合作组织与饲料、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合同形成固定的生产—加工一体化关系,使这样的农业产区事实上成为加工企业的“种养基地”,加工企业就会有动机对这一地区的农业进行技术与资金的投入,以稳定农产品供给价格和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根本前提是产、加、销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成为可以取得规模效益的加工、销售企业的利益所在,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才能合理和稳定地“反哺”于农业。这是我们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 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

中国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有赖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农业产



业化开发,也有赖于许多制度安排的变革与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农业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农产品进出口体制的改革、地区间行政区划关系的打破,各级政府发展农业政策的调整,等等,都有许多文章可作。农业产业化开发的前提是要使农业投资成为一项同样有利可图的产业,而不仅仅是在尽一份社会责任。这是我们围绕农业产业化开发进行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

我们前面分析了我国目前条件下可能立即着手推进农业产业化开发的几个领域。那么,目前在经济中是否有资本可以投入到农业的产业化开发当中去?应该看到,我国这些年来在农产品加工和饲料加工业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较大规模、较具实力的现代企业,它们已具备进一步投资与发展的实力;在其他产业中,这几年也有许多大企业发展起来,形成了较大的资本量,也在寻找各种新的投资机会,追求企业自身适当的多样化经营。因此,只要我们深入改革开放,适当调整经济政策,使农业的产业化开发真正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机会,相信会有不少大型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公司企业向农业的开发进行投资。



# 收入差距与地区差距





## 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与收入平等

2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从总体上来说,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可是,令人不安的分配不公问题也随之出现,已经存在的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之间、东部与西部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些问题,《北京新报》记者杨兆敏采访了经济学家樊纲教授。

### 要素分配,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体制

**记者:**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中的两个大问题。分配不公,可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说人类历来还在试图解决的世纪问题。

**樊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才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成为可能,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出现的深刻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同样需要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解决公平问题,所以现在他们又提出了走“第三条



道路”的思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全球性的“数字鸿沟”的出现,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所以,“分配不公”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世纪难题。

记者:当分配不公的问题出现后,也许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我们过去的分配制度中出现了怎样的问题。而问题提出来后,我们又需要制定出分配制度的目标及分配模式。

樊纲:中共中央提出了,今后的分配模式是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鼓励技术和资本参与分配。其实,现实中我们已经实行要素分配了,劳动、技术、资本都已经参与了分配。不过,要素分配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素分配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

传统的一些做法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导向平等的一些做法最终还是导向不平等。比如单纯的按劳分配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分配公平,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形成了一些特权。那种体制发展的结果,要素虽然没有参加分配,但权力决定分配,结果带来了更严重的不公平。

要素参与了生产所以参与分配,而参与分配的权力许多时候不仅不参与生产,还对生产起破坏作用。特权参与分配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是需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分配制度上的目标体制,即沿着要素分配的方向去发展。

收入差距,首先是一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记者: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是一个无





法避免的问题,但是,不同的条件下,有它产生的不同根源,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度里,又处于转型时期,收入差距过大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

**樊纲:**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即使处于没有腐败、没有贪污、没有不合法行为的理想状态下,由经济发展本身也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

换句话说,在对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否定的过程中,就要产生收入差距拉大。没有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不会有改革,也就没有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改革的进程本身就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这种一般状态下,出现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个趋势,有可能超出人们能接受的程度。

**记者:**收入差距过大,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为此,政府总是要想办法要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发展本身产生的、正常的过大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樊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采取再分配的手段。比如,政府通过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增加遗产税、实行累进的所得税等手段,使富人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穷人。

目前,要建立这种制度,中国还需要走一段漫漫长路。尽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但是,如何保证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绝对下降,应该是工作的最基本、最起码的目标。



## 腐败问题,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

记者:收入差距有它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不少人提起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化,情绪都比较激愤。如果仅仅是由于这种相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差距,应该不会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感情。

樊纲:问题就在于,我们当前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各种“不合法”的原因。以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等各种非法手段谋取暴利,这是发展中国家、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问题。它虽然是人类社会目前还普遍未能根除的问题,但在目前中国却是太严重。现在,大家一说收入不平等,往往反映出来的都是这些不合法的部分。

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机制问题。

记者:一个社会中难免会有人要做坏事。在正常的社会里,做坏事的人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社会相应的制度不能惩罚做坏事的人,反而让他们获利,那就是制度本身出现缺陷了。

樊纲:要让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就需要监管。但是,监管是有代价的,会有成本发生。可是,如果做坏事的人太多,监管成本太高,就不容易监管。

比如腐败。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如果一个社会里有太多的公权,腐败的机会就比较多,惩处起来难度就大,成本过高。过去,我们的很多经济权力包括财产权力都是公权。公权太多,利用公权谋私利太容易、太方便了,监管起来就非常困难。

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更多的权力回到民间去,回到私



人手里,不再成为公权,也就没有那么多腐败的机会。

**记者:**对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樊纲:**腐败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因为,通过这种手段取得财富不是凭个人的能力或者个人财富,他所凭借的是人民交给他的权力。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是危及社会稳定。

为了遏制腐败,就要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双管齐下。如果不改革,法不治众,要管的人太多,就管不过来,同时还会出现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同时,不仅要改革产权关系,还要加强法制、加强透明度,多数人监管少数人才是监管。

**记者:**不过,由于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不同,社会中存在适度的收入差距也是必要的。

**樊纲:**当然。对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是坏事,是必然的过程,问题是要采取对策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使之不成为社会公正观不可接受的情况,避免社会产生更严重的的不平等,逐步形成既有效率又平等的情况。

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出现时,不能作出简单的否定。如果要简单的否定的话,那就是又回到过去,而这肯定不是出路。

## 国企改革,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记者:**讨论到收入分配问题,不能不谈到国有企业在其中的作用。

**樊纲:**在分配问题上,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职消



费。由于经营者不是所有者,利润他们是拿不到的,所以主要的利益就是“花钱”,然后把花出去的钱计入成本。这是最让人不可容忍的地方,也是国企亏损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问题是职工们的正式的工资,即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合法的工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

有权的人在职消费,一般工人就拿一定的死工资,亏损企业还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同时,企业的有权人照样的吃喝。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记者:一个企业内部,职工之间正式的报酬差距太小,太平均。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则有可能拉得很开。

樊纲:在目前这主要是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垄断行业仗着垄断的地位,在分配中就占据优势地位,获得普遍的高收入。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记者:本来就是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才改革,可是改革中问题又会层出不穷。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

樊纲:国有企业最复杂,它存在产权改革的问题、反垄断的问题、拉开正式收入的差距问题、反腐败问题。这就反映了国企改革复杂性,同时,这些问题都与收入不平等有关,都会产生收入不平等。

改革中我们应该遵循以下的原则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用更透明、更规范的方式进行产权改革;通过抑制和取消垄断来取得行业间的平等;通过拉大企业内部的正式收入分配的差距,来保证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具有充足的激励和充足的约束,使企业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然后再通过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来克服因在职消费产生的不平等。最终形成合理的分配制度。



## 西部的发展:发挥相对优势 与重视民营中小企业

现在讨论开发西部,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引进资金、引进投资,无论是国外的投资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还是中央政府的投资。从地方利益来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地区发展的根本利益来说,当前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仍然在于如何形成自己的“造血机能”,也就是说,如何使自己的经济收入得以提高,使本地区的企业(也包括在本地的外资企业)能够“挣钱”、有利润,从而能够更多地进行资本积累。这点做不到,无论今天有多少外资投入,西部还是不能发展。

而要使西部自己的企业能够赚钱赢利,说到底就是要在当今的国际市场、包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市场中,具有竞争力。怎样才能有竞争力呢?我们首先要明确竞争力的概念是什么?需要明确的是,有竞争力,并不一定就要有大量的资本、高新技术、高级人才。竞争力的概念,说到底其实是一个效率概念、成本概念、赢利概念,是看你能不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者反过来说,能不能以同样的成本,提供比别人更多、更好的东西;能够卖得出东西,还能够赚钱,而不是亏损。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与先



进、发达的竞争对手相比,可能是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才没人才(有了人才还可能发生外流,这些不正是西部的情况吗?),但仍然能够发展、成长,甚至增长得更快,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原因就是因为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使产品的成本较低,从而仍然有竞争力!因此,给定西部地区目前各方面的条件,大家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转移到怎么才能使西部地区经济和企业能够更有竞争力这个问题上来!

在目前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资金、技术、人才条件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的条件下,西部应更加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发展的“软件”条件,也就是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目前物品特别重要的是要降低企业的“政府成本”,也就是与政府打交道(包括养政府)所需支付和各种财务和时间的代价。在另一方面,西部可以在产权关系改革、产业“对内开放”等方面,比东部地区迈开更大的步伐,这样才能占据一些新的“体制优势”,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若在产权方面给开发者更大的空间,可能在荒山、荒地的开发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2. 要高度重视发挥落后地区的相对优势,包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较低)、“本土市场优势”(我们对本地、本国市场的经济关系、人文历史特点、消费者偏好等等更加熟悉)和后发优势,更加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要重视就业的扩大、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的开发、更加重视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增长得比发达国家更快,说到底是在相当长的一发展阶段上能够利用以上的这些相对优势。如果落后地区一上来就一心想的是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先进企业拼谁的资本多、谁有高新科技、谁敢冒大风险,结



果最终一定会更加落后。至于现在人们经常强调的“资源优势”，要做具体分析。地下有资源，与这些资源是否现在在经济上有开采价值，不一定是一回事。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看，有些资源现在开发不一定是正确的发展战略。

3. 要更加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毫无疑问要关注引进一些大企业，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就业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最终取决于有多少人真正进入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取决于有多少人从事了自己的投资、发展起了自己的企业和事业。在这方面，民营中小企业无疑是发展的根本希望所在，而中小企业发展的普遍程度和它们发展、“做大”的速度，则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尺度。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中小企业本身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会更加重要，更需要我们从各方面给予更大的关注。

4. 在更加关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要鼓励劳动力向外流动。东西部差距的缩小，最终是“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西部地区“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由于那里较差的经济条件下所创造的高收入就业太少。东部资本多，就业也应该较多，这样才是真正地缩小差距。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鼓励东部多吸纳劳动力和人口，西部也应该鼓励人口向外流动，加上资本更多地到西部去，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加速人均收入的“趋同”进程。

2000年10月21日于成都西部论坛



## 要素流动与人口流动

最近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批来自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国际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一位来自英国的已退休的但是十分资深的国际关系学女教授,半是认真、半是“倚老卖老”地指点着一些年轻的学者说:“你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我看得赶快改行了,因为以后不再有‘国际关系’,因为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世界上资本的流动性之高是历史上未有过的,今后就更是这样,资本、技术、资源以及工厂,在全世界流动,哪里成本低、利润高,就到哪里去生产。国家的功能就将只剩下作一个‘地主’,占有那一块‘领土’并借其收‘租’,接下去的任务不过是如何用收来的‘租’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吸收更多的投资,如此而已。”这一番话新颖、独到,颇有点“震撼性”。接下去许多人发言都加以附和,有的还进一步发挥,论证经济的“全球化”如何改变着世界,改变着国家,改变着资源的配置,改变着一切。

到我发言时,我说,“也许我这个发展中国家来的人可以为讨论提供点别的东西。”物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已经高度流动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迄今为止,有一样生产要素还是不能流动,那就是“人”,劳动力。这也许是最关键的一个要





素,不一定在生产过程中有多关键,而是在理解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上十分关键。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反正不会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因为工资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则不允许向发达国家流动:“船民”要被轰回来,“非法移民”要被赶出去,入境时要先搞清楚“不准工作”、没有“移民倾向”,等等。因此,“国家”的概念远未终结。“国界”的含义就在于把人群隔开,把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生活质量的人分开,防止穷国的穷人“流动”到富国去分享富人的财富与收入。当今富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工作岗位”的多少问题。他们一方面在鼓吹资本的流动、贸易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在叫嚷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导致原来本国的工作职位在被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所以“劳动成本低”)“抢走”,而越是如此,就越是不能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自由迁移,迁移到他们的国家里去与他们争夺有限的饭碗。美国最近在大张旗鼓地清查亚洲移民或非法移民在低工资工厂打工的事情;最近又有新政策,外国人连“社会保险号”都不得持有了;而美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纠纷,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正在威胁到美国工人的就业。所以说,国家对于富国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概念,一方面,国家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会”,它鼓吹资本的流动和自由贸易,千方百计去打开各国的市场,以允许它们自由进入到世界各地去争取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国家是劳动者的“工会”,又千方百计去阻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尽可能地封闭他们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当然主要针对的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市场,对有专业技术的人员,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市场还是“准入的”,所以有所谓的“技术移民”一说,总之是把穷国的人才吸走。)。而穷国的命运则比较悲惨,它们没有资本可以流动出去,而劳动力又不



准许流动出去,只能靠出口更多较为便宜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外汇,而这又被发达国家说成是“倾销”。过去“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不等于国际关系不复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也可以说是今后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那就是作为各国“工会”与“行会”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学者还是较少利益偏见的,所以我的发言立刻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学者的共鸣,原来那种赞扬经济全球化的热烈情绪由此也就多少冷下来一些,话题开始更多地集中到当今世界的各种利益冲突上去;连那位老教授后来都开始谈论穷国的“弱小工业”应该受到适当保护的问题。

国家是由人构成的,首先是一个人群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利益、人的收入、人的福利。国家的富裕程度要由“人均收入”来衡量,而不是以“平均亩产”来衡量。这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基本道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处理国际间的问题,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我们国内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地区差异”问题。我曾经写文章鼓吹要在要素流动过程中,特别是人口流动过程中,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均等。结果遭到了两方面的反对。落后地区的人认为这是鼓吹放弃发展他们的“故乡”、“热土”;而较发达的地区的人说:不行,你们不能来,我们这里人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你们落后地区最好自己“就地”解决贫困问题,不要出来。这当然也像国际关系的问题一样,涉及到的是利益关系,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但我们毕竟是一国的人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一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人口不能相互自由流动,这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的“东西关系”问题就会变成国际



上的“南北关系”问题，即穷国与富国的关系问题那样，变成一个死结，长期无法解决。相反，只要我们在制度上和政策上保证人口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差距再大，最终也会使人均收入趋向均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正是美国这个现在努力减少外来劳力的国家早年曾在宪法上做出过严格的规定，任何一个州若拒绝其他州的人口流入或拒绝在工作就业上一律平等，则被视为是违法，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正因为如此，美国地域与我们几乎同样辽阔，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交通条件等差异也很大（洛矶山脉及中西部广大地区比我们的西部还要贫瘠），但几乎很难听到有什么地区差异的抱怨。联邦政府的帮助和一些适当的特殊政策（比如允许内华达州搞一个赌城）当然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的自由流动。收入较低地区（这也是一个经常变动的概念）的人口不断流向收入较高的地区，最终在市场均衡的过程中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这才是一种“可持续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现在令人担心的一种趋势是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市，开始制定各种“反流动人口”的政策，阻碍外地人口的进入，甚至驱赶外地人口，在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而不是减少这些障碍。这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本地人”的利益，为了使本地人就业能够受到保护，能够使城市的生活更加“惬意”。就发达地区本身而言，“只顾”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什么错；当地政府也是首先要获得当地人民的拥护。我这里并不想像有的人那样试图改变“当地人”为自己着想的逻辑。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同样是为自己着想，我们是否也应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社会平等”对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来说也是一种



“公共物品”，就是说，它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消费”的不排他性），一个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大的国家，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弄不好甚至会因社会动乱而打断我们大家经济增长的进程。即使不发生社会动乱，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也会迫使中央政府采取较为强制的措施，进行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缓解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这同样会影响到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达地区，也仍是这样，对于这样的经济，若不允许人口流动、劳动力流动，让大量落后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到工业，而是过早地像先进国家防止穷国的劳动力流入那样对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保护，就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劳动成本过早上升，产品失去竞争力，过早出现一些发达国家那种“经济空心化”现象。我国有一些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其“劳动综合成本”，包括工资、福利、住房、城市建设支出等等加在一起，变得越来越贵（城市土地越来越贵也是这种成本上升的一个组成部分），导致那里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甚至国内市场上正在开始失去竞争力，自己的失业（开工不足、工厂停工）情况也反倒越来越严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活力减弱）。应该说，这是与封闭劳动力市场、排斥“廉价”外来民工的错误政策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发达地区应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自己经济能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坚定不移地保持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性。

我国是一个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过才 800 美元，而我们现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就要与发达国家攀比，既要有高收入，又要有“花园城市”，有的还对土地的“容积率”做了种种严格限制，限制盖高楼，限制更充分地利用土地。刚有几辆自行



车被偷就大喊外地人来了搞坏了治安,而实际上我们的公共治安至今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还好得多。享受当然是越多越好,“城里人”的既得利益当然是城市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想提醒人们的问题在于:在这一极多一份享受,在另一极就可能是更长时间的贫穷。当我们付这么高的费用追求这种享受的时候,我们似乎至少应该给落后地区的人一点进入发达地区的自由,允许他们来平等地竞争一份工作,平等地换得他们能挣得一份收入的机会(其实,当他们进来的时候背后已“天生”地面对着许多不平等,惟一的优势是要的工资较低而工作更加勤奋)。

最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积极地采取促进人口流动的政策,还是默许或鼓励地方政府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地方政府原则上可以不去管什么地区间的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到头来无论如何却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 再论“人口迁移”

《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6月24日刊登了傅吉奎和孙可庸的两篇关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文章，与我的观点进行商榷。遗憾的是，我认为，这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对我来说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 经济时代与区域条件

傅文中指出了西部的许多“有利条件”，比如农业条件好，林业条件好，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发展重工业的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我们的确应该继续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这也是中央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对西部一些资源富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

第一，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有资源，但先开发哪个后开发哪个是由开发的经济成本决定的，人们用哪里资源不用哪里资源是由经济价格决定的（请注意不是“政府定价”）。原则上说，如果现在青藏高原上的铁矿开采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高于澳大利亚铁矿的到岸价格的话，经济上的合理选择是使用后者而



不是使用前者(当然还要有国际政治上的考虑,但那也是有限度的)。只有当其他地方的资源越用越少因而也变得越来越贵之后,前者的开发与利用才成为经济上合理的。这是举例说明,但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一般意义,因为它符合经济的法则。这还不仅是所谓“市场法则”,它是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

第二,农业资源当然需要加紧利用。中国的农产品就其生产成本而言已变得越来越贵,因此许多过去未开发的农业资源将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可以预见西部农业在今后必然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思考一个问题:农业的发展能提供多少就业?如果人口分布不变,那又能提高多少人均收入?

“人口迁移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变化论。中国过去的人口分布,是适应于传统的农业经济格局的。只要有一块地长庄稼,便可养活一批人(我们的人口大省四川是历史上农业人口集中的典型区域)。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20世纪以来国民收入的增加,已不再主要地依靠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主要不再依靠农产品的增加。农产品消费数量与质量当然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的增加已不再主要靠农业的发展,而更多地靠各种现代“新玩意”、新产业的增加。这种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变,必将带来人口布局的变化,导致人口向更适合于生产现代“新玩意”的地方转移。换一个角度说,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从地理格局上说已经与农地的分布相脱离,转而更主要地依赖那些离市场(包括国际市场)更近、交通(特别是海运、河运这种较便宜的交通)更方便的区域,过去“农地导向”的人口分布必然要发生变化。这是客观趋势,我们奈何不得。回顾一下现代世界经济发



展的历史,哪个国家没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发生这种人口格局的变化,而且不仅是一个国家之内在变化,国际之间也在发生变化。

傅文中还提到了“三线工程项目”,也列为西部的“有利条件”之一。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论据。“三线”建设就总体说是我们人为配置资源、不计经济成本(那时有那时的政治成本要考虑,另当别论)的典型事例。笔者自己一直是十分强调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的,但三线企业活力差、发展不起来,却真的不主要是自身体制上的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自然的、外在的原因”——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处在了成本较高的不利条件上。这里的一般性教训,也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西部发展的人认真记取。

## 东部能吸纳多少人？

傅文对东部地区吸纳更多人口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并指出我国本来东部人口的密度就较高,本身又存在大量潜在失业,等等,因此已不能吸纳更多的人口。但是,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东部潜在失业人口多,西部不是更多么?西部安置现有人口都成问题,东部至少现在人们活得还比较不错,人均收入比西部高许多,为什么不让西部人到东部来,让东部吸纳更多的人口呢?其次,东部不存在“劳动短缺”么?事实却是现在已有几千万中西部人在东部打工,民工潮还正在涌来,其原因正是东部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究竟是密还是不密,按“平方公里”计





算只是一种“自然算法”，按平方公里再加上“资本量”来计算才是“经济算法”。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只要劳动力有工作、有收入，人们愿意在此生活，一平方公里上人再多也不算多。反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能与资本（生产资料）相结合，一平方公里上人再少也是“太多了”。在世界上一些大国里（比如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收入总量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却没有什么人在谈论“地区差距”问题，原因就在于人口分布导致人均收入基本是平等的，某些经济收入总量少的区域人口稀少得比我们的西部还要少，而一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比如美国东部海岸的一些地区）比我们东部人口密度还要高。亚洲国家与地区也是这样。香港在很小的区间内人口密度可谓世界之最，但不构成经济问题（他们还在进口劳力），原因就在于有资本、有收入、有工作。

如果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再加上中部沿江的一些地区）具有发展现代经济更有利的条件，那么那里的人口密度就应该更大、更密。它不这样，才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既然能“吸纳”更多的资本、产生更大的收入，为什么不应该吸纳更多的人口？“西部人”现在倒是应该好好分析一下“东部人”拒绝吸纳更多外来人口的种种理由。为什么东部人就应该既享受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工作，又享受不拥挤的城市、优越的环境、良好的治安，而“西部人”就只能“安享”贫穷？在笔者看来，就是应该有更多的西部人到东部去分享（难听一点的话叫“瓜分”）那里的人们现在所享有的高收入（从而把那里快速增长的人均收入“拉”下来）。东部楼房现在还太矮，还应该再多花些钱建得再高些，楼与楼之间的密度再小些，再少一些奢侈“室内采光”；东部的道路占用面积还应再小些，再多花些钱搞些高架路和地铁；人



多了治安不好就应该再多花些钱加强治安,等等,等等。只要资本还在往东部流,只要地区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只要人们还在愿意把更多的工厂企业设在那里,只要这样的投资(包括对道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效益仍比在其他地区的效益还要高,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分享就业、分享收入,直到那种“人均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停止下来并开始逆转。这才叫公平!根据经济学理论,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东南沿海的人口密度将会更高,东南沿海的许多地区将逐步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产业密集、就业密集的城市带(想一想世界各地已经形成的种种城市带),而在这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则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我们现在就应做好今后几十年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思想准备,并为其做必要的物质准备。这不仅是经济效率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的需要。我们最根本的国情是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占有率太小,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差别太大,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条件较好的东部不更加拥挤(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中是这样)。

## “行政区划观”

“行政区划”是与人口相关的。一方人口,才有一方“行政”。再加上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多年形成的一个观念是一个人是属于一个地界、一个行政区划的。如果说“乡土观念”是历史上自然经济或农业经济的产物,“行政区划观念”则是加上了一层传统计划体制的色彩。于是才有了“你们”、“我们”的区别,才有



了“你们不玩了、我们就倒霉了”的说法(见孙可庸文)。市场经济越发展,全国的大市场越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越是需要我们改变传统观念,建立起以下的两个新观念:

第一,就个人来说,应该逐步形成“我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或“整个国家都是我的”的观念,而不是眼睛仅看到自己目前所在的区域。个人就业、居留的选择的空间,应该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之内。原则上说,只要我到另一地区工作的预期综合收入(所谓“综合”,意指还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地位等;所谓“预期”,则包含着风险)减去“迁移成本”(迁移不仅要花“搬家费”,“漂泊他乡”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种痛苦),高于我在本地区的综合收入,我就应该选择“出走”。现在对许多人来说迁移收益较低而迁移成本较高,有很大一部分是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这还一时取消不了,因为在一定时间内还需要适当控制人口流量,但从长远看,这种“全国选择范围”的观念应逐步加强。“这一代人”迁移、“出走”的成本太大、收益不高,已经难以改变了,但“下一代人”走出去就可能是有利可图的(现在“出走”的其实也正是“下一代人”——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一代人”自愿迁移或“带头”迁移)。

第二,就政府来说,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决策人,都应该逐步形成“人均收入”的观念。市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消除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地区差异,而只能消除不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对于某些相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条件较差的地区来说,鼓励人们“出走”,把较少的收入留给较少的人来分享,是好事,是积极的、健康的政策。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较发达地区若也追求“人均收入”增长率,它们就会设法阻止人口的进入(这种趋势正在形



成)。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人口迁移的背后也是利益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第一,需要中央政府发挥作用,作“利益协调人”,自觉地用不同的“指标”考核不同地区的“政绩”,也就是用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的指标,而不是“发展水平”的指标来鼓励人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学者也该在这方面起点作用);第二,要相信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会要求生产要素更加顺利地流动。当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时候,他们才会“欢迎”人口进入,不如此,那里劳动力成本就会提高,资本就会流到外地,最终还是趋向人均收入的均等(我国一些较发达的地区目前已开始尝到了人为限制人口进入的苦头)。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经济学消息报》的编辑把两篇文章放在同一天、同一版上发表,一篇的作者单位在南京,属于“东部”,提出的论据是东部人口已经太多了,吸纳不了更多,“只有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力量(我理解是“西部地方政府”),增加投入,加快改革开放,开发地区经济来解决问题”;另一篇的作者单位在广西,属于“西部”,提出的论据是“向东部倾斜过了,该向我们倾斜了”。二者最终都得出了要缩小差距就只能由国家加大对西部投入的结论,但论据角度却不同,这颇有些“地方色彩”。地方利益也是需要有人代表的,也是学者的一部分职能,因此我对此不持反感,但我想我们大家总还有一些共同利益需要研究。

两位作者文章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国家对西部加大投入。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此原则上没有异议。但我之所以对“改变分子”这一做法不那么乐观并提出应在“改变分母”上多做点文章,是由于我对目前国家即中央政府那样做的能力与效果不那么乐观。由于十几年来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客观上形成的结果,我们目前正处在国家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相



对下降的历史阶段,国家能拿出的钱越来越有限(中央政府财政紧张,也是件客观规律决定的事,而不是“下决心”扭转就能改变的事),这笔有限的投入放到哪里去才能更有效地加快现代化进程,用少量投入“引来”较大量的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尽快使我国经济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人为地设计、一厢情愿地加以安排,不是办法,这点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此外,需要注意到并认真加以思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几年国家投入到西部的资金中有很很大一部分自己“孔雀东南飞”,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内陆地区转移投入过来的资金,这种态势下国家再追加一点投入能扭转局面么?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下客观条件和客观趋势,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出可行的、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 题外话

一篇文章只能论说一种论点。“很全面”的文章可能是正确的文章,但可能是没有人看的文章。我说了“鼓励资本进去、鼓励人口出来”的话,也还可以说得更多,“既应该这样,也应该那样(目前也应该适应加大一些投入)”,但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当前需要着重认识的问题是什么?应该着重纠正的思维偏差是什么?

《经济学消息报》组织了这方面的讨论,很有意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对我进行批判,大家共同深化我们的认识。扭转东西部差距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协作,任何一条单独的政策都不解决问题。同时,东西部的划分只是笼统的划分,还有许多具体的区



域条件需要具体分析。有些西部地区具备充分的条件发展起资源密集型产业,国家对基础设施的一定投入能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地的落后局面,当然需要中央政府有所举动,对这些地区来说恐怕是一个人口如何迁入的问题,而不是迁出的问题。还有,有许多基础设施,比如一些连接边远地区的公路、铁路主干道,无论如何早晚是要建的,为了加速缩小地区间差距,尽管目前回报率低些,也不妨“提前投入”。从大趋势来看,西部的人口正在越来越大规模地出来(出来的不仅是傅文中所说“高层次人口”,“民工”其实是目前人口移动的主流)。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目前看来仍十分健康的伟大变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收入”汇入西部,这则是资本要素“内向”流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程度的加大和这些年基础设施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正在向内地投入,当然还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较远的地区,但这一要素流动的趋势正在形成。这些变化都不表明“彻底的市场经济”不会在收入平等上起好的作用或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而恰恰表明了市场的力量(说到底是人类自然理性的力量)正在开始在新的机制下发挥出作用,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更大的平等。我不期望平等会很快到来,但我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人均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停止下来并发生逆转。



# 发展阶段与技术 战略的选择





## 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是要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使更多的人能够关心资本效率、珍惜资本的使用;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总会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经济项目,如何选择生产技术,如何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内涵式”、“集约化”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发展中的经济(后进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珍惜资本”,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最为稀缺的资本取得最大的增长?我们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避免哪些偏差?这些问题目前似乎很有必要加以广泛、深入的讨论,纠正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四种基本生产要素: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土地)与劳动。一个落后的经济,是否能追上先进国家(有的人否定过去的发展战略,也否定“追赶”本身,但事实上,后进国家如果不能缩小与富国的差距的话,就等于没有发展,就还要在经济上处处吃亏),就取决于是否能很好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发挥比较优势,克服和扭转不利因素。那么,我们的经济有哪些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呢?我们第一没有资本,作为落后国家,资本积累薄弱,这是所有落后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第二,我们从总体上说也没有先进技术。中国与世界上一些落后





国家的差别在于我们历来比较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在过去四十年中在国家的支持下有了一定的发展、还有世界上杰出华人科学家的支持,因此在某些领域内我们拥有一些新的科学技术,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优势,在绝大多数领域,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科技领域内,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第三,自然资源也不是我们的优势,人多地少,矿产不丰,个别地区有一些资源优势,但总体上处于劣势。我们在世界上真正处于优势的,就是劳动力,大量的、在长期内可能做到“无限供给”、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高于其他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要想追赶上先进国家,实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有效地利用资源,不可能靠一种“资本密集型”经济(美国、日本);也不可能靠一种技术“密集型经济”(西欧),也不可能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经济”(中东、澳洲),我们在发展的初期,在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想持续增长,还主要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经济,依靠我们“劳动成本低”这一基本的比较优势,来吸引资本、引进技术、换取资源,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扩大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本质上说是“珍惜资本”的产业,是用较少的,尽可能少的资本来创造更多的、收入较高的工业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增长方式,即一方面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争取最终缩短与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因为从长期看经济的实力最终取决于科技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仍要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产品有市场、有市场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看上去很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珍惜资本”。没有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没法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也没法解决,就不可能用有限的资本推动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许多高新科技,不用花钱(资本)去买,我们当然可以用全部资本去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来解决就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多少世界水平的高新科技,需要用宝贵的资本去买,所以必须在发展高新科技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进行合理的经济的选择,不能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我们大量劳动力这一优势来吸引资本和技术到我们国家来与我们的劳动力相结合,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捷径。如果我们能依靠我们劳动力成本低这个比较优势把全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吸引到中国来,我们将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快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科技的发展。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工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也是实现发展过程中收入均等,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是经济能够不间断、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如果我们一方面用有限的资本去发展少量技术密集型产业使少量的劳动力就业并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在另一方面让多数劳动力仍然挤在狭小的农地上耕作,收入长期不能增长,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久,很快会因收入差距拉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而被打断。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能迅速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本身也是“劳动密集



型”的,但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集聚。我们中国有些地区过早地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目标,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是没有就业增长,人口流动放慢,市场不能扩大,也没有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也没有多少高科技产业,最终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过早地进入了“衰落时期”,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成了落后者。一个地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习惯地谈论“发展战略”,好像如何发展还是要由政府战略来决定的。但事实上,如果把问题放到市场竞争当中去,投资者会选择什么?这里所说的投资者,当然不是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的那种不对资本负责任、不关心资本效率的投资者,而是真正负责的资本投资者。无论从理论分析中还是在现实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都是:他在中国具体条件下,首先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在这里资本价格较高,高新科技的价格较高,土地的价格也较高(开始时不高,但很快会高起来),而只有劳动成本最为便宜。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就完全不能搞其他类型的产业,但我们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因此,讨论“增长方式的转变”,核心问题只在于如何节约资本,使资本的使用更加“集约”,减少浪费,而不是要改变发展节约资本、也节约购买技术费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似乎有必要特别防止片面地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片面追求所谓提高“技术档次”,过早地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人为地对其设置障碍(比如有的地方明文规定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限制劳动力注入、不搞多少元资本以下的项目,等等)。如果我们现在把钱都投到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这



样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并不是要人为地限制其他产业的发展，也不是说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选择新技术、新产品，关键的问题只在于要相信市场的选择，不要人为地不鼓励以致限制另一些产业的发展。现在在我国国内有一些人瞧不起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他们的技术水平低，“档次低”，有些条件下利润水平也不高，但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有了这么大的发展，我们有那么多的外资进入，出口有那么大增长，我们的就业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多数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实惠，主要依靠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能“过早地忘记”了这一点。



# 论竞争力

——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效益关系的思考

去年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国人更加注意到一个概念,即“竞争力”。在对东南亚危机的讨论中,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一些国家因外汇汇率缺乏灵活性,导致币值高估,出口成本提高,从而使该国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而货币贬值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

——一些国家的企业和银行在政府保护下盲目扩张、“贪大求洋”、不讲效率,导致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

——一些国家在经济“泡沫”的刺激下盲目扩大消费,加上房地产市场上楼价飞涨,导致工资成本上升,也使“竞争力”下降。

——一些研究者提出,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及时完成“产业升级”,即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科技产业的过渡,所以“竞争力”不足,最终导致出口下降,发生支付危机,所以要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是“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以上例举的这些论点,有一些本身是很值得争议的。但无



论如何,这些讨论不仅使我们更多地注意到了“竞争力”的重要性,而且已经表明,“竞争力”是一个相当“综合”的概念,包含了许多方面的内容。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发展,追上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竞争力”这个概念,才能少走弯路。

## “竞争力”的概念

狭义地说,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处的地位。而商品怎样才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呢?简单地讲就是同样质量的产品(售前、售后服务都可以包含在“质量”的概念当中)具有较便宜的价格。而怎样才能有较便宜的价格?最终是因为具有较低的成本。所以,竞争力的概念最终可以理解为“成本”概念:如何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同等质量的产品,或者,反过来,以同样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

由此可见,就基本内容而言,竞争力的概念既不复杂也不特别,它所涉及的不过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内容。就如何提高竞争力而言,也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药方:一是改善技术,实现创新。一方面研究出更新更好的产品,另一方面更多地节省生产成本;二是改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以使资源的配置优化,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竞争力”的概念究竟有何特殊呢?特殊就特殊在,它是一个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学概念,因为它除了“技术”和“制度”(包括“管理”)这两个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包含着“比较优势”的概念。



简单地说,“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不同,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存在差异,从而会影响到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成本存在差异。

对于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企业来说,我们可以假定生产要素是充分流动的(当然现实中也会有一些差异),企业面对的是同样的要素市场。但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有些要素还是不可流动的。第一,土地、矿产、自然条件等自然资源,是无法流动的;第二,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是不允许流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的就业及收入水平,不允许外国移民来与其竞争),由此造成了要素市场的分割,从而使得在国际经济学中的“竞争力”概念,包含了“要素成本”和“比较优势”的内容。

## “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比较优势”的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特别重要,因为正是“比较优势”的存在,提供了落后国家得以发展、追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与可能。

“落后国家”的落后,体现在各个方面,一是穷,没有钱,没有资本;二是缺乏技术,不掌握高新科技,教育水平也低,缺乏在科技前沿开发新科技、新产品的研究能力;三是市场机制不健全、管理水平低、市场经销经验少等等。落后国家的企业,刚刚发展,势单力薄,也不具有规模效益,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称霸多年的国际大公司的挤压。从这些角度看,落后



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企业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缺乏竞争力,初看上去简直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更不用说迎头赶上了。

幸亏有一个“比较优势”。对于落后国家,即使是对那些人多地少、自然条件也不好的落后国家来说,至少有一个条件可以使它们在国际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那就是“穷”——收入水平低,工资水平低,从而同一产品(只要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所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竞争力”这个概念中最有意义的首先是“比较优势”的概念,而不可能是高科技。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往往是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分不开的,因为只有这种产业才能发挥劳动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如果一种产品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成本所占比重微不足道,发展中国家在最初就很难有竞争优势;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就会相对地具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只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入手发展经济的基本道理。谁抓不住比较优势这个因素,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做足文章,谁就没有发展和追上的机会。

## “落后的优势”

另一个使落后国家得以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因素是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指作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观察,以较低的代价掌握到先进国家经过探索而获得的知





识、经验(教训),包括那些已经不再是当今的“先进科技”、但过去曾是“先进科技”的知识与技术,同时可以从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这就是知识“外溢”过程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

就科学技术而言,人们当初把它们发明出来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会得到创新初期高额利润的补偿。后来,通过模仿过程和知识“外溢”过程,这些科技知识逐步变成了“免费”的东西,可以为大家共同利用(这时当然也就不再存在“创新利润”)。就“制度”而言,一种有效的制度(法律、规章等等)的形成,往往也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痛苦的“试错”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以至战争等等才能形成;而它们一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人就可以模仿,可以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而不必自己付同样的代价(这次东南亚危机就可以说是我们“免费的一课”,可以使我们以后少犯同样的错误)。这种因素的存在,也为发展中国家不仅提供了增长的机会,而且提供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缩小差距、“追赶上去”的可能。

但这种“落后的优势”也表明,落后国家的优势,不在于前沿的高新科技,而在于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已有的科技、管理知识,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最终也能走到科技进步的前沿。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产业的特点,不在于新技术的“创新利润”,而在于学习与开发成本的低廉。

## 发展高新科技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要想“追上”发达国家,最终需要靠有较为完善



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改革,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最终要靠本国科学技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和高新科技的发展,真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新科技产业之所以有“高附加值”,说到底是因为它们存在着“创新利润”。我们现在的许多“传统产业”,附加值较低,其实是因为已不再存在创新利润,人人都可以生产,虽然它们在最初阶段附加值也是很高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从一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发展科技、教育、高新科技产业,是不错的。它是一个必须充分关注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现实当中,“科技研究”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这方面领先,是他们多年来教育、科技发展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高新科技研究与开发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在一天两天,甚至不是在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内可以发展、培育起来的。甚至,即使少数几个人发明了一种技术,要把它变成实际的生产力,变成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还需要大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在工艺、材料、生产、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上把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融入到产品中去(同一种产品在发达国家“本土”生产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就会出现质量上的差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必须尽早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特别是教育)的重视程度,努力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高新科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恐怕还很难靠高新科技的“先进的优势”,而主要还是得靠“比较优势”和“落后的优势”。这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保持自己经济增长和产品出口的势头。



仅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解决最终“追上去”的问题;仅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认识的问题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最终走向高新科技产业的必经之路。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使一国的财富和资本得以逐步积累起来,市场得以扩大,从而为发展教育、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供物质基础。试想,如果在一国发展教育和提高科技的一代或两代人时间内(这时一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高新科技方面的竞争力),若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教育与科技的发展计划最终也会落空(这是一些落后国家走不出“落后的怪圈”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本身也是一国提高生产技能、管理知识和市场经验的过程,是提高本国国民整体科技水平的过程。知识、技能、科研能力等等,都不是一下子能提高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也不是仅靠书本传授就能获得的,而是要靠生产实践和市场实践逐步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若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也是有较大科技含量的,它的发展本身也是一国科技水平提高的过程。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也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从最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之间,会有一个逐步“升级”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一国可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靠学习、引进、消化先进科技,以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在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方面逐步接近发达国家,为最终在科技方面达到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水平,奠定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能首先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为基础发挥作为一个发展国家的竞争力,我们就不可能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并取得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竞争力。

## 避免急于求成的错误

经济学一切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以多大的成本(机会成本)为代价获得多大的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都渴望发展高新科技、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于存在“落后的优势”,我们可能比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走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急于求成,我们也会因“成本过大”而丧失我们的竞争力。

应该看到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相当长的阶段上,发展高新科技的成本会上升得比别人更快。这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基本原因造成的:

第一,由于在整体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上存在差异,同等科技支出在发展中国家所能取得的成果,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这种情况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是: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向发达国家购买(引进)技术。而引进前沿技术的费用,必然高于发达国家的发明成本,因为这时发展中国家至少要支付一项“专利费用”。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较高成本,还表现在即使购买到了同一技术,由于整体素质较差,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也可能较差,只有卖得更便宜,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价值/成本比较低。

第二,“同等支出”,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更大比重的人均GDP;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较高,这也仍意味



着较高的机会成本,意味着必须减少在其他同样急需的投资项目(如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上的支出,减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如果这超出了一定范围,会损害整体的经济发展。

这两种导致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成本过高的原因,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花费过高的成本追求高新科技发展,结果,企业负债过高,没有利润以致亏损,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外贸赤字加大,国际收支失衡,外债增加,增长速度下降,等等。韩国最近的经济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前一阶段片面追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急于求成,导致成本过大、难以为继,高新科技的竞争力没有形成,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又丧失了,不能不说是陷入危机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东南亚一些经济出现危机,不是因为搞高科技产业太少了,而是在现阶段上太多了,急于求成、“贪大求洋”,最终陷入了困境。

与美国、西欧等国相比,东亚、东南亚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当然不是主要领先高科技的发展,因为它们作为落后国家,运用高科技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一时又难以赶上先进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对它们来说,在这一阶段上,最符合经济理性的恰恰是首先用足、用尽比较优势即其“廉价的”劳动投入(这时全要素生产力自然也就较低),逐步提高科技开发能力,然后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升级。不如此,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反倒会出问题。台湾、新加坡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甚佳,原因之一恰恰是它循序渐进,逐步实现比较优势与高科技产业的替代过程。而在这些年急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韩国、马来西亚等,最终却因竞争力不强、出口下降、贸易赤字扩大陷入了困境。这才是我们真正吸取



的一个教训。

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后,许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出问题是没有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理论上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些人就是没有问一个实际的问题:“产业升级”是一件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事情吗?升得上去当然好,一时(可能几十年)升不上去怎么办?

我国的一些城市、地区,最近几年也发生了片面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情况,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结果是大量的投入没能换来新的竞争力的形成,比较优势又丧失了,弄得增长率下降,企业陷入困境。也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科技含量” 与“适合的技术”

有的人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与发展现代科技无关的。而实际上,在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市场上,能有竞争力的产品,也已多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比如许多电子产品、纺织、制衣、玩具等等,它们仍需要较多地利用劳动力进行加工,但这些产品(如电子产品、玩具等)本身就是现代技术的体现,若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工艺以保证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如制衣、制鞋),也不可能有竞争力。

由此可见,那种把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局限于少数“高新科技”产业,而忽视或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很难取得比较优势。印度的例子可以引以为戒。印度最近几年来已经在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但仍只允许外资进入“高新科技”



领域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对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措施,理由是要把这些部门“保留”给本国企业去做,结果是这些部门还是迟迟发展不起来,倒不是因为缺乏资本,而主要是缺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营销手段等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的“科技含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新的高科技,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现阶段来说,可能还是高新科技。由此也可以引出发展经济学中的另一个概念,即所谓的“适合的技术”(proper technology),也就是“适合于一国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它不一定是国际最新的,但可能对一国仍是新的,又是使该国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比较优势、实现最大增长的技术。“适合的技术”这一概念的一个优点还在于它显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适合与不适合是依一国的发展阶段而定的;利用这种技术,并不意味着停留在这一特定水平,而只是一个发展阶段,是一国发展科技能力的一个特殊阶段。

以上的这些道理,对一个国家适用,对一个国家中的一个特定的地区、城市、企业,也是适用的。

## 警惕竞争力丧失的其他原因

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存在,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工资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工资会随着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有所提高;而一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市场需求的逐步扩大。但是,如果劳动成本增长过快,也会对一国的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劳动成本的提高,主要会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



第一,“高消费”。韩国 80 年代末以来由大公司带头实行高工资、高福利,社会风气也开始崇尚高消费,结果导致工资成本迅速上升。这是它最近一些产业和企业经营状况下降、经济过早出现“空心化”(企业只好到国外投资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原因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实力雄厚、处处想挤压弱小的国际大公司和世界强国,资本积累任重而道远,比较优势万万不可过早丧失,“消费早熟”、高福利等是要千方百计避免的事情。

第二,房地产过度投机。房地产过度投机、形成“泡沫”,导致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楼价过高,从而导致工资成本过高。最近几年东南亚国家中或多或少都发生了房地产过度投机的情况。他们竞争力的下降与这些不无关系。

第三,币值高估。若实行固定制度,而国内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或者发生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就会发生实际汇率提高、币值高估的情况,结果是出口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

## 结束语:提高中国的竞争力

以上的分析表明:

——“竞争力”的概念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综合的概念,既意味着制度改进、技术进步,也意味着发挥比较优势。

——对一个人多地少、技术落后的穷国来说,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从而保持发展速度、缩小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在重视教育、科技能力的提高的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充分注意保持与发挥其比较优势,在努力进入高新科技领域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现代市场中技术含量已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积累知识和技术，并赢得时间发展教育，从而得以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形成真正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新科技开发与利用能力。

——在此过程中，其他经济政策，如工资福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外汇政策等等也都要充分考虑到防止工资成本提高过快，防止过早地丧失一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过去形成了一定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能力，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同时又存在着大量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因此，我们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展的条件：一方面可以努力发展教育与科研，逐步进入高新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比较优势，从各个方面取得国际竞争力，使我们获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现在的任务是，认真分析和吸取东亚、东南亚国家在竞争力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教育水平和科技研究、开发、利用的能力还很差，与先进国家相比在国际上还很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在努力发展教育科研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主要依靠劳动成本低这个比较优势，还要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在投资项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引进外资等问题上，千万不可片面强调高新科技产业，把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在相当长时间还形不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去，导致资源耗费过大、发展成本过高，不可过早地忽视以至歧视、偏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早地丧失我们的比较优势、丧失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1998年4月14日定稿于北京



#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地增长？

——关于“克鲁格曼质疑”的分析与思考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提出质疑，至今仍引起世人的关注与争论；东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在今后进一步地增长，缩短与西方的差距；下一世纪经济增长的“重心”究竟在哪里，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对各种长期增长要素的分析入手对有关持续增长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克鲁格曼的许多论点都有可质疑之处，最主要的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劳动投入增加、技术进步费用和资本积累等等方面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劳动就业的增加和工资收入的增长，是发展的内容之一，也是进入高科技型增长之前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必须为所购买的先进技术设备（知识产权）付费是以成本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穷国与富国之间经济收入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积累率持续地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对东亚各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差距。



## “克鲁格曼质疑”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1994 年底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Krugman, 1994),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提出质疑(我们不妨就称作“克鲁格曼质疑”),至今仍引起关注与争论。这当中有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而克鲁格曼的一些论点,也大有可质疑之处。

克鲁格曼的论文要点如下: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日本以及中国等地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因为据研究,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就像当年苏联式的经济一样(他将新加坡与前苏联进行了类比),主要靠的是投入的增长,而不是靠效率(“全要素生产力”,TFP)的提高,这种“投入驱动式”的增长是很难“持续”的,因为到头来这种增长会遇到要素数量本身的限制,劳动投入无法再增长,教育水平很难再提高,资本积累也很难维持在高水平上,而国外资本的投资目前也多是投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也是以拉美国家为主,并不是东亚,所以他断言,一方面不存在什么“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也预言,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久就会慢下来,追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下一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也不在亚洲,而仍在西方。

首先要说明的是,克鲁格曼所说的“投入驱动式”增长与我国目前谈论的“外延式增长”有共同之处,也有所差别。在我国,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投入品本身的经济效率太低,无论是企业的效率还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存在着技术水平提高



不快，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增长的问题。而克鲁格曼的分析，是在假定企业的资源利用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技术质量太低、技术进步速度太慢，主要靠投入的增加。但这两种情况在宏观层次上都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即 TFP 提高的程度较低、速度较慢。只不过，在经济体制存在问题、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更慢罢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前一方面的问题即“体制效率”低的问题是我们尤为严重的“特色”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前苏联有相似之处），不可与后一个一般性的“技术效率”问题同日而语，却更值得我们的重视。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经济当中因体制问题所引起的特殊的效率低下问题放在一边，看看克鲁格曼对于东亚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批评是否成立。

## 劳动投入、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

投入品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无非是两种，劳动与资本（各国的土地是给定的“禀赋”，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先看看“劳动”这一要素。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失业或隐性失业的国家来说，“劳动投入”的增加，本身是一件大好事，是所谓“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甚至是目的之一：原来没有工作或没有收入的人现在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正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像中国这样的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因为要尽量多地把大量的劳动力



“投入”到有价值的生产活动中去。所以说，如果是由于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工资的增长较快<sup>①</sup>所引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多大的提高，仍然是一种进步，是劳动力较多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不经过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也就无法进入下一阶段，即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这样的阶段，现在用发达国家的情况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一阶段进行比较，说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靠投入增加，技术进步不如发达国家快，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也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难道能够期望发展中国家不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主要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努力增加就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而是一下子就能领导科技发展新潮流并且主要靠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效率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吗？东亚国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大量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到收入的工业生产中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将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直接进行比较，得出一个“东亚无奇迹”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克鲁格曼提出的问题是：当一国劳动投入的增加“到了头”，没有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投入，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下来，所以无法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当劳动转移过程基本结束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自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但这完全不能否定由于资本积累率仍然较高（见后面的论证），技术进步速度加快（见后面的论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可能高于发达国家，相互间的差距仍会继续缩

---

<sup>①</sup> 正如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指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关系到多种生产要素的经济指标的时候，要使用“要素价格”或其“回报率”作为权重。



小。其次，这一因素起作用的“可持续”时间的长短，显然取决于一国劳动力规模的大小。对于韩国、新加坡、台湾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劳动投入增加效应的可持续性自然会短一些，而像中国这样 12 亿人口的经济，劳动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长得多。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如果韩国、新加坡、台湾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在起飞阶段可以有 20 年的高增长，中国有 30—40 年的持续高增长理论上就是可能的。

更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劳动就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达到较为充分的阶段时，劳动投入增加这个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虽然开始减弱，但往往标志着一个经济已经发展成熟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此后技术效率的提高将取代劳动投入增加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后一阶段能否实现当然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但不经过劳动就业增加这个阶段，经济也许就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西方国家过去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以一种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当劳动是一国的比较优势的时候，这个国家当然要首先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才能逐步发展起其他增长的能力，主要指的就是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在开始阶段无论如何不是发展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劳动投入增长率的下降虽然是引起增长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却完全可能意味着其他一些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的形成。本文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就一定会进入技术进步加快的新阶段，而只是想论证这种被克鲁格曼完全忽视了的历史可能性（其实东亚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几年的成长已经证明这完全是可能的）。



## 资本投入、技术引进与发展中国家 TFP 的度量

TFP 提高不快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要素”投入较多。由此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投入的增加,而技术进步速度不快。

前面提到的资本利用效率不高,是我们中国仍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此存而不论。这里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投入量相对(于产出)较大,并不等于在这样的国家里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而只是原有技术的加倍复制。症结所在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己还不具备开发新技术的优势,经济的增长、与先进国家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先进国家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性差别:由于新技术主要是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当成一个整体,不妨假定在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同等程度地实现着技术创新与技术)发明的,新技术的使用直接意味着 TFP 的提高(TFP 的含义就在于“无中生有”,用一定的投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使用新技术、新设备却都是付费的(这正是所谓“知识产权”之争的核心所在),而且所付出并不止于先进国家投入的那点研究与发展经费,而是一定要付全额的要素边际产出(这正是所谓国际市场的规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引进与使用(不这样就不可能尽快缩短差距)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且意味着整个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含量的提高,但 TFP 却可能不会有多大的提高,因为产出的高增长不过是靠



多花钱买到的先进技术所带来的。这正是一个经济落后、技术水平落后国家的悲哀,也是一旦落后就很难赶上的原因之一。而且,更有甚者,在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相对的),经济开始起飞、开始购买先进国家先进技术设备的发展中国家越多,先进国家的技术发明卖出的钱越多,它们的 GNP 就越高,从而其产出一投入之比就越高,其 TFP 的提高程度就越大。

事实上,仅仅因为发展中国家同一单位资本品投入的价格“较贵”,而计算投资品时要使用价格指标这一原因,就足以产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TFP 却提高不快(不如发达国家快)这样的结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这位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却简单地指责发展中国家 TFP 增长不快,而不提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免费或低价的技术援助,是一种典型的从发达国家立场出发考察问题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高增长而 TFP 提高不快的事实提示我们自己要在发展的早期就要给予教育和科研以足够的重视,给予适当的投入,才能尽早地靠自己发明的技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发达国家由于付得出高薪,能吸引走发展中国家大批受过较好教育的科技人才,也是它们 TFP 提高快而发展中国家 TFP 提高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以上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到一起,“克鲁格曼质疑”倒是真正提醒了我们以下的问题:我们能否在经济起飞阶段,在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的过程中,在引进技术(以及引进资本,见后面的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活动的加强,通过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消化、掌握到手,从而在逐步缩短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前提别的都谈不上),进





人自己进行创新(各方面的创新)的阶段,从而也实现 TFP 的大大提高?可以说,我们一天没有进入这一阶段,我们就一天还没有在国际经济中成为一个“平等的对手”。

## 资本积累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

今天花高价购买技术而对未来 TFP 提高的积极影响,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无法靠 TFP 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而只能在我们的教育、科技发展之前、在技术上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之前,不得不靠别的方式实现增长。别的方式是什么呢?那无非就是克鲁格曼所说的“投入推动型”增长(请注意我国使用这一概念时还会有一些前面说过的特殊涵义)。而这种增长无非又意味着以下两条:(1)“拚命劳动”——利用我们惟有的要素即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收入,这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点似乎正在被我们的一些同胞所忘却);第二条就是“拚命攒钱”——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和增加了的收入,较多地用于投资即资本积累,去购买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这也是一个再浅显、再直截了当不过的道理,绝没有什么“发财的诀窍”,中国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全世界几乎首屈一指的投资率或积累率——80年代以来经常在35%—40%之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无不得益于较高的积累率。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高储蓄率能否持久?克鲁格曼争辩说



它不可能持久,并以此作为论证东亚的高增长不可能持久的一个论据。一般的道理在于,居民的储蓄率和一国的积累率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因此随着经济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逐步下降。这种一般的经济关系总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关系究竟有多强?是否还有其他决定储蓄率的因素?这种“一般规律”的现实基础究竟是什么,能否直接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来?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引入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引入穷国和富国的差异这一因素时,经济水平越高储蓄率越低这一基于单个国家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规律,是否会因贫富差距这一因素的作用而无法明显地表现出来。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曾出现了下述的一些阻碍储蓄与资本积累的情况:一方面是投资者发现有利的市场十分狭小,有利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投资回报率逐步下降,除非有较重大的新产品(汽车、电脑)、新市场(汽车市场或国外市场)、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出现,资本所有者会发现在投资等待未来收益与当前消费、当前享受之间进行选择,前者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小,结果是导致国民储蓄率的下降。仅从个人消费活动的角度看,个人支出中的一部分是为了未来的消费,特别是为了未来购买汽车、住房这样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当经济发展,人们收入增长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购买汽车、住房之类物品所需的收入在一些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人们就会转而提高当前的消费,如旅游、服务业等等,这也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下降。

但这些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却是值得研究的。“发展中国家”这



个概念本身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存在的,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谓“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缩小以至消除这一差距。而这一“差距”的存在说明什么?说明了发达国家已经设立了较高的资本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标准(它们还在不断地提高这一标准),等着发展中国家去追赶。而这就意味着:第一,从生产者、投资者的角度看,你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辛苦地劳作,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收入低)这一比较优势,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才能逐步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进行竞争,在已经很拥挤的市场上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由于已经有了发达国家的榜样,企业与投资者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较明确的投资方向;第二,就个人消费—储蓄行为而言,发达国家已经树立起了较高的物质消费标准,如住房、汽车、室内装修、电器设备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进行长期储蓄才能实现。

以上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到以下的一些假说性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总会处于较高的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会在整个发展过程的每个阶段上都维持在40%左右的高水平。但总的说来会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的人均GNP只有500美元左右,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过2000美元左右,距离发达国家目前的2—3万美元的水平还相差甚远(今后它们也还会提高);中国的企业正在拼命积累以扩大规模力求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中国国内的广大市场还有待开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产品还有优势进军国际市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家庭正在节省着每一个铜板,希望有一天(10年、20年



之后?)能买得起梦寐以求的汽车、“洋房”,而目前一辆家庭轿车的价格还是一个工人年平均工资的10倍(发达国家是1/5),“攒够钱”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富起来了,但更多的人还未进入小康;所有这些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意味着我们较高的积累率,很可能具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

我们现在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倒是在于如何鼓励和维持较高的国民储蓄与积累。过去单纯靠国有部门进行投资与积累的方式已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也不利于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而吸引、引导个人、家庭把分散的小额储蓄变成长期投资(而不仅仅是变成银行存款)的机制还有待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债券市场等等)。相信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有利于维持我国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投资基金利用的效率不高导致实际资本增加率不高的问题当然也要靠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解决)。

## 能否持续地吸引外资

克鲁格曼论证东亚经济增长无法持久的另一个论据是国外资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不可能再持续增长。其原因在于:(1)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将较快增长;(2)对初步实现体制转轨的东欧国家的投资正在迅速增加;(3)已经走上市场化轨道的南美各国已经成为外资投入的主要地区,等等。

克鲁格曼的这一分析对我们的确有警世的作用。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对的竞争对手日益增多,人家也都有很多的比较优



势,我们自己若不抓紧进行体制改革,改善吸引外资的硬环境与软环境,甚至错误地对外资实行一种排斥的态度,我们就的确很难保住外资持续地投入,更不说有较大的增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方面有供给几乎无限的低成本劳动力,另一方面有着正在迅速扩大、谁都不敢忽视的国内市场。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两点优势,再通过改革克服我们在体制、政策方面的一些弱势,相信我们仍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更多地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确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快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外资不仅本身能带来我们急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与市场,而且还能产生一系列的“外溢效应”(如“示范效应”),使整个经济的整体实力有加倍的提高。这也正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争相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我们绝不可以以现在外资进来的不少、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开始放松这方面的努力,丧失掉追赶先进国家的大好机会。我们也不能出于保护国内原有企业既得利益的目的排斥外资。这当然不是说让外资大规模涌入一下子把我们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的职工推上街头。但是,不加紧引进外资,我们不赶紧追上先进国家,我们就会总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与进口其他商品有本质的差别,前者至少形成我们国内的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利用的是国内劳动力,而后者只是直接改善了消费。)

## 如何保持持续的增长

总之,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无奇迹”的质疑和东亚经济增长



无法持续的预言是缺乏说服力的,但对我们也不乏预警的作用,他实际不过是说出了许多不想看到东方追赶上来的西方文人想说的一句话:“想追上我们,没那么容易!”这无论如何有利于鞭策我们从各方面更加努力,真正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使本文所论证的“可能”,变为现实。概括地说,我们要努力做到的是(除了我们特殊的种种体制改革任务之外):

——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为下一阶段技术进步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

——继续引进、消化、掌握已有的先进技术,加强我们自己科技研究的能力,争取尽快地缩短与先进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从而尽快进入自己发明创造世界领先技术的阶段;

——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继续鼓励储蓄、鼓励积累,而不是鼓励当前的消费,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维持较高的国民储蓄率;

——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并力求使其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

说到底,要实现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多年梦想,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只有这一点是不可质疑的。



## 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复杂性 与理论的解释力

梁雪峰的文章把有关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概念中包含的一些问题揭示出来给大家看,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其实,不仅在TFP的实证检验问题上经济学具有局限性,在一切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计量经济学所致力于的经验检验问题上,经济学的验证目前都具有局限性,只不过TFP这个概念的验证上问题比较突出,即由于涉及的因素太多,太难以把握,争议也就更大一些。

但问题在于,TFP这个概念验证起来谁都知道有一大堆扯不清的问题(技术进步如何度量的问题是一个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但又非得用它不可,因为总得有一个较为综合的概念来评价一国经济的“增长的质量”。越是综合性强的概念,这一问题越突出。就TFP这一概念而言,最“谦虚”的说法在我看来还不是“TFP等同于科技进步”,而是等同于“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因为TFP这个“黑匣子”当中的确还包含着诸如经济体制、政府政策、社会组织(“social capital”)、市场经验、管理知识、社会道德、社会知识,以至“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无数的与经济成长相关但是又暂时无法明确度量的因素,特别是有关“质



的变化”的那些因素。经济学当然不满足于如此“谦虚”，所以总要继续努力，理论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就是要找到更新、更准确的、更科学的方法来对还不可测度的东西加以测度。这也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都清楚了的东西还说它什么劲呢？这也是一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多的一层“魅力”的原因（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因为“说不清楚”才“有意思”）。所以梁雪峰的文章说的都有道理，读来却让人有点不得要领，因为他似乎是在告诉人们经济学家们不过是在致力于争论一些目前争论不清的东西，没什么意思，不值得加以重视。但是不争论争论不清的东西又争论什么呢？

更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克鲁格曼质疑，比较有意义的问题在何处？在我的文章中，我对于阿文·杨的“铁证如山”中的那些结论本身并不想加以争论，我想做的是在首先承认我们的TFP就是较低这个事实的前提下，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低，然后看一下这个低的原因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就意味着克鲁格曼所说的“新加坡与前苏联一样”？作为前提的那个事实即“TFP低”本身就可以是有争议的，这是梁雪峰提到的最近几年有关争议中已显示出来的。而我想说的是，换一个角度，即使承认那个事实，也有许多东西是可争议的。这种争议当然也意味着需要做更多的计量与验证，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同一基本方法、同一些前提假定下（特别是在一些争议较少大家共同接受的前提假定下），去解释同一个现象，看看我们能否对这一事实得出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

比如，我在我的那篇“质疑”文章中想提出来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用较为严格的语言来说可以做以下的重新表述：

第一，关于劳动投入。让我们就先假定劳动力的质量没有





提高;但同时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较多、得不到充分就业而且廉价(这其实是落后国家收入水平低的同义语);同时,我们就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即成本的总量来计量劳动投入,就是说使用阿文·杨和克鲁格曼所用的同样方法(他们自己也已明确指出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说也知道这方法有问题)。在这三个大家共同使用或接受的前提假定下,我要问的问题是: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直到“穷尽”这一优势为止,大量增加劳动就业即劳动投入,算不算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进步”?是不是今后进一步实现经济进步(包括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经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必备的一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国家 TFP 较低是必然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否定这也是经济进步的一种表现、一个阶段。这当然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才能充分证实,但这首先有一个对“增长”或“发展”本身的概念性问题。

第二,再看资本投入。资本的质量是变化的,但难以用价格衡量,这当然是难题。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 TFP 较低而发达国家 TFP 较高这样的“比较问题”。这一点首先要有所注意。关于资本的质量本身,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国家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对此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假定(假定或假说是有待严格检验的理论说法,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初步的观察作为理论推理的依据),比如说假定在不同国家资本的质量即技术含量是不同的。但我想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如果我们假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只要能出到足够高的价钱,就能够买到先进国家所使用的同等质量的设备与技术(这一假定是否也较少争议?对中国来说这一假定在有些方面可能还不那么现实,但对其他东亚经济来说是相当现实的),再假定其他方



面的条件都给定并也都相同,但只假定一个国家是“落后”的,自己造不出先进设备,而另一国家是先进的,是新技术的发明者和新设备的制造者(这一假定是否也是争议较少的、较容易取得一致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争论较少的前提假定下能够进一步找出理由来论证落后国家的“劣势”所在,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论证即使落后国家使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技术上有了进步),TFP 还是会较低,从而可以论证存在着技术有了进步、增长质量有了提高但落后国家 TFP 仍较先进国家为低这种可能性,从而对看到 TFP 低就说落后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提高这种简单的理论提出质疑。

我想提出的假说就是:无论新技术的发明是一件多么有风险的事(如梁雪峰所指出的那样),但事后看,在科技进步速度较快的时代,新技术设备发明的成本代价,一定会低于新技术设备的(以当时产品价格计算的)“边际生产率”(这一假定是否符合一般常识并较少争议?——我不是说完全无可争议);而同一新技术设备,对于发明它的先进国家来说,其实际价格就等于其发明成本,而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由于是要“买来”,则必须支付市场价格,而这价格,根据经济学中大家都较为一致接受的原理,至少等于这一设备的“边际生产率”(假定不包括垄断的超额利润)。这就是差距发生的另一个可能性(不惟一)!而且,“更有甚者”,同等数量的先进国家所拥有的同等数量的先进设备,如果只能卖出一次(给一个落后国家),收益还不多;而若开始“经济起飞”从而购买先进设备的落后国家越多,先进国家的技术发明所能获取的收益就越多,它们的 TFP 也就会越高(这就是先进国家为什么那么注重“保护知识产权”而落后国家尽可能地想“偷”技术的利益根源所



在)。这一结论没有暴露出别的，只是暴露出落后国家“落后的悲哀”。但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落后国家即使经济在进步，TFP 仍然会比先进国家低的又一可能的原因，并表明落后国家必须“加倍努力”的必要性。

经济学还不能做很多事，因为理论不彻底、方法不完备，技术不完善，不仅任何结论和分析方法都是可争议的，任何前提假定也都是可争议的。这时经济学怎么办？怎么才能得出一些“较为确定”的结论，对问题给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办法只有是“求其次”，尽量把推理与分析建立在一些争议已经较少、已被较充分验证、价值判断较少的假定上来，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较为确定”。对“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读者泄露经济学还不能做什么的“天机”是重要的；但在已有的知识上尽可能寻找一些较为确定的对现象的解释，也是重要的。

其实整个经济学理论迄今为止不过只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最大的“求其次”的例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其实还不知道如何在各种情况下论证经济是否真的进步了——“社会福利”是否真的提高了。这是因为，由于“福利”或“效用”概念的个人性、主观性，我们迄今为止能够知道的只是“帕累托原则”所告诉我们的最少争议的结论：只有当社会上有人感到自己境况变好而没有人感觉自己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经济理论上把握地说社会福利比以前提高了，社会比以前进步了。而这不过近乎于一个同义反复。但你能说经济学包括“社会福利”这样的理论概念，不能解释问题，不能就许多复杂的现象给出自己的一些说法吗？人类的认识能力永远是有局限性的，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天机”，而是常识。而且，



正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也才能享受人类特有的“看法不一、质疑不休”的乐趣；但也正因我们多少还有一点“知”，所以才能“争论”，而不像其他低级动物，吃饱了就睡，根本不知道有“质疑不休”的麻烦。



## “基因泡沫”应会小于“网络泡沫”

“基因革命”的深入,解读人类基因组的成功,自然也使人们看到了生物技术商业应用的前景,看到了生物产业发展的美好明天,从而使投资者的目光也转向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生物产业。那些没有赶上信息革命“淘金热”的人们,跃跃欲试,想及早下手,赶上新一轮的“基因热”。

于是人们不禁会问,基因革命,是否也会带来资本市场上新一轮的“投资泡沫”?像刚刚在网络业中发生的那样。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的“投资泡沫”不可避免,也势在必然。首先,掌握基因技术的人和当初掌握电脑技术的人一样,都会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只要有投资活动参与,就总会有人去冒风险以追求较高的收益。其次,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因为其新,确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结构还不为人所知,必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盲目乐观和随后的盲目悲观,在市场上都难以避免;乐观时一窝蜂地上,悲观时一窝蜂地“逃”,都是市场上的自然行为。最后,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许正是市场的魅力所在:正是这种“泡沫”、“浪潮”,得以使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向新技术集中,使新技术得到发展,并在泡沫过后的市场重组中实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以使最有效率的企业、最能干的



人、最合适的产业模式,能获得充足的资金去开发利用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新兴市场。没有这种“市场泡沫”的出现,新技术的应用就会慢很多。一定规模的“投资泡沫”所造成的资金浪费,其实比“计划投资”所造成的浪费,更小而不是更大,虽然尽可能使泡沫小一点,尽可能地减少浪费,总是我们研究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的目的,对于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应注意防止盲目性,减少资本的浪费。

但是,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基因革命所能带来的投资泡沫,很可能要比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投资泡沫要小,市场的波动也会小得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生物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之间,在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而会使其商业模式发生很大的差别。

首先,基因产品从技术形成到产品投放市场之间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网络的产品可以很快地投放市场,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人类传递、处理、交换信息的方式,再怎么样也不会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而生物产品多数“人命关天”,不可轻易应用。结果就是,硅谷产品从技术形成到投放市场的周期可以以月计,而有的基因产品比如药品的试验周期就可能需要八年十年。即使不是药物,食物也有关人体健康(这也就是转基因食品目前仍在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对动物和植物进行的基因工程,也关系到是否会出现危害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存、危害自然环境、危害我们地球上自然状态改变和我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新物种”的出现。同时,人们对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福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已经表明,基因革命所直接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问题,要比以往其他历此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挑



战都大得多、复杂得多,非得先“想想清楚”再说,定一些“规矩”再说。信息产业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占有领先地位的市场上(如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政府规定,而基因产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公共规则的制定,以防范上述各种可能产生的对人的危害。而为了防范对人类的危害,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公共管制,而这就是必须更多地依靠政府的管理。这样,“企业家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速度就必然受到像“药检局”那样的政府机构的“官僚文化”的制约,这是我们不得不付、也值得付出的成本(其机会成本是对人的危害)。总之,由于基因技术与信息技术在与人的关系的性质不同,其转化为商业价值的速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基因技术在这方面可能要比信息技术要慢得多,“谨慎”得多。

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由一些来得快也走得快的新概念所推动,花几百块钱两分钟注册一个域名就可以开干,可以起一些谁也不知其确切含义的名字,如 Yahoo!, Sohu,而且有了一个新概念得赶快“卖”,今天是“第一”,“全包”,明天就可能被别人的相似网站所替代。而基因技术的专利,则必须是被精确描述的,来不得半点含糊。在十万个基因中,目前被注册了专利的只有 1000,大概还有一万个在等待批准。而要获得基因专利,你必须详细说明,这一技术是否“新”,是否能生产与其他药物不同的药物,而且要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一技术,等等。而一旦投资者获得了这一专利技术,他并不需要着急地到市场上“造市”,他手里拿着“真实的东西”,要选择最好的时机、使产品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推向市场。这就是说,在信息产业特别是网络业发展过程中常见的那种“抢占滩头”、竞相“造市”的做法,在生物工程中既行不大通,也意义不大。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中,通用性、标准性起着很大的作用,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较早进入产业的公司,飞速发展,成为具有垄断规模能力的大公司,迅速聚集起巨额资产。而基因技术、基因产品每一项都可能有其特殊的功能,通用性较小。而且,就基因技术本身而言,它的潜在用户只是为数不多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产品的确有广大的用户群),而不像一个电脑软件的直接用户就可以几百万、几千万(比如微软公司的“视窗”),所以说,基因技术公司的规模很可能是有限的,财富聚积的速度与规模也很难与信息产业相媲美。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市场上有许多家公司,每家拥有若干基因专利,生产若干种基因产品,长期经营,稳步发展。而不像信息产业那样,会在短时期内形成少数几个大型、特大型公司。

总之,生物产业从技术形成到价值实现的过程相对会较长,社会对它的约束(政府规定)会较大,市场上发生波动的程度,则会相应的较小。由这些因素推断,资本市场上的“基因泡沫”比起“网络泡沫”来,也应该会小一些。

研究基因革命的特点和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其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投资者减少盲目性,使我们这样一个“穷国”的资本利用得更有效率,而不是在过度投机中发生过度的浪费。应该注意到的是,解读人类基因组成功的消息,并没有使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的“生物板块”发生什么大的变动,而我们的股市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因为人家那里已经把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一点了。市场竞争有其一般性的规律,而不同的技术、产品和市场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只有全面掌握了各种因素,才能正确地分析和预见市场的走势,也才能更加有效率地配置资源。





# 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 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额外作用

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所谓的“政府主导”，也就是在一个经济中“集体行为”或政府干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包括运用强制的办法来推进市场环境的发育和完善，实行强制储蓄，实施某种“产业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企业发展、科技进步等一系列问题上也起积极的领导和干预的作用。东南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了政府干预的一些弊病，于是引出了有关政府作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究竟能做什么，政府是否可以、在经济发展中起干预的作用。

### 发展中国家“额外的知识”与政府“额外的作用”

讨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的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要作为前提搞清楚。第一个事实是，东南亚的问题是一组发展中国家的问題，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着一组“发达国家”，它们已经先行发展起来，在经济、技术、资本等方面已经位于优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处处挤压着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无疑又



会有它的特殊的优势,比如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没有这些东西发展中国家可能就只好永远地处于劣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讨论的东亚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特指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开始起飞这样一种模式,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指在同一起跑线上,哪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更好。发展中国家最终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自己更具竞争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当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实施赶超战略的潜在动机。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发展是有阶段的,发展较高阶段上出现的问题是与较低级阶段上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现在讨论东亚模式,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阶段的观点;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是错的东西在较低阶段可能是对的,反之亦然。

上述两个前提性的事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技术、资本、制度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发展?发展中国家究竟有哪些可以利用的特殊的优势?(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特殊的”优势)。当然,即使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优势,那也是落后的优势。具体来说我想作为发展中国家无非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可以利用:第一个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劳动要素相对充裕的资源结构下,劳动成本较低。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时,不管是政府选择还是市场选择,都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但人们现在往往会忽视另一个优势,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殊的“知识(或信息)”优势,也就是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即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方面的知识,也包括现代产业发展的经验与知识,甚至包括对付经济风险、经济危机的对策的经验与知识。这可以就用已有的那个“落后的优势”



或“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的概念来概括。

实际上,一切关于东亚国家“集体行为”或政府作用的争论,不管是“发展推动论”还是“市场增进论”都是假定政府可以在体制转型、在发展战略上集中各种知识和信息,然后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利用政府(通过政府)的特殊权力加以贯彻,以使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没有一点“额外的速度”,就不可能赶上去)。政府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集体行为或政府干预的效果是好是坏,其实最终都得在这一特殊因素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比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者说比起已经发展到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多发挥一块”作用,说到底要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体现而已)是否拥有“多一块”信息或知识,来加以论证。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前沿时,我们的特殊优势就在于可以“免费利用”那些已经成为“国际公共信息”的别人通过失败与危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知识,使我们的发展过程相对别人已经经历的过程而言,成本更低一些。比如,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对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用法律保护产权的重要性,对市场竞争的作用,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宏观经济对策等等,发达国家在多年(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有了经验,有的已经写进了教科书,可以供后进国家加以利用和借鉴,用不着发展中国家也通过那么多的曲折、“试错”、波动、冲突、危机的代价(这些东西现在似乎都被“智者”们忘记了)去一一重新获取,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市场增进型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产业政策,而在于运用政府权力,积极地推进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国是从一切由政府管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一般性的首要任务仍是如何使政府从大多数应由民间部门、由市场来做的事情中“撤离”出去,仍是减少政府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不应履行它应履行的职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就不应起到“增进市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引以为戒的,不是要放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仅仅是要将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放到“增进市场体制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提供法律保障、实施宏观政策等方面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些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东亚国家的经验则表明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对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否定和放弃这种作用,反倒是错误的,不利于发展。

## 发展阶段最高,“产业政策”越可能有害

以上这种建立在“多一块知识”基础上的政府的“多一块作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经济发展问题还不是那么复杂的时候,适用性显然更大一些。到了更高的阶段,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开始进入需要自己进行创新或已经能够在像“发展高新科技”这样的领域内参预国际竞争的阶段,其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到了这些“前沿领域”,首先是情况本身变化非常快(比如科技进步)。其次,既然已经是“前沿领域”,也就不再存在多少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利用的“多一块的免费信息与知识”,社会与政府所具有的知识优势相对来说就要少得多。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高,就越要求“集体行为”或政府的直接



领导与干预的作用越小,而由市场选择的领域要越大。

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所能起的作用。从各国的经验看,在两种情况下,产业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在发展初期,由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又有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产业政策犯错误的可能性小一些。二是如果所谓产业政策,只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用来与私人部门进行信息的沟通与政策协调(就像日本经济企划厅事实上所做的那样),产业政策所起到的提供信息的积极作用会较大,引起严重经济比例失调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这时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私人部门与市场,而不是政府。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中国式的国家管理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或是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如在日本和韩国),在产业政策被当成保护企业的工具的时候(如韩国),产业政策的作用一定是弊大于利,对长期的发展起到有害的作用。

## 最不成功的教训:政府保护下的企业

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一个具体的方面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果“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保护”,是政府指示银行给企业贷款,企业可以凭借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关系进行扩张,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就像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那样,则必然潜伏下日后的危机。

“政府保护下的企业和银行”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即使企业和银行不是国有的,在行为方式上也会与国有企业差不多,因为亏损或资不抵债后都可以依靠国家信誉、通过信贷扩张(或资本



市场、票据市场上的融资)而生存下去,事实上就是同样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也会产生许多扭曲,并使经济增长缺乏效率:

首先,钱来得容易,企业就会较少在提高内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所谓的“盲目扩张”就更容易发生。韩国销售额占全国97%的49个最大的财团1996年的净利润总和只有6500万美元,若把已破产的韩宝集团包括在内,韩国的令人骄傲的所谓“50大”或“50强”加在一起,1996年是净亏损。可见其效率之低,还债能力之差。

第二,钱来得容易,而且主要来自“公关”,于是就更多地在公关上下功夫,结果造成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这种问题一旦发展到政治危机的地步,反过来就会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韩国前几十年在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的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腐败,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结果造成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滑坡,构成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越低就越要扩张,因为人们都会相信企业越大,在经济中影响越大,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越是难以让其破产,所谓“马大不死”,把企业做大也就是让它变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到头来政府就越得解救它,也就越是把政府拉入了企业的圈套中去。一些人事后指责韩国缺乏好的经济学家,没能在事前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做出预警分析,但实际上,韩国不是没有世界水平的经济学家群体,只是在那样一种经济体制下最后经济政策的调整已完全受政治利益结构的制约,认识到了问题也已经难以解决问题了。

第四,盲目扩张,投资项目失败,但债务还要“滚动”下去,就要找新的“由头”,以吸引新的贷款或集资,于是企业就要设立新的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开拓“新的投资领域”,(老的领域没搞



好,别人已不相信,必须创造出新的说法),于是就搞出了一大批“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一个企业集团在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中经营,从根本上违背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西方成功的大公司绝大多数主业明确,几十年目不转睛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发展),不仅缺乏效率,而且很难在国际上具有竞争性。

这次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韩国,由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支付危机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与银行(金融公司)在政府保护下盲目扩张,导致不良金融资产过度膨胀的最终结果。所以说,在政府作用的问题上,最应当避免的首先就是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政府的所谓“产业政策”,如果最终也与这种保护联系起来,那一定也是失败的政策。毕竟,政府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不仅也会经常犯错误,而且会被利益集团所“捕获”,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损害经济发展。





## 关于政府作用的再讨论

东南亚危机后,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受到人们的挑战。人们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1)东南亚危机与东亚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2)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究竟能做什么,政府是否可以、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干预的作用,因为所谓东亚发展模式的首要具有的、可以说是最醒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经济中“集体行为”或政府干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包括运用强制的办法来推进市场环境的发育和完善,实行强制储蓄,实施某种“产业政策”,等等。

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是一个如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的问题。发展过程必然也是有曲折、有波动、有危机的;风险、危机等等可以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的和正常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怎么能够想像经济发展没有风险和危机的伴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危机的。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 30 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这次的东南亚危机再大也大不过 30 年代的危机,所以,简单地用现在的危机来否定东南亚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

第二方面当然是当前理论讨论的重点,即政府的作用问题。



而要想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两个重要的事实要作为前提搞清楚。第一个事实是,东南亚的问题是一组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着的一组“发达国家”,它们已经先行发展起来,在经济、技术、资本等方面已经位于优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处处挤压着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无疑又会有它的特殊的优势,比如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没有这些东西发展中国家可能就只好永远地处于劣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讨论的东亚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特指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开始起飞这样一种模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讨论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指在同一起跑线上,哪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更好。发展中国家最终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自己更具竞争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当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实施赶超战略的潜在动机。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发展是有阶段的,发展较高阶段上出现的问题是较低级阶段上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现在讨论东亚模式,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阶段的观点;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是错的东西在较低阶段上可能是对的,反之亦然。

我认为青木教授主编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没有突出地强调上述两个前提性的事实。这两个前提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技术、资本、制度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发展?发展中国家究竟有哪些可以利用的特殊的优势(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特殊的”优势)?当然,即使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优势,那也是落后的优势。具体来说我想作为发展中国家无非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可以利用:第一个就是前面大家讲到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劳动要素相对充裕的资



源结构下,劳动成本较低。我完全同意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再搞“贪大求洋”,不能在资源结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发展高科技,而不去根据成本最小的原则,在不同的阶段下不断利用“适当的技术”(proper technology),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东南亚各国成功就成功在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而出问题就出在了“贪大求洋”。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时,不管是政府选择还是市场选择,都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我想强调的是第二个优势,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殊的“知识(或信息)”优势,也就是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即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方面的知识,也包括现代产业、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经验与知识,甚至包括对付经济风险、经济危机的对策的经验与知识。这可以用已有的那个“落后的优势”或“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的概念来概括。

实际上,一切关于东亚国家“集体行为”或政府作用的争论,不管是“发展推动论”还是“市场增进论”都是假定政府可以在体制转型、在发展战略上集中各种知识和信息,然后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利用政府(通过政府)的特殊权力加以贯彻,以使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政府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集体行为或政府干预的效果是好是坏,其实最终都得在这一特殊因素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比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者说比起已经发展到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多发挥一块”作用,说到底要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体现而已)是否拥有“多一块”信息或知识,来加以论证。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前沿时,我们的特殊优势就在于可以“免费利用”那些已经



成为“国际公共信息”的别人通过失败与危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知识,使我们的发展过程相对别人已经经历的过程而言,成本更低一些。比如,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对于产权的重要性和用法律保护产权的重要性,对市场竞争的作用,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宏观经济对策等等,发达国家在多年(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有了经验,有的已经写进了教科书,可以供后进国家加以利用和借鉴,用不着发展中国家也通过那么多的曲折、“试错”、波动、冲突、危机的代价(这些东西现在似乎都被“智者们”忘记了)去一一重新获取,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这种建立在“多一块知识”基础上的政府的“多一块作用”,我想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经济发展问题还不是那么复杂的时候,适用性显然更大一些。到了更高的阶段,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开始进入需要自己进行创新或已经能够在像“发展高新科技”这样的领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阶段,其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到了这些“前沿领域”,首先是情况本身变化非常快(比如科技进步)。其次,既然已经是“前沿领域”,也就不再存在多少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利用的“多一块的免费信息与知识”,社会与政府所具有的知识优势相对来说就要少得多。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高,也就越要求“集体行为”或政府的直接领导与干预的作用越小,而由市场选择的领域要越大。

总之,我是倾向于肯定东亚发展模式中政府的特殊作用的,因为我相信“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特殊性,它一定与发达国家、与已经到了“前沿”的那些国家有所不同,不然怎么叫发展中国家,一定有它的特殊问题,也一定有它的“特殊优势”,不利用这种优势,使自己的发展进程有别于一般的、或者说有别于



历史地处在世界经济前沿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相反也和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所做的一样,反倒是错误的,是“浪费资源”(即浪费了那一块额外的免费知识)。当然,政府干预有政府干预的特殊问题。政府本身是一个官僚机制;民主制不健全则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在发展初期所搞的一套机制(包括政府干预与政府保护)之下会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会对体制转轨产生额外的阻力,想加快改革、及时“转入下一阶段”都难办到。腐败、过度投资、高额坏债等等,这些东西一旦发生,都可能积重难返,成为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根源。这些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东南亚经济危机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过,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没有缺陷的发展模式。避免了一类问题,会面对另一类问题。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于在发达国家挤压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来说,我不相信存在十全十美的模式。先抓紧时间发展起来,当了“富人”,去解决“富人的问题”,总比长期停滞不前,总在那里解决不了“穷人的问题”,要好得多。

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公共可利用信息和承担一些应由公众承担的风险,都属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一般性职能的范畴。而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这三个一般职能外,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特殊职能:即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就是充分利用那一块“额外的”知识或信息),推进市场制度环境的改善,以及利用国家力量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特殊职能在我看来正是东亚模式的特点,但也是引起争议的关键。讨论东亚模式,关键的问题是讨论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上的特殊性。我想是存在特殊性的,不然就没有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而东亚模式的特点也应该以这种特



殊性为出发点去进行分析。因此,我们现在要强调的除了上述三个一般职能外,还应包括这一特殊职能,以及这一特殊职能的合理性。强调这一特殊职能,是因为尽管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和技术,政府的优势也不在于收集世界上最新技术的信息,但是它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包括制度方面的内容。

(本文系根据会议发言记录整理)



## “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又到了制定新的“五年规划”的时候。国家计划和计划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究竟能做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其“合法性”问题,便又提了出来。当然这不是指当前的过渡时期,而是讲在市场经济各条件下。现在的确需要重视研究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问题,但究竟怎么搞,政府各部门怎么分工,现在很混乱,似乎谁都在搞,人事部也在组织有关宏观调控的研讨会,结果连世界银行的外国人都建议我们要赶快建立一个集中的宏观调控协调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理顺各方面关系,计委应该处在什么地位上,执行什么职能,是需要首先研究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从理论上讲三个相关的问题,从中看一下国家计委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个问题讲讲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政策、行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特指短期内的“总需求管理”;而着眼中长期的生产力发展则是增长理论和发展政策所要解决的,政府如果管的话,这可以称为“总供给管理”,产业政策属于这个领域;行业管理所要解决的是微观市场上的一些问题,如过度竞争、垄断以及其他利益协调问题。总之,从长期发展着眼,政府



可以做的一件事是经济增长规划和制定产业政策；从短期协调考虑，政府要管理总需求，防止经济波动；从利益协调角度，政府要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对市场活动进行“规制”。不管由哪个部门来管，反正有这么三件事要做。现在我们的一大问题是几方面的工作混在一起做，各部门什么都管一点，又都管不好，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相互冲突，效率不高。市场经济讲专业分工，以后政府各部门也要专业分工。计委在以上这三方面工作中，究竟管哪一块？这是先要确定的问题。三方面都管，再搞以前的“大计委”、“大综合”，不现实，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没人听你的。我看计委主要应统管的是中长期增长政策与规划问题，短期需求管理要有另外的专门的中央协调机构统管（这种机构还有待形成），应从计委职能中分出去。

第二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什么事都管了，多数生产、交换、分配上的事情，要由市场机制去调节，而政府职能最概括地讲，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这里讲的公共物品，不光是物，而是泛指一切为人们提供的公共福利而不具有“消费排他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

(1). 对产权的保护。这是由法律和制度保障并由政法、公安、国防等承担的职能。实质是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以利于人们能形成长远的稳定的社会和制度预期。保护产权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政府不管，民间也会自己来管，如“黑帮”、“索债公司”就会出现，其社会成本较高，不公平问题较大，显然不允许政府撒手，还要加强，但这显然不是计委的职能。

(2). 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是大家都能从中受益的一种东西。但前面已经说过，这应由总需求管理部门来管。





(3). 完备真实的信息。这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础说到底就在于假定政府能比别的经济行为主体拥有更加充分完备的信息(包括对现实的了解和对未来趋势的分析)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决策,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现在的一些经济问题都与缺乏充分完备的信息有关,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起到这方面的作用,计委也忙于行政管理,没有很好地做提供信息的工作。经济中的“协调”,包括利益协调和信息的协调、沟通。政府对企业、个人的“劝说”也是通过提供信息实现的一种调控行为。我想计委真正能做、应该做的正是这种事。日本企划厅这些年主要做的其实就是通过搜集、整理、研究现实与未来的各种经济信息,通过制定和宣传一种指导性的经济发展计划,向企业与公众提供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忠告”,达到协调经济长期发展的目的。

(4). 公共服务。泛指一切不具备消费排他性的社会服务。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经济生活中有些具有“拥挤问题”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公共交通等等则属于“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对政府来说,凡是具有消费排他性的东西最好交给市场去做,一些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产品生产也可以交给市场完成,但政府要发挥组织功能,像组织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事,政府必须做。但此事是否由计委做,我表示怀疑。不是不可能,只是这就要求计委对其他政府部门的行为有一种较强的行政约束力(比如对某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贷款补贴”,就不是计委能说了算的事)。这可以是一个在政府各部门之间重新分工过程中加以定义的事。计划中一定要体现出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但也可以只告诉政府各部门应该加强哪些建设,而并不一定由计委直接组织实施。



(5).有利的外交、外贸条件与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显然也不是计委的职能。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作为政府一部分的计委,别人无法履行而只能由计委、应该由计委履行的职能,主要就是向全社会提供有关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充分信息,最多再加上组织一部分公共服务的供给,如组织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是关于政府决策过程。

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决策过程不是纯粹科学的优化论证抉择过程,而是各方面利益或意见相互斗争、综合并折衷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议会(加上“院外”)斗争如此,我国政府的决策其实也摆脱不了这种“公共选择”的性质,迄今为止我们每一年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无非也就是这么一种“利益争斗与折衷”的过程,每个“计划”中都体现了向各种利益集团的妥协,并因此而总是显得“面面俱到”,没什么特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决策仍然会是这样。给定这个不可改变的现实,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加进一些全民的、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与各种部门利益(政府内各部门也往往仅代表某种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个人利益相抗衡,使最终的决策结果,更多地体现全民的长远的利益。国家计委并不能使政策部门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减小,但计委如果能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成为代表那种共同的、长远的利益的势力,提供有关保障这种利益的信息,对各方面进行“劝说”,使其在最终决策中得到体现,那就是计委的伟大功绩。市场经济条件下会特别缺乏代表全民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利益集团,特别需要在政府中有一个部门来扮演这种角色。

如果国家计委能够通过研究、制定指导性的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为全社会提供有关的经济分析与经济预测,对经济



中的各种市场行为主体进行“信息协调”，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代表全民的长远和共同利益，国家计委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下去的“合法性”就得到了保障，履行什么职能的问题、计划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也才能相应地得到解决。

当然，从现在的计委转变到那样一种计委，需要一个过渡或调整的过程，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方向，然后向这个方向发展。至于市场经济中的“计委”，还叫不叫“计委”，是另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根据发言整理



# 亚洲金融危机的 教训与启示





# 全球金融泡沫的破裂和亚洲金融危机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国际  
金融体系的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仅仅是单纯的区域危机，  
还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

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除了市场本身的规模化和机构化之外，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被广泛地用来对冲避险，国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联系和融合也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加深，对冲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以及跨国金融机构大规模地使用对冲避险策略等等，都被称为“金融全球化”加速的迹象。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成为以现代国际惯例而开放的“新兴金融市场”，资本流动性和全球化经营程度颇高的跨国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不断地将这些“新兴金融市场”融入到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据称在此过程中全球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回报率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将资本注入实体经济部门显得太过保守，



人们不断寻找可在短期内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方式,鉴于投资基金可观的回报率,向其提供融资的跨国银行没有履行其应尽的微观金融监管义务,而是轻易地向其大量拆出资金,对于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投资基金来说,融入相当于其资本金 20 倍以上的资金已是很寻常的事情。

尽管人们意识到金融风险可能随着金融资本的规模化和衍生化而急剧上升,但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既然金融全球化似乎使得金融市场运转得更富有活力,既然资本自由流动是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所信奉的理念,此时呼吁更严格的监管体系岂非不合时宜? 因此尽管金融资本在膨胀,经营杠杆率在升高,保证金率在降低,市场持续牛态,陈旧的金融监管仍然没有变革,例如对对冲基金离岸注册和“黑箱”运作方面的放纵,已经导致了对其他金融机构总体监管效能的弱化,但是针对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差别性监管的教条并没有放弃。目前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泡沫程度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际,几乎所有的跨国银行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金融组织都在指责这些遭受危机洗劫的国家存在金融经济问题,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纯的区域危机,而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从表象上看,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热钱的大量注入、本币币值的高估和国际收支恶化。但实质上上述种种现象均和资本流动密切相关,没有注入新兴市场的大量资本,就没有东南亚虚拟资本泡沫和钉注汇制下的汇率崩溃;当非贸易品和房地产等价格急剧上升,以至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其经常项目收支严重恶化时,同样也是国际资本“给予泰国等使用其美



元储备或举借外债来平衡赤字的选择,这至少可以使(泰国等)暂时避免对与本国有关的金融经济活动采取克制措施”(弗里德曼语)。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是借贷双方判断失误的结果,当一国大量银行坏账时,我们会说该国银行部门出了问题;那么为什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不同样自然地说,是跨国银行部门出了问题呢?当然并不是说亚洲国家自身不必对危机负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脱离了金融自由化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注入,亚洲国家可能就不会卷入这场危机。

为什么全球金融泡沫会选择在东南亚首先破裂?人们可以找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问题,诸如脆弱的银行体系、效率低下的企业、法制不全、腐败、裙亲资本主义、缺乏技术创新体系等等,但指出这些问题除了告诉发展中国家“你是发展中国家”之外了无新意。中国甚至比遭受危机的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更为严峻,自1992年以来其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房地产业和股市的泡沫也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持得相当好。所以中国的金融泡沫可能会诱发严重的内部经济问题,但它却不是全球金融泡沫的一部分。可见如果一国仅有内部经济失衡,而没有开放其金融市场的话,似乎不大可能卷入金融危机之中。那么在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之间就肯定存在着冲突,我将其称为“不兼容性开放”,它主要是指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管理能力和“过度”金融自由化之间的不兼容性,它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而首先承受泡沫破裂的危机。



##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缘何脆弱？不兼容性开放缘何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本内流和技术转让，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然会认定同时金融全球化也就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增长。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分享其参与全球化的利益，反而遭受着贫困、社会动荡乃至金融危机。为什么全球化这一为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府所赞美的东西，却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怀疑，难以接受呢？其根本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基点”不同，发展中国家受到一系列内部问题的制约，因而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竞争以及抵御国际金融风险时，显得更为脆弱。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国并不是能够引入资本和技术，再加上本地劳动力资源就可以获取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全球化可以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良好的市场管理能力并不能随全球化倏尔获得，需要较长的时间逐步形成，而健全的市场制度和良好的市场管理能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共享繁荣所不可或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而获益，同时，其他国家的游戏规则对其国内的制度建设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本国的人们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成熟的市场制度，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不了多少益处，仅仅因为自身的低效率就可能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架构合理的、富有效率的跨国银行完全可能利用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弱点而获利。那么为什么对市场制度进行改革呢？诚然发展中国家急需





改革和重组其经济,但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培植需要时间。发达国家经历了300多年才发展起较完善的市场制度,这包括健全的银行体系、有效的公司管理、普遍的法律规定、廉洁的政府和可行的民主制度等。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制度才只有二十至四十年的历史!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我们要不要对市场制度进行改革,而是如何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改革,是如何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所谓市场管理能力,不仅仅是指管理企业和产业所需要的诀窍,同时也包括政府在管理和规范市场、防止市场操纵所应具备的经验和能力。发达国家在其数百年的市场发展史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对付投机、操纵、内幕交易、垄断性勾结、腐败、欺诈等经验,针对无数的经济丑闻案和市场波动,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发达国家的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都成熟而富有经验。但这些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如果富有经验的跨国公司和书本经济学家们不停地鼓吹全球化的好处,而只字不提开放市场所蕴含的风险时,那情况就更糟糕。

由于市场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只能学习和借鉴,而不能直接引进,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基点”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金融自由化之路和开放其金融部门时,其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状况良好时,它们相信很快就会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更多的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并注入更多的国际资本,人们会认为不这样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状况欠佳时,巨额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促使外债举借频繁,似乎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是解决或掩盖本国金融问题的良方,借助外部融资金融机构和政策方面的缺陷暂时



被掩盖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更关心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它们只谈市场的好处而不谈跨国银行的攫利本性。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年中都使得全球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一种时髦的理念,而不是经过缜密推算的经济学结论。似乎全球开放经济就能取得“帕累托福利增进”,这种不兼容性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过分暴露在随时准备利用其缺陷获利的、富有经验的竞争对手面前,更糟的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本就缺乏监管,很自然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就更为脆弱,并成为全球金融泡沫中最薄弱和最易招致危机侵袭的一环。

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卷入金融危机的原因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带有共性的,那就是其外部市场开放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兼容性。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受困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和对冲基金的冲击;韩国的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则过分暴露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并积累了过多的短期债务;香港尽管是完善的金融中心,但同样受到房地产泡沫和本币高估等内部问题的困扰。这些都显示出不兼容性开放在亚洲危机中的深刻影响。更进一步来说,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全球金融泡沫破裂之后,市场参与者承受危机损失的不公正性。当全球金融泡沫在亚洲破裂时,跨国银行和对冲基金们借助IMF的紧急救助计划,其在亚洲的贷款可获得补偿,故而远远地躲开了风险;一些遇到麻烦的国家和地区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投机性,并预见市场将因此而更低迷,金融机构甚至还可获利。金融泡沫破裂的损失看来注定要落到发展中国家的头上,美国经济似乎毫发无损,美联储变得比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更有经验和睿智,能够迅速决断,并对“政府干预”或“紧急救助失败”之



类的指责无动于衷。东南亚、拉美乃至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备受批评的同时,不得不承担危机成本。这种情况和墨西哥金融危机惊人的一致,所谓“紧急救助”,救助出来的不是受危机侵袭的国家,而是曾经向新兴市场大量注资,而最终导致受资国无力偿还的国家。

### 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危机得到哪些教训? 从其角度看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改革?

首先,必须协调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使外部市场开放和内部制度建设相互兼容,随着国内经济改革和总体发展水平不疾不慢的坚持开放,实在是一种“政策艺术”。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市场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不能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对于遭受危机侵袭的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未来走得更坚实,暂时的撤退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至少是从危机复元之前“暂时的控制”(保罗·克鲁格曼)。具体来说:(1)一些不具备风险管理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限制市场开放程度和禁止特定参与者的进入,就如台湾禁止一些对冲基金的市场准入一样。(2)在现有规则框架下,如果一国或地区仍不能抵御投机性攻击,则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改变具体规则,就如香港为提高投机攻击成本和限制市场操作行为而修改其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一样。(3)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威胁的国家,应对外部经济部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予以严格控制,以换取恢复和重组本国经济的时间,从这一点来说,马来西亚为促使经济复苏和提高内外部经济部门之间的兼容性而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是无可非议的,但其



效能更取决于后续的改革政策和何种程度的“控制”才算合理。(4)如果一国经济受制于其效率低下的企业部门,那么就应采取严格的契约和规则来限制有关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融资关系。例如中国政府最近就不再为金融机构或企业的融资提供政府担保。某种程度的“控制”的确是一种后退,但它是相对于过度激进的必要修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策人员来说,理解风险报酬的内涵是非常必要的,追求高收益一定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承担高风险的损失,这种损失可能是采取较严格的监管时资本内流的减少,也可能是没有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等待市场自发重组时的国际资本外逃,甚至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国民财富的减少。所以适当的国家监管体系可能使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更为平稳,前景也光明得多。

其次,必须致力于改革并给予国内市场以足够的重视。全球金融泡沫在亚洲的破裂警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如何谨慎地决定市场开放的过程相比,加速内部经济改革更为重要。说到底,是我们自身的市场制度和政策水平,限制了我们抵御国际投机和确保金融稳健的能力,以及参与全球化竞争并从中获利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全球金融泡沫中最薄弱的一环。如果不能加速国内改革,那么过度激进后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暂时的撤退就可能成为永久的滞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抱怨并没有实际作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必须参与,否则你就只能被边缘化或仍然落后。全球化的演进规则和利益分享永远只是相对于参与者国力比照的合理,它应该是全球参与者共同获益的过程,但它首先必须是参与者经得起全球化竞争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也不必抱怨金融全球化中其他参与者的恶劣的动机、市场操纵乃至阴谋等等,要他人考虑你自身的利益是不现实的。对于东



南亚国家来说,目前的关键在于重构政府、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形成富有活力的国内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政府主导和政府保护在早期也许能奏效,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主导和保护对于市场扭曲的影响就会越严重。此外,出口主导型模式在 80 年代以前也许还行得通,但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模式,该模式的一个起码的不可持续的理由是:当参与全球化的各国纷纷追求贸易顺差和引入外资时,全球经济就不可能只有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给予国内市场以足够的重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兼顾社会收入分配是非常必要的。

###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必须正视全球金融泡沫的严重性,提醒我们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首先应该对金融资本的流动进行监管,人们总是强调新兴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却对跨国银行、对冲基金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披露避而不谈,新兴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当然有助于私人金融部门降低风险提高收益,但后者对全球金融泡沫的膨胀难免其责。必须放弃一些陈旧的监管教条,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比、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公开信息披露和融资规模进行必要的规定,以监管金融资本的流动。其次,必须认真反思紧急救援机制的合理性。金融危机是借贷双方的共同责任,鉴于没有行使其微观监管义务,贷款方而不是投资方过失更重一些。作为投资方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领略了紧急救援机制的惩罚和屈辱,IMF 所



提供的紧急贷款不是帮助他们恢复经济,而是直接还给了贷款方,并且随后受资方还需要以更高的用资成本还给 IMF,作为受资方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因其经济体系效率较低、不负责任地举债和不够透明的市场交易承受了苛刻的代价。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惩罚那些肆意放贷,或者在考虑了可能的紧急救援机制之后而变得肆意的贷款方?对新兴市场国家中不负责任的银行放款给不负责任的企业以致形成巨额坏账进行惩罚的建议不计其数并已成共识,那么为什么不对同样不负责任地向东南亚放款的跨国银行进行起码的惩戒?现行的紧急救援机制并非如此。IMF 紧急救援的是跨国银行而不是遭受危机的国家,其紧急救援带来的也不过是强制国内金融重组的恐慌。一种要求借贷双方在危机后共担责任,共商债务再安排的紧急救援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观察,在全球化时代,它们需要他国尊重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开放市场,需要形成更代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和跨国银行的意愿和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



## 东南亚危机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在思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应该从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得出哪些有益的教训?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见表1),对于它们那里出现的问题也就特别关注。与此相联系,人们对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也产生了疑问:(1)从短期看,东南亚危机与东亚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哪些是属于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必然后果;(2)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究竟还有没有用,有哪些还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有哪些应该被抛弃?东亚模式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是否还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优势,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文将主要就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一些问题,对中国能从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进行一些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问题都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经济制度改革、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危机防范等等。不过,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对只有在讨论经济发展时才提出来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如“出口导向”问题,“政府主导作用”和“产业政策”问题、引进外资问题、科技战略问题、经济发展与宏观稳定、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等等,进行讨论。



表 1. 亚洲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比较(1994)

国家及地区	人均 GNP (美元)	按 PPP 测算的 人均 GNP(美元)	1985—1994 年 均增长率(%)
泰国	2 410	6 970	8.6
马来西亚	3 480	8 440	5.6
印度尼西亚	880	3 600	6
菲律宾	950	2 740	1.7
新加坡	22 500	21 900	6.1
韩国	8 260	10 330	7.8
中国大陆	530	2 510	7.8
香港	21 650		5.3
台湾省	11 600		7.6

资料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有关台湾省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否定东亚发展模式为时尚早

东南亚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幸灾乐祸地认为“亚洲奇迹”破灭了,甚至“下一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也破灭了。这种结论至少是为时过早。

第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是有曲折、有波动、有危机的;风险、危机等等可以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的和正常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怎么能够想像经济发展没有风险和危机的伴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其早期(18—19世纪直至本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危机的。落后国家的发展,因有发达国家的挤压,风险就更更大些,出现一些曲折总是难免的。此次危机即使使一些国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目前看也还是比不上本世纪30年代西方





大萧条那么惨重。亚洲一些国家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 300 年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出一点问题、没有一些波动,反倒是奇怪的。就凭这么一次经济危机就否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改革成就,否定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和光辉前景,是缺乏历史观点、忘记自己历史的表现。

第二,现在的危机本身也并不能否定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因为真正的奇迹已经在过去发生了:人们的收入已经在二三十年内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已经立在那里了;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四小龙”仍然实力强大,台湾、新加坡、香港仍然稳定,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为他们能在三四十年时间里人均国民总产值赶上西方老牌强国而自豪。而且,近乎四十年平均每年 8—10% 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奇迹。

第三,危机可能导致更健康的发展。危机是旧体制下经济矛盾累积的结果,因此它也就成为进行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可以使平常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危机能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过去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并使今后的发展更加健康地进行下去。这一危机从各方面看来仍可看作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没有这种历史的观点,我们既可能错误地判断形势,也会无法正确地总结与吸取经验教训。

至于说到哪种“模式”更优哪种模式更劣的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是:所谓“东亚模式”,是一部分东方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它第一不是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也不是东亚这些国家已经成熟了、“定型”了的经济模式,它是一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模



式。用那些西方老牌经济强国当年的模式和现在的经济体制来直接与亚洲国家发展过程的这一阶段(危机出现之前也就是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发生之前)的经济模式相比较,实际上是缺乏可比性的,没有什么意义。幸灾乐祸地宣称“亚洲模式的破产”,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本身只属于发展的较早阶段、本身也在发展变化之中。

肯定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就,当然不否定我们应该充分地分析过去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缺陷。以上的分析只是表明,我们不应在看到问题的时候就对东亚模式采取一概否定的观点。

## 出口导向与发展国内市场

东亚发展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出口导向”(export-led growth),即通过不断扩大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的成长。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年一些国家的出口受阻,导致外贸逆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危机爆发后,人们自然对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怀疑,值得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 1. 出口导向与竞争力的提高

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充分显示出它的下述优点:

第一,出口导向意味着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接受国际准则,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作为检验自己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



步的标准。这比关起门来保护本国市场的“进口替代”政策，更有利于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

第二，出口导向由于积极使本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面对国际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需求，因此虽然受国际市场的制约，但是不会受本国市场上因收入低而购买力较低的限制，也因此而能取得较高的附加值，加快一国的资本积累。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三，出口导向，扩大了产品出口能力，也就可以攫取大量外汇并因此而能购买本国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先进的技术、设备。

东亚各国能有今天，与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积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分不开的。此战略的成功不是没有条件的，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也可能导致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项战略在东亚经济起飞与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而且，有了较为成功的“出口导向”，东亚各国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进口替代”，因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在本国市场上也必须是有竞争力的；如果不能先打开国内市场，也很难打开国际市场。日本、韩国等在发展初期阶段一方面出口导向，眼睛盯着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值得效仿的榜样，无论先进国家如何对此加以批判。

## 2. 出口导向的国际条件与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是需要一定的国际市场条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崛起的时代，一方面有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这些亚洲“盟友”的特殊对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那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还未进入起飞时期，苏联东欧集团也相对



封闭,国际市场上只有这几个国家生机勃勃,先是占领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然后向机电、电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一直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空间。而这种有利条件,到了90年代已经越来越趋于消失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南亚、南美和东欧的国家,都加入了全球化的竞争;而发达国家,由于面临高额贸易赤字(如美国)和国内就业压力,也比二十年前更多地运用贸易限额、反倾销等手段来保护本国市场。可以说,当年日本和“四小龙”出口导向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95年以来国际市场空间相对变小而导致的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下降,贸易赤字扩大,最终引发一些国家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并发生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表2. 各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比较(%)

国家及地区	出口依存度	出口集中系数
泰国	39	9.0
马来西亚	90	15.6
印度尼西亚	25	19.4
菲律宾	34	29.3
新加坡	177	18.3
韩国	36	10.9
中国大陆	24	7.6
香港	139	15.2
台湾省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在继续努力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更加注意本国市场的扩大,使得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能够容纳更多的产出,使需求的扩大与生产



力的提高相适应。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具有应付危机的短期调整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长期战略的调整。

中国具有 12 亿人口,是潜力最为巨大、因而被世界各大强国、各大跨国集团多少年来所梦想进入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国内市场条件。21 世纪中国将要面对的国际竞争一定比当年东亚各国激烈得多。国际市场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得多。在此情况下,充分发挥本国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应该充分利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能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收入提高的机会,及时扩大国内市场,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这可以说是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 3. 扩大出口与引进外资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就要尽可能快地提高本国的竞争力。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一是要扩大资本投入;二是要利用先进技术,在本国既缺乏资本又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的情况下,要想使发展速度快一些(比单靠自己积累快),就需要利用外资。利用外资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较多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二是较多地通过金融市场借债,自己买技术设备,自己搞投资。东南亚一些国家如韩国和泰国,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搞了出口导向,而是在出口导向的同时,过于排斥外国直接投资而过于依赖借债,特别是对国际短期债务的依赖。



在引进外资中,若国际债务、特别是短期商业债务和证券投资等投机性资本(“热钱”)所占比重过大,则势必导致金融风险。上次的墨西哥危机和这次泰国、韩国等国危机爆发,无不与短期资本比重过大有关。从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看也是如此。韩国 1988—1997 年间短期融资市场的交易量扩大了 10 倍,而股票市场交易量才增长了 3 倍。韩国综合金融公司的业务中 93% 是进行短期商业票据的买卖,泰国的外资也是 70% 用于证券投资,风险自然较高。而美国金融公司的投资中 60% 投于政府债券和股票,英国 60% 投于股票,德国 70% 以上投资于各种长期债券。

表 3. 东南亚四国外债总额及偿债率 1991—1996

(单位:亿美元,括号内为偿债率%)

年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1991	795 (34.3)	178 (7.7)	300 (19.6)	333 (10.1)
1992	880 (32.6)	200 (6.6)	309 (17.0)	374 (10.6)
1993	891 (33.6)	233 (7.8)	343 (17.1)	468 (10.7)
1994	965 (30.7)	225 (4.9)	371 (17.4)	550 (11.3)
1995	1 078 (30.9)	274 (6.2)	378 (16.0)	681 (11.0)
1996	1 202 (33.7)	287 (5.9)	383 (12.5)	785 (11.1)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and 1998, 亚洲开发银行。

相反,外国直接投资(指在实业中的长期投资),则不仅可以短期内起到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难以在市场发生波动时抽逃,而且在长期内可以:第一,增大本国的生产力,第二,增加出口以保持外贸平衡,不会引起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失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长期以来,韩国基本上采取了拒



绝或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但与此同时,为了快速增长、赶超先进国家,又大量在国际上融资、借债,积累了巨额短期债务。在全部 2450 亿美元的外国资本中,只有 600 亿是直接投资。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国际融资发生困难,就难免发生国际偿付危机并使国内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韩国的国际支付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片面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表 4. 各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外债的比率(%)

国家及地区 \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泰国	4.81	3.36	2.21	2.63	2.75	3.21
印度尼西亚	11.18	8.69	23.25	35.68	29.87	32.70
马来西亚	24.73	19.86	16.27	17.87	16.54	10.25
菲律宾	0.70	2.90	4.26	4.23	4.37	3.14
韩国	1.47	1.42	1.40	1.74	2.18	2.01
新加坡	52.75	110.34	82.11	62.63	59.05	57.55
香港	12.58	8.11	8.24	7.61	7.94	7.73
台湾	3.85	3.13	5.04	5.08	6.34	3.77

资料来源:Imf 199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db*、APEC 等各年度公开发表的统计报表。表中 1997 年数据系年底的初步统计结果。

### 三、追求科技进步与发挥比较优势

就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竞争力的提高问题有关,东南亚经济



危机也告诉我们,必须在追求科技进步、力争在高科技产业中与先进国家竞争和充分发挥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这两个方面取得平衡。

这次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做深入的分析。

科技落后、人才不足,当然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改变资本不足状况,尚可引进外资,但要想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却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见效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过急了反而会出事。与美国、西欧等国相比,东亚、东南亚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当然不是主要领先高科技的发展,因为它们作为落后国家,运用高科技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一时又难以赶上先进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对它们来说,在这一阶段上,最符合经济理性的恰恰是首先用足、用尽比较优势即其“廉价的”劳动投入(这时全要素生产力自然也就较低),逐步提高科技开发能力,然后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升级。不但如此,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反倒会出问题。台湾、新加坡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甚佳,原因之一恰恰是循序渐进,逐步实现比较优势与高科技产业的替代过程。而在这些年急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韩国、马来西亚等,最终却因竞争力不强、出口下降、贸易赤字扩大陷入了困境。比如韩国就是为了早日跨入高新产业发展阶段,不惜工本大肆举债、大肆扩张,包括收买人才和大规模进行科研投入,但高新科技又一时难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才使自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潜伏下了导致今天危机的祸根。这才是我们





真正吸取的一个教训。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

此外,从东南亚各国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想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资本积累,还必须注意不使劳动成本上涨过快,不使消费快速膨胀。这次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其实在“真实变量”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劳动成本因种种原因过快提高,而产业升级难以同步进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实际上,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虽与盯住汇率制度、实际币值高估有关系,与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抬高了楼市价格有关系,但同时也与一些国家过早扩大消费需求的政府政策与社会风气有关,与一些国家不适当过分强调产业升级有关。在这方面韩国也是一个例子。由于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多种原因,韩国的劳资关系这些年一直朝着有利于工资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过早地实现了工资福利制度的现代化;而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工业化政策,这种大企业的工资水平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也就特别地大。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增,与此同时也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更多



地像发达国家那样消费,结果不仅导致进口进一步扩大,而且推动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过早地失去了劳动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只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放弃或向外转移(如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经济的“空壳化”;而与此同时,高新产业的发展又一时达不到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的原材料、配件等)迟迟不能扩大,结果便加剧了外贸收支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 国内体制问题、结构问题 越多,越是不能停止增长

这次东南亚各国陷入危机,或多或少都与1996年世界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各国出口增长下降,从而引起各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外债问题暴露、贸易不平衡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等等有关。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过大。但是,如果在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同时,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的增长,至少可以不使国内金融危机发生并引发国际收支危机。韩国这些年已经积累起了较严重的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全球半导体需求下降、价格下跌,严重影响了出口和国际收支,导致一系列债务问题暴露,企业破产,国际信用等级、融资能力也随之下降,最终酿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像银行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是否演化成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因为信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不良债务越多,人们越敏感,增长率稍有变动就可能影响到“泡沫”的破灭。因此,即使对于一个



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经济来说,为了防止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也可以从这次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越严重,首要的当然要抓紧体制改革,但同时也越要在宏观政策调整上做文章,防止经济滑坡、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我国目前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近期内就更是面临出口增长趋缓、外国直接投资趋于下降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适当调整宏观政策,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主要应是基础设施投资),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 宝贵而“免费”的一课

无论这次危机对中国产生或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积极的影响都是最主要的——中国人很少没有对外国发生的事情像这次这样广泛研讨、认真研究、吸取教训。几十年前或一百几十年前发生在欧洲、北美的类似事情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时过境迁,历史已经过去;六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泡沫崩溃、坏债暴露),许多人没有在意,因为日本已经太发达了,我们与他们的发展阶段相差太远;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三年前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金融危机、对外经济关系失衡),许多人也没有在意,因为那是遥远的南美,文化背景不同,国际环境不同。而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邻国,而且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背景相近,不仅与我们有着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且我们也与他们面临一些同样或相似的问题,如银行坏债、房地产



积压、固定汇率制度等等，于是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课程”——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它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的做法），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及时而认真地吸取这些以别人的经济危机为代价的经验与教训。综上所述，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有：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特殊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在“增进市场”的体制改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等问题上，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关系越复杂，越是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域内，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越小，甚至起不好的作用。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仍是值得仿效的，但必须注意到国际市场竞争条件的变化，在今后要特别注意发展和利用国内市场；同时要注意利用外资的方式，应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过多地依赖外债，特别是不能使短期债务或外国证券投资在外资中的比重过大。

——必须在追求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and 注意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不可在条件不



具备的情况下片面强调“产业升级”，在新的竞争力没有获得之前，原来的比较优势也失去了。

——国内问题越多，经济越是不能停止增长，应在加快改革的同时，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 “对冲基金”的危机与警示

1998年9月24日开始,西方各大传媒报道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之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了巨额亏损,800亿美元的欠债已难以支撑,美联储和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协调行动,要求该基金的主要债权人即各大国际银行对其进行“拯救”(bail out)。这一事件对于全球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中的教训是什么?

我认为,上述事件,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事件说明,全球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动荡,还远未到头,今后还可能发生一系列的类似事件,引发新的震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类的“对冲基金”,就是这些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际金融机构。而它们的行为特征之一就是“行为诡秘”。迄今为止,它们的具体投机活动很少曝光,而且各国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章迫使他们公布其资金往来情况。甚至连他们的债权人对其投资组合和财务往来也不甚了了。正如有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冲基金具有“曝光死”的特点,每一个都有许多掩盖着的问题,一旦问题暴露,就马上引发一系列的危机。“长期资本基金”只是对冲基金问题暴露的第一家。而且,这次的事件也充分暴露出,在



世界各地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的后面给它们撑腰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际大金融机构,如美林、摩根斯坦利、巴克历、高盛、旅行者、瑞士联合银行、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大通银行、JP 摩根、雷门兄弟等一系列世界顶级大银行、大财团、大金融公司(这些公司共 12 家,这次在美联储干预下,一次性勾销了它们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共约 35 亿美元的债务),对冲基金一垮,这些财团也自然跟着倒霉(这些瑞士联合银行发生巨额亏损并导致董事长辞职,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一个直接结果)。9 月下旬以来西方股市下滑,美联储下调利率也不能止住,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使得投资者和西方政府变得紧张而敏感。由此推论,全球金融市场新一轮的动荡才刚刚开始。对此宁可把情况设想的严重一些,充分估计这个“大泡沫”崩溃可能带来的震荡与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静观事态的发展,更加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严防受到新一轮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

第二,对冲基金的危机,暴露出了国际资本市场“泡沫”的存在和纯投机性金融资本比重过大的问题。80 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市场行情一路看涨,一方面是与全球实际经济的发展、新兴市场的崛起相关的,但在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与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相关的。“衍生工具”、“杠杆投资”(借钱买卖证券)、“对冲基金”这些市场上的创新,的确加速了资本的流动速度,扩大了资本流动的范围,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的配置,也开发了大量以前未被利用的投机、套利机会,从而使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持续的发展。这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回报率提高,导致世界范围内资本总量有了较快的扩大,可利用资本增多。但另一方面,资本总量当中用于证券



投资、短期借贷等等的“热钱”所占的比重也就随之大大增加，而用于实际部门的真正长期的“实业投资”，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却相对缩小。从对冲基金大量借债进行“杠杆投资”（高达 20 比 1），全世界“热钱”乱窜、证券市场持续高涨等等现象来加以判断，可以说，在各种金融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有了一个巨大的“全球金融大泡沫”。这个泡沫以对冲基金“大进大出”活动为直接动力，以各大投资银行的高额借贷为后台。这个泡沫的崩溃，最先表现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然后是俄罗斯，现在轮到了国际大对冲基金以及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市场比例失调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也存在一定的机遇。前几年金融资本相对发展过大，一时当然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动荡，今后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投资者和借贷人会较为谨慎，对于“没有真实业务”而只是买空卖空的那种金融投资会相对减少，实业投资会相对增加。这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我们这样内部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增加引进长期直接投资的机遇。我们应积极采取对策，抓住这个机遇，引进各国资本进行直接投资。要注意的是，所谓“实业投资”不仅是指农业、制造业等等物质生产部门，也包括信息产业、银行业等一切提供真实服务、而不仅是买空卖空的产业。对实业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我们所需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不会像“热钱”那样说走就走，风险较小，较好管理，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逐步引入国际竞争、适应国际竞争，使市场竞争和管理机制逐步发展进来，为进一步的参加全球化的进程做好准备。

第三，对冲基金的危机，最终暴露出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80 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进展迅速，有时可以用“日





新月异”来形容,有一段时间隔几天就会出来一种新的“衍生工具”,令人眼花缭乱。这时自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进行市场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从中获益的金融家们,打着市场自由、市场开放、全球化的旗号,不仅在本国反对各种形式的市场管理,而且尽量去叩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大门,以逃避各种管制。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本身就是逃避管制的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政府刚制定出了一些管制已有金融工具的规章制度,人们又会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去钻那些还未被堵住的空子。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和社会对风险的控制,总是落后于市场发展的。许多问题,不到出了大震荡、大危机,有一个大暴露,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对如何控制风险、规范市场也很难有清醒的认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充分表明了,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能涉及的范围;金融市场的管理体系已大大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在资本交易透明度、资本流动的监管、债务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管理的空缺,导致大量国际资本可以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在全球流动,冲击各国经济。各国的金融管理不适应新的情况,国际金融体制也缺乏必要的改进。如果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人们还可以指责是这些国家本身体制上和结构上的缺陷导致了在竞争市场上的失败,那么这次,这些高度“发达的”,“自由的”、经验丰富的、精明老练的对冲基金的破产,则最终充分暴露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管理体系中所存在的巨大漏洞。

正因如此,对冲基金的危机,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紧迫性。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西方国家的首脑们也不得不开始对此进行“紧急磋商”。面



对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维护我们的利益,力争扭转由发达国家订立“游戏规则”的传统,力求使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更多地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发展中国家在逐步加入世界金融体系时少受国际投机者的冲击,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较为透明的、有序的国际金融市场。

最后,对于我们国内的投资者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次的事件中进一步认识经济规律的作用。金融市场、金融资本的运动最终不能脱离实际经济、实业投资的运动;资本市场不可能“永远是牛市”,有了泡沫早晚会被破灭。这些经济规律或迟或早总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作用。前不久还有西方经济学家在歌颂欧美证券市场和对冲基金一类的金融创新,说它们无论全球如何动荡,这些“新经济”会继续高涨下去。对于我们许多迷信金融投资、迷信“太大不会败”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资本市场收益高、风险也大,今天大赚,明天可能赔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5年、1996年的利润率为40%,1997年为17%,而今年,其资本金价值9月份时已贬值44%,现在已经濒临破产,资本价值事实上已所剩无几了(被参加拯救的银行所接管),算下来前几年赚的也基本就赔了进去。相比之下,实业投资,不会一日暴富,但扎扎实实,有实实在在的业务,风险相对较小,长期算下来赚的可能更多。



## 东南亚危机对我们的教训： 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使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更好的大好机会。仔细分析一下这次危机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吸取经验教训：

1. 宏观政策层面——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各种宏观经济比例关系的管理以及外汇等因素的影响和由此产生的问题。

2. 经济体制层面——指经济、政治体制，包括政府、企业、银行等体制及其相互关系。

3. 危机应对层面——主要是指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投机家的战略与策略及其主客观条件，政府应付危机的对策等等。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涉及国家和地区中，泰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和汇率管理等方面较具典型的借鉴意义，而韩国则在经济制度、特别是国内政府—银行—企业关系等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值得我们重点加以研究。

本文将主要研究中国可以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问题。关于这些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不在此讨论（可参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7年第11月号)。本文是在国民经济研究所内部的一系列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着重参考了该所特约研究员如余永定、贺力平、谢多等人近期的研究成果(见参考文献)。在本文中,我们对近一时期报刊杂志上已经谈论较多的事实与分析不多加重复,着重以简要的方式,阐发我们的观点。

表 1. 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比较(1994)

项 国家及地区	人均 GNP(美元)	按 PPP 测算的人 均 GNP(美元)	1985—1994 年 均增长率(%)
泰国	2 410	6 970	8.6
马来西亚	3 480	8 440	5.6
印度尼西亚	880	3 600	6
菲律宾	950	2 740	1.7
新加坡	22 500	21 900	6.1
韩国	8 260	10 330	7.8
中国大陆	530	2 510	7.8
香港	21 650		5.3
台湾省	11 600		

资料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有关台湾省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宏观政策

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损失较重的国家,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都是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包括对外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管理不当。因此,研究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首先还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加以探讨。



## 1. 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真正尊重经济规律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汇率机制、资本市场开放等因素相关,但基本的内因是本国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发生了投资过度,经济过热,结果导致进口过多、贸易赤字,过多地依赖外国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国际债务(参见余永定,1997a;贺力平,1997)。泰国国内储蓄率为30%左右,但投资率达到40%以上,不足部分必然要靠外资流入;而过多的外资进入增大了国内市场需求,导致经济过热、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外贸赤字。固定汇率制度当然使问题更加严重,是情况恶化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没有汇率的作用,过度投资也可能造成对短期外资的过度依赖,使风险加大。而资本市场的开放固然构成对外资依赖的条件,但如果仅有资本市场的开放,而无经济过热,也不会形成对外资的依赖。

表 2. 东南亚五国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1991—1996

年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新加坡
1991	-3.5	-9.2	-2.2	-7.8	11.2
1992	-2.1	-3.9	-1.8	-5.8	11.1
1993	-1.4	-4.6	-5.5	-5.2	7.3
1994	-1.6	-6.0	-4.5	-5.8	15.9
1995	-3.6	-9.0	-3.3	-8.3	17.6
1996	-4.1	-6.3	-4.1	-8.1	15.3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and 1998, 亚洲开发银行。

发展中国家由于追赶先进国家心情迫切,投资机会又多,所以很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而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繁荣,加上资本流入带来的好处,又可使潜在的问题被暂时掩盖,很容易产生



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保持经济比例关系之类的问题只与别人相关,而“我们就是不一样”;一般的经济规律可以对我们不适用,我们就是可以永远地“高涨”下去。这可以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心理背景”。相反,比较注意宏观经济比例关系的新加坡、台湾,这次的损失就较小。

## 2. 外资多了不可怕,但外资中短期债务 和证券投资多了却势必导致风险加大

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尽快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再高的国内储蓄率原则上说也是不够的,仍有必要借助外资的力量。因此,“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国内储蓄许可范围内”的政策似乎过于保守,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利用一些外资(外资还不仅是资本,它还能带进技术、管理、市场、知识等等)。但在引进外资中,若国际债务、特别是短期商业债务和证券投资等投机性资本(“热钱”)所占比重过大,则势必导致金融风险。上次的墨西哥危机和这次泰国、韩国等国危机爆发,无不与短期资本比重过大有关。

表 3. 东南亚四国外债总额及偿债率 1991—1996  
(单位:亿美元,括号内为偿债率%)

年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1991	795 (34.3)	178 (7.7)	300 (19.6)	333 (10.1)
1992	880 (32.6)	200 (6.6)	309 (17.0)	374 (10.6)
1993	891 (33.6)	233 (7.8)	343 (17.1)	468 (10.7)
1994	965 (30.7)	225 (4.9)	371 (17.4)	550 (11.3)
1995	1 078 (30.9)	274 (6.2)	378 (16.0)	681 (11.0)
1996	1 202 (33.7)	287 (5.9)	383 (12.5)	785 (11.1)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and 1998, 亚洲开发银行。



相反,外国直接投资(指在实业中的长期投资),则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难以在市场发生波动时抽逃,而且在长期内可以:第一,增大本国的生产力,第二,增加出口以保持外贸平衡,不会引起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失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长期以来,韩国基本上采取了拒绝或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但与此同时,为了快速增长、赶超先进国家,又大量在国际上融资、借债,积累了巨额短期债务,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国际融资发生困难,就难免发生国际偿付危机并使国内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韩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片面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表 4. 泰国的外资流入结构(单位:亿泰铢)

项目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净资本流入	2 882	2 407	2 659	4 359	6 466
政府	75	- 79	- 41	- 9	28
银行	- 66	493	876	3 506	2 783
FDI	471	500	398	219	300
证券投资	8	139	1 269	307	800
非居民泰铢	524	445	678	511	879
账户					
其他贷款	1 870	909	- 521	- 1 476	666

资料来源:《增长中的老虎:泰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

### 3. 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消费早熟和工资、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



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做深入的分析。

科技落后、人才不足，当然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改变资本不足状况，尚可引进外资，但要想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却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见效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过急了反而会出事，比如韩国就是为了早日跨入高新产业发展阶段，不惜工本大肆举债、大肆扩张，包括收买人才和大规模进行科研投入，但高新科技又一时难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才使自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潜伏下了导致今天危机的祸根。

这次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其实在“真实变量”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劳动成本因种种原因过快提高，而产业升级难以同步进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实际上，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虽与盯住汇率制度、实际币值高估有关系，与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抬高了楼市价格有关系，但同时也与一些国家过早扩大消费需求的政府政策与社会风气有关，与一些国家不适当过分强调产业升级有关。

在这方面韩国也是一个典型。由于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多种原因，韩国的劳资关系这些年一直朝着有利于工资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过早地实现了工资福利制度的现代化；而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工业化政策，这种大企业的工资水平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也就特别地大。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增，与此同时也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更多地像发达国家那样消费，结果不仅导致进口进一步扩大，而且推动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过早地失去了劳动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只好或是主





动或是被动地放弃或向外转移(如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经济的“空壳化”;而与此同时,高新产业的发展又一时达不到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的原材料、配件等)迟迟不能扩大,结果便加剧了外贸收支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表 5. 各国经济结构的比较(%)

项目	基尼系数	社会 储蓄倾向	出口依存度	出口 集中系数
泰国	46.2	35	39	9
马来西亚	48.4	37	90	15.6
印度尼西亚	31.7	30	25	19.4
菲律宾	40.7	18	34	29.3
新加坡		38	177	18.3
韩国		39	36	10.9
中国大陆	37.6	44	24	7.6
香港		34	139	15.2
台湾省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



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

#### **4.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有较为 灵活的汇率制度与汇率政策**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由外汇市场开始,因此对外汇管理体制与政策的问题各方面都已有了较充分的讨论。最重要的教训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固定汇率制度在有各种好处的同时,也有很大风险。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一定过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但也至少应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制度”,用汇率的有控制的变化,调节外汇收支,既防止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加剧,又可为宏观货币政策的操作留有合理的空间(谢多,1997)。

#### **5. 国内体制问题、结构问题越多, 越是不能停止增长**

这次东南亚各国陷入危机,或多或少都与1996年世界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各国出口增长下降,从而引起各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外债问题暴露、贸易不平衡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等等有关。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过大。但是,如果在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同时,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的增长,至少可以不使国内金融危机发生并引发国际收支危机。韩国这些年已经积累起了较严重的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全球半导体需求下降、价格下跌,严重影响了出口和国际收支,导致一系列债务问题暴露,企业破产,国际信用等级、融资能



力也随之下降,最终酿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表 6. 宏观经济指标比较(%)

国 家 项 目	GDP 增长率	通货 膨胀率	出口 增长率	进口 增长率	经常 项目差额	美元 汇率
泰国						
1993	8.3	3.3	14.5	13.6	-5.4	25.52
1994	8.8	5	14.5	15.9	-5.6	25.11
1995	8.7	5.8	19.9	21.9	-8.1	25.19
1996	6.7	5.8	0	2.2	-8	25.64
1997	6.1	4.3	3.8	-2.9		26.11
马来西亚						
1993	8.3	3.5	15.7	14.4	-4.6	2.54
1994	9.2	3.7	22.5	27.6	-6.3	2.55
1995	9.5	3.4	17.6	21.2	-8.5	2.54
1996	8.4	3.5	3.9	3.3	-5.2	2.53
1997	8.5	3.2	1.2	-0.7		2.51
印度尼西亚						
1993	7.3	9.7	8.4	3.8	-1.7	2.62
1994	7.5	8.5	4.3	14.5	-1.7	2 198
1995	8.2	9.4	6.8	24.6	-3.4	2 294
1996	7.8	7.9	8.1	5.7	-3.7	2 362
1997	8.0 *	5.4		6.2		2 432
菲律宾						
1993	2.1	7.6	13.7	21.4	-5.5	25.51
1994	4.4	9	19.8	14.5	-4.1	24.4
1995	4.8	8.1	12	16	-3.6	26.23
1996	5.5	8.4	23.9	21.2	-4.5	26.3
1997	6.0	4.7	22.9	11.4		26.38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1997—1998 亚洲发展展望》1997年4月。



像银行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是否演化成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因为信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不良债务越多,人们越敏感,增长率稍有变动就可能影响到“泡沫”的破灭。因此,即使对于一个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经济来说,为了防止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也可以从这次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越严重,首要的当然要抓紧体制改革,但同时也越要在宏观政策调整上做文章,防止经济滑坡、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我国目前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近期内就更是面临出口增长趋缓、外国直接投资趋于下降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适当调整宏观政策,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主要应是基础设施投资),已成为当务之急。

## 经济体制

这里“体制问题”主要是指在政府、企业、银行(包括金融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

所谓“东亚经济模式”历来是东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本身就包括了本来属于“东亚经济”范畴的韩国;同时作为“东亚模式”的带头人日本也还没有走出低谷,有些问题还在进一步暴露。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东亚模式”的良好机会。



## 1. 国家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所谓“东亚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这次东南亚危机之后人们谈论较多的也是这一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由于已有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必事事都由市场通过“试错”的方式摸索成功之路,在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上,特别是在早期阶段上,运用政府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以期快速增长,有其合理性。日本“经济企划厅”对私人部门提供信息、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做法,不失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一个成功经验(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计划指导”或“产业政策”,而是信息的沟通与协调)。但是,如果“政府主导”意味着韩国式的“政府保护”,是政府指示银行给企业贷款,企业可以凭借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关系进行扩张,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则必然潜伏下日后的危机。

“政府保护下的企业和银行”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即使企业和银行不是国有的,在行为方式上也会与国有企业差不多,因为亏损或资不抵债后都可以依靠国家信誉、通过信贷扩张(或资本市场、票据市场上的融资)而生存下去,事实上就是同样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也会产生许多扭曲,并使经济增长缺乏效率:

首先,钱来得容易,企业就会较少在提高内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所谓的“盲目扩张”就更容易发生。韩国销售额占全国97%的49个最大的财团1996年的净利润总和只有6500万美元,若把已破产的韩宝集团包括在内,韩国的令人骄傲的所谓“50大”或“50强”加在一起,1996年是净亏损。可见其效率之低,还债能力之差。



第二,钱来得容易,而且主要来自“公关”,于是就更多地  
在公关上下功夫,结果造成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韩国这几年  
政局的动荡实际是上述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三,效率越低就越要扩张,因为人们都会相信企业越大,  
在经济中影响越大,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越是难以让其破产,所谓  
“马大不死”,把企业做大也就是让它变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到头来政府就越得解救它,也就越是把政府拉入了企业的圈套  
中去。一些人事后指责韩国缺乏好的经济学家,没能在事前对  
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做出预警分析,但实际上,韩国不是没有世界  
水平的经济学家群体,只是在那样一种经济体制下最后经济政  
策的调整已完全受政治利益结构的制约,认识到了问题也已经  
难以解决问题了。

第四,盲目扩张,投资项目失败,但债务还要“滚动”下去,就  
要找新的“由头”,以吸引新的贷款或集资,于是企业就要设立新  
的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开拓“新的投资领域”(老的领域没搞  
好,别人已不相信,必须创造出新的说法),于是就搞出了一大批  
“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一个企业集团在十几  
个以至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中经营,从根本上违背市场经济  
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西方成功的大公司绝大多数主业明确,几十  
年目不转睛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发展),不仅缺乏效率,而且很难  
在国际上具有竞争性。

总之,韩国这次由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支付危  
机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与银行(金融公司)在政府保  
护下盲目扩张,导致不良金融资产过度膨胀的最终结果。在政  
府与银行、企业的关系问题上,韩国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昨天  
还在为自己已成为 OECD 富人俱乐部的一员而沾沾自喜的韩



国人,今天就在蒙受向 IMF 和日本乞求借款的奇耻大辱。我们中国人要赶快引以为戒。

## 2. “主办银行”制度值得重新思考

日本和韩国这些年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制度就是其“主办银行”(或称“主银行”)制度。这种制度的优点是能使企业与银行有较为稳定的信用关系,便于企业的融资和银行对企业业务的监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将企业绑在银行上”的做法,势必削弱企业与银行的利益制衡(许多健康的经济关系的建立,靠的不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或勾结,而是靠双方利益上的冲突与制约),软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最终不仅弄得企业效率低下,银行也被不良债务所拖垮。韩国的韩宝银行就是被其“主办”下的三家公司的不良债务搞垮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泰国等国这次的金融危机与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有关,而韩国这次明显的是最终被银行坏债拖垮的;泰国等国与汇率有关的宏观比例失调的因素起的作用较大,而韩国明显的是其银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制度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些,这些制度因素又都集中地体现在银行坏债上。因此特别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 3. 企业越大越好,还是更多地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这点可以各持各的理由。但是,韩国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靠政府保护、靠行政“拉郎配”搞起来的大企业、大集团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国有企业可能更是这样)。而台湾在这些年来以中小企业的竞争灵活性为根基持续发展,在这次危机中表现颇佳的事实,则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



企业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在长期中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落后,处处受发达国家或跨国大公司的挤压,因此都想尽快形成大规模的企业与之抗衡,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国际竞争说到底是效率的竞争、质量的竞争,规模大但若规模经济的好处不抵其他方面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或政府保护下的大企业的这种效率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竞争力。小企业如果真的灵活、有效率、成本低,同样可以有效率,而且可以发展,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由小企业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大企业(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不必仅靠自己的积累,而是可以在市场机制下进行兼并),才会具有与跨国公司一搏的真正实力。

当前对中国来说,可以将是大好还是小好的争论搁置一边,着重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机制,取消各种(特别是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以及各种政府优惠政策)歧视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小企业的政策与制度,谁有效率就向谁“倾斜”,而不再以所有制、以规模大小论“倾斜”。这样做,我们可以增长得更快而逐步减少韩国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单就发展大企业而论,那种发展“多种经营”、“综合商社”的做法尤其不可取,不适应今天竞争日益强化的国际市场的要求。在西方许多大企业都在加速摆脱“副业”、进一步专业化发展的今天,亚洲一些企业这些年来却在“横向扩张”,虽然有亚洲新兴市场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最初我们的许多市场上生产和消费还刚刚起步,“空缺”较多),但长期来看一定不是发展方向。





#### 4. 要想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上的好处,我们自己必须加速改革

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在本国经济体制上仍存在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与问题,同时也衬托出日本、新加坡等国迟迟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好处。由此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应放慢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国家快速开放,其目的也是为了尽快尽早地利用国际市场能为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尽快尽早地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并从中获益。中国迟早要走向开放,要加入WTO,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完全回避风险,也就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上获益。因此,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吸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不是消极地提出“放慢开放”,而是为了更多地从国际市场获益,我们应该加快国内经济体制包括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政府体制的改革,使这次危机变成我们加快改革开放的压力与动力。

### 危机应对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事业,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与完美的政策,再好的情况也可能发生曲折,以致发生危机。因此,从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当中及时研究危机发生的过程,吸取有关应付危机对策方面的经济和教训,也是非常重要的。



## 1. 国际金融投机家利用经济关系 失衡进行投机的各种手段与方式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向我们提示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家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对一国的金融体制和国民经济进行投机性攻击。比如，在泰国，他们进行的是“直接攻击”，即利用市场开放的条件，借入泰铢、购买美元，迫使泰铢贬值后从汇率变化的差额中获利。在香港，他们进行的是“声东击西”式的间接性攻击，即借入港币做出对港币汇率进行攻击的态势，但实际针对的是前一时期投机过度的股市和楼市，把宝压在利率上升和股市下跌（楼市下跌直接影响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股价）的预期之上，从借港币引起的利率提高和股市下跌上获利。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今后国际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投机家的手段和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化，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与防范。

## 2. 密切注意市场变化，力争主动，减少危机损失

此次金融危机中，台湾的危机对策值得借鉴。泰国7月份刚一发生外汇风波，台湾当局便看准大势，主动实行一定的货币贬值，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将问题及早消化和回避开去。当然，有的分析家指出台湾的动作背后有针对性对香港和大陆的成分；东南亚各国也抱怨台湾的贬值导致它们那里情况恶化，有损人利己的味道。但从一个经济本身的“私利”出发，及早分析形势、主动采取行动，不失为抗击风险的一个重



要策略手段。

### 3. 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

泰国在遇到国际金融投机家攻击的初期,及时采取措施,与周边盟国及时沟通,相互配合,采取对泰铢贷款进行管制的措施,使投机者无法扩大攻势,对抑制投机、减少损失,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之后,东盟国家虽然普遍陷入危机,但相互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或多或少还是在减少损失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于我们防范经济风险也有积极的意义。

### 4. 危机爆发后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悲观情绪加剧

危机爆发后局势是否会陷入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悲观情绪是否蔓延与恶化。这次泰国、韩国等国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IMF在许诺提供贷款的同时,在附加条件中又采取雪上加霜的做法,迫使受援国立即实行更多的破产和重组,结果使国内外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币值一贬再贬,国际收支状况越来越恶化。当然对一些国家来说问题既已存在,危机将其揭示出来,要想渡过难关只能委曲求全,许多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防止悲观情绪扩大是应对危机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1997)在《金融时报》上载文严厉批评IMF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所犯的错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推波助澜,不是设法消除、而是加剧悲观情绪。



## 充分估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

### 1. 有风险、有曲折是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

东南亚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幸灾乐祸地认为“亚洲奇迹”破灭了,甚至“下一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也破灭了。其实,这一危机从各方面看来仍可看作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第一,经济发展本身是充满风险的,落后国家的发展,因有发达国家的挤压,风险就更大些,出现一些曲折总是难免的。此次危机从目前看也还是比不上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那么惨重。第二,亚洲的奇迹已经发生了,人们的收入已经在二三十年内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已经立在那里了,这次的危机本身使经济得到调整,也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加以改革和调整,只会使今后的发展更加健康地进行下去。没有这种历史的观点,我们既可能错误地判断形势,也会无法正确地总结与吸取经验教训。

### 2. 对中国来说是宝贵而“免费”的一课

无论这次危机对中国产生或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积极的影响都是最主要的——中国人很少没有对外国发生的事情像这次这样广泛研讨、认真研究、吸取教训。几十年前或一百几十年前发生在欧洲、北美的类似事情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时过境迁,历史已经过去;六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泡沫崩溃、坏债暴露),许多人没有在意,因为日本已经太发达了,我们与他们的



发展阶段相差太远；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金融危机、对外经济关系失衡），许多人也没有在意，因为那是遥远的南美，文化背景不同，国际环境不同。而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邻国，而且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背景相近，不仅与我们有着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且我们也与他们面临一些同样或相似的问题，如银行坏债、房地产积压、固定汇率制度等等，于是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课程”——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它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的做法），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及时而认真地吸取这些以别人的经济危机为代价的经验与教训。